

# 傳播文化與政治

ISSN 2411-4006  
第18期 2023年12月

## 一般論文

- 政治、科技與兩岸關係：2016-2022 傳播「政策」報導與評論之分析
- 陳映真小說的左翼實踐和《人間》工作者的社會實踐

## 研究誌要

- 「真實」的傳遞或複製：臺灣媒體在俄烏衝突的角色扮演

## 新苗星火

- 在川普時代回顧《虐殺器官》：兼論伊藤計劃眼中的世界體系

## 書評

- 被《推力》趨動的人

# 傳播文化與政治

2015年6月創刊

半年刊，6、12月出刊

出版：2023年12月第十八期

## 主辦機構

媒體改造學社

## 編輯顧問

卜衛	中國社會科學院
井迎瑞	台南藝術大學
王春泉	西北大學
王嵩音	中正大學
王毓莉	文化大學
史安斌	清華大學(北京)
吳予敏	深圳大學
呂新雨	華東師範大學
李金銓	政治大學
林元輝	政治大學
林東泰	臺灣師範大學
林靜伶	輔仁大學
邱林川	新加坡國立大學
胡光夏	世新大學
胡泳	北京大學
倪炎元	銘傳大學
展江	北京外國語大學
翁秀琪	世新大學
張志安	中山大學(廣州)
張裕亮	南華大學
張錦華	台灣大學
張國良	交通大學(上海)
郭良文	交通大學(上海)
陳衛星	中國傳媒大學
單波	武漢大學
曹晉	復旦大學
劉海龍	人民大學
黃煜	香港浸會大學
趙月枝	Simon Fraser University (Canada)
蕭蘋	中山大學(高雄)

## 編輯委員會

主編	羅世宏	中正大學
編輯委員	林富美	世新大學(執行編輯)
	馮建三	政治大學
	陳光興	交通大學
	洪貞玲	台灣大學
助理編輯	劉忠博	華南理工大學

## 出版

發行人 媒體改造學社

地址 台北市中山北路二段 102 號  
3 樓之 3

電話 (02)25221499

傳真 (02)25224970

E-mail: editor.2015ccp@gmail.com

本刊網址: <http://ccp.twmedia.org/>

ISSN: 2411-4006

封面提字 黃勻祺

封面設計 馮議徽

## 訂閱

零售：每期新台幣 500 元

個人訂閱：國內一年兩期 1000 元

海外一年兩期 1500 元(或 50 美元)

機構訂閱：國內一年兩期 2000 元

海外一年兩期 3000 元(或 100 美元)

以上均含掛號郵資

郵政劃撥戶名 社團法人媒體改造學社

郵政劃撥帳號 50313103

本刊採用創意公有授權條款，如下



# 目次

編輯室報告：.....i

## 一般論文

政治、科技與兩岸關係：

2016-2022 傳播「政策」報導與評論之分析.....吳紫瑤/1

陳映真小說的左翼實踐和《人間》工作者的社會實踐.....林淳華/33

## 研究誌要

「真實」的傳遞或複製：臺灣媒體在俄烏衝突的角色扮演.....趙怡雯/57

## 新苗星火

在川普時代回顧《虐殺器官》：兼論伊藤計劃眼中的世界體系...黃彥儒/89

## 書評

被《推力》趨動的人.....羅尹悅、洪靖/113

## 稿約

稿約詳情請見 <http://twmedia.org/archives/502>

· 傳播 文化 與政治 · 第十六期  
2022 年 12 月

## 編輯室報告：

2019 年-2022 年人類社會生活籠罩於 COVID-19，所引發的全球大流行疫情中。截至 2023 年 12 月 16 日，全球已累計 772,385,305 例確診病例，其中逾 6,987,209 人死亡，病死率約為 2.09%，是人類歷史上大規模流行病之一。2023 年 5 月 5 日，世界衛生組織總幹事譚德塞在發布會上宣布，COVID-19 疫情不再構成國際關注的突發公共衛生事件，世界各國為了經濟發展，紛紛解封。

然這次疫情導致嚴重的全球性的社會和經濟混亂，被視為人類自第二次世界大戰以來面臨的最嚴峻危機，並使全球經濟陷入自從 1930 年代的大蕭條以來最大的衰退危機。

但人類的哀歌，除了疫情，尚有因種族、地域與國際政治角力下的戰爭。2021 年至 2022 年間，俄羅斯不斷向烏克蘭邊境增兵，雙方劍拔弩張，引發危機。2022 年 2 月 24 日俄羅斯更對烏克蘭發動全面入侵，造成繼第二次世界大戰後歐洲最大規模的戰爭。戰爭導致了難民危機和數萬人死亡。2023 年 10 月 7 日哈馬斯武裝份子於在加薩走廊向以色列發射數千枚火箭，發動大規模地面突襲，突破以軍重兵防守的隔離牆，導致以國境內 900 多人死亡。以色列隨即向哈馬斯宣戰。

根據哈瑪斯衛生部，以色列的轟炸已將加薩（Gaza）大部分地區夷為廢墟，造成超過 1 萬 8400 人喪命，且絕大多數是婦女及兒童，並對道路、學校和醫院造成「前所未有」的破壞。

面對重大的國家社會問題，如何透過媒體再現，呈現多元，應該是民主政治基本素養。然以台灣近年來的媒體生態，我們發現由於政治力與經濟力介入，媒體對於國家政策作為與不作為，報導呈現偏誤。與解嚴前，就本質來說，進步有限，令人唏噓。

是以本期一般論文中，由吳紫瑀所撰之〈「政治、科技與兩岸關係：2016-2022 傳播「政策」報導與評論之分析」〉乙文，研究發現：「三報對「兩

岸關係」從而對朝野政黨的「政治立場」，影響其呈現最稱明顯，然而媒體個別企業本身的利益會在必要之時發揮重要性」，可謂十分寫實。

由林淳華所撰之〈陳映真小說的左翼實踐和《人間》工作者的社會實踐〉乙文，分析發現：「陳映真小說中主角多半是出身高社經家庭，選擇的職業也符合主流社會期待，但是其工作內容往往和一般人對此職業的高收入、良好的工作環境想像有所距離。即使是女性的角色，也非傳統的賢妻良母形象，而是想要照顧白色恐怖受害家屬的蔡千惠和葉春美，還有組織工會的小文。如同作者所言：這是陳映真小說中主角的左翼實踐。另外，左翼實踐也不見得是崇高理想主義的實踐，或許只是改變自己、關心他人的小小舉動」。在那戒嚴時代中，道出了左翼工作者如何突圍的內心想望，讀來令人動容。

本期研究誌要，是由趙怡雯所撰之〈「真實」的傳遞或複製：臺灣媒體在俄烏衝突的角色扮演〉，該研究：「以克里米亞公投及北溪天然氣管爆炸案此二事件為研究案例，透過不同媒體的論述報導，尤其關切臺灣的消息來源與訊息採納，發現無論是質報、電視新聞或是網路原生媒體，對於上述訊息的揭露幾乎無條件地採納英、美等主流媒體觀點，如遇不同觀點之報導則以選擇或迴避的方式來呈現」。該發現實證了媒體的主流觀點與偏誤，

本期新苗星火中，是由黃彥儒所撰〈在川普時代回顧《虐殺器官》〉乙文，該文對伊藤計劃的《虐殺器官》提出一種政治性的解讀方式：「『屠殺文法』隱喻了本質主義的族群認同和民主政體的結合，給第三世界新興民主國家帶來的族群衝突風險；而屠殺文法反噬美國的結局則預示了川普時代身分政治撕裂美國的現況」。讀來另人驚慄，然如何改變？顯然仍舊悲觀。

本期書評，是由羅尹悅、洪靖兩位老師合撰，討論 2022 年由理查·塞勒（Richard H. Thaler）、凱斯·桑思坦（Cass R. Sunstein）出版之〈推力：每個人都可以影響別人、改善決策，做人生的選擇設計師〉一書。透過該文主題〈被《推力》趨動的人〉，討論：「在資訊爆炸，訊息的真實性介在一個真偽之間的灰色地帶時，除了直接打擊、法辦明確是不實訊息和認知作戰之外，如何運用推力來提高人們選擇真實新聞的選擇機會，同時不侵害新聞與言論自由，可能會是一個值得探討的議題。然而，窘境是當前的生活存在著各式各樣的推力，演算法的推力和網軍的操作，讓各方政治力，以及資本力

具有操縱公共輿論的可能性；演算法的推薦和網軍的消息傳播，使人們更容易接觸到與自身立場相符的訊息內容，強化偏見，減少社會的對話和理解，也加劇社會分化。一次又一次的輕推，把人推向極化的端點，造成公民社會的裂解」，該討論值得深思。

《傳播文化與政治》編輯委員會

2023年12月17日

· 傳播 文化 與政治 · 第十八期  
2023 年 12 月



# 政治、科技與兩岸關係： 2016-2022 傳播「政策」報導與評論之分析

吳紫瑀\*

## 本文引用格式

吳紫瑀（2023）。〈「政治、科技與兩岸關係：2016-2022 傳播「政策」報導與評論之分析〉，《傳播、文化與政治》，18:1-31

---

投稿日期：2023 年 5 月 12 日；通過日期：2023 年 8 月 10 日。

\* 吳紫瑀為政治大學傳播碩士學位學程學生，e-mail: 109464014@g.nccu.edu.tw

## 《摘要》

本研究從政治、科技與兩岸關係的面向，分析《中國時報》、《聯合報》與《自由時報》，揭露它們報導與評論傳播「政策」(2016-2022)的異同，探索其原因，特別提示它們未能再現的部分。

納入分析的「政策」議題有七：文策院與國際影音平台的創設、OTT 與愛奇藝(不)納管、公視董事改選、新聞議價法，以及數位中介服務法。三報都支持創設文策院與新聞議價法，在另五項政策議題中，三報對「兩岸關係」從而對朝野政黨的「政治立場」，影響其呈現最稱明顯，然而媒體個別企業本身的利益會在必要之時發揮重要性。

媒體呈現七項傳播「政策」議題時，「政治」面主要談及政府的作為與不作為，「科技」面多討論立法方向與草案條文，「兩岸關係」面隨三報的立場差異而生。最常消失在報端的議題，是相關政策必然涉及的經費高低及其來源的討論或建言，報界或影視界的困境也因黨政立場的差異而遭淹沒或淡化。

**關鍵詞**：傳播「政策」、兩岸關係、宣傳模式

## 壹、緣起

2022 年 8 月中旬，PTT 法律顧問許哲仁在公開說明會上形容《數位中介服務法》草案若納管非營利組織，形同「同命令 PPT 關站」（馬瑞璿，2022 年 8 月 19 日）。其後數日，《聯合報》與《中國時報》皆花大篇幅對草案條文進行報導與評論，報導數量分別為《自由時報》的兩倍與三倍，且多以 A1 或 A2 版處理相關新聞；相較之下，《自由時報》不僅呈現的內容較少，也將質疑的焦點從其他媒體擔憂草案恐會壓縮言論自由，轉為批評未提及新聞分潤。

言論自由與新聞自由是所有傳媒得以暢所欲言的基本條件，按理各家傳媒因擁有共同利益，對相關事件或法案的評價內涵，應是相似之處多於差異。然而，何以前述三家報紙對《數位中介服務法》草案的報導與評論，出現質與量上的差別？又該如何評估這些差別的意義或重要性？

同樣重要或說更為重要的是，有沒有哪些傳媒理當披露，但卻被其予以淡化處理或三緘其口的內容？本文認同 Paul Lazarsfeld 的看法，他在〈論行政與批判的傳播研究〉一文中指出：「在傳播效果的研究中，不管使用多好的方法，我們都只能研究流通在外的廣播節目或印刷材料的影響。批判研究則對那些永遠無法進入大眾傳播渠道的材料格外關注：包含什麼想法在接觸到達大眾前即被扼殺，是因為它們無法吸引大部分人的興趣，還是因為它們不符合媒體的投資效益，或者只是因為欠缺呈現的形式(1941, p.14)？」1948 年，Lazarsfeld 在與 Robert Merton 合著的〈大眾傳播、大眾品味與有組織的社會行動〉一文中，再度強調「大眾傳播媒介對閱聽人產生影響不僅是因為它傳播了某些內容，而且更重要的是因為它對另一些內容不加以傳播...這也間接但有效地限制真正批判性觀點的有力發展(Lazarsfeld & Merton, 1948, p. 240)。」

由於《數位中介服務法》草案尚未進入審議階段，就在公開說明會中因為引發物議，旋即由行政院長蘇貞昌下令暫緩草案的研擬與說明，從而致使該草案無從出門，即胎死 NCC。

若該案在公開說明會後，繼續舉行預定的公聽會及其他程序，是否會有

其他聲音出現？是否三報會因該案涉及傳媒本身的利益，因此在其他議題的立場差異會在這個草案中消失或減輕？國人已經無法得知，但傳媒如何呈現與本身有關的事件或議題仍然值得研究。

這篇論文欲以廣義的「傳播政策」為核心，探究民進黨首次掌握行政權與立法權，即自 2016 年 5 月 20 日至 2022 年 9 月 30 日的六年四個多月間，以出現在《中國時報》、《聯合報》與《自由時報》三家綜合性報紙的相關報導與評論為研究對象，簡單紀錄其呈現，並在確認與描述三報的「異同」後，重點為探究有哪些部分不會被凸顯，並進一步試圖解釋三報傳達傳播政策議題之異同的原因。

## 貳、研究設計與方法

一般而言，傳播政策指涉的是政策對於整個傳播領域的影響，在處理當代對於傳播系統結構與組織從過去、現在到未來的廣泛關注（Papathanassopoulos & Negrine, 2010, pp. 3-5）。在 2016 至 2022 的六年四個多月期間，固然發生眾多醒目的傳播議題，但並非全是由公權力主動規劃，或是透過政府行政、立法與其他方式介入而凸顯其重要性，甚至，另有少部分與前述意義下的政策未有關聯。因此，本文特別將政策一詞放入引號而成「政策」，並盡量窮盡整理這六年多來，在台灣已經出現的、且比較重要的新聞與傳播議題，如下表一所示。

表一：2016-2022 年民進黨政府的傳播「政策」

「政策」	國會頻道	OTT 納管	假訊息、假新聞
	媒體多元發展基金	愛奇藝是否納管	NCC 主委下台
	電影票房透明	新聞議價法	中天換照
	文策院創設	數發部創設	鏡電視申設
	國際影音平台	數位中介服務法	華視跑馬燈誤植
	公視董事改選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

本文根據三個原則，從表一的十六個議題中，挑選七個作為分析對象：第一，該項議題由政府主動提出與推進，完全符合「政策」的原意；其次，政府公開資訊過少者，不予分析；最後，媒體討論頻次較低的個案，也予以排除。經過這樣的篩選，實際進行分析的議題如下表二所示，而本研究又依照其「政策」主要涉及的面向，將七個議題分成「政治」、「科技」與「兩岸關係」三類。

確實，以常識來講，「政治」是最上位的概念，涵蓋廣泛，這裡的「科技」與「兩岸關係」類目其實也無法脫離「政治」的意涵，為若使三者混同，恐會失去該類議題在「政治」概念中的（相對）特徵。因此，表二本於這個考慮，有此三分，並依序簡要說明如後。

表二：七個「政策」議題的特別意涵

欲分析的「政策」				
特 別 意 涵	政治	文策院創設	國際影音平台	公視董事改選
	科技	新聞議價法	數位中介服務法	
	兩岸關係	OTT 納管	愛奇藝是否納管	

政府是公共權威，具有可以將顯著的公共問題轉化為適當政策承諾的能力，也有改變社會議程的義務，而不一定只停留在變遷倡導的位置（張明貴譯，2005）。然而，國家機器不是決定或主導國家發展的唯一來源，傳播事業與民眾是否覺醒並發揮力量，對於傳播事業發展的新方向也會產生作用。有此認知後，學者依然同意，在探討民主傳播制度能否建立及是否與時俱進時，政府有無適切的傳播政策、及有無徹底執行的決心，仍然是最大的關鍵（李瞻、祝基滢，1986年8月30日）。商業資本控制媒體由來已久且至今不歇，難以通過傳播界自律得到糾正，因此，改造政府的性質及其效能，反思及重構傳播政策，進一步探討國家該如何介入傳播領域、能夠扮演什麼角色、能有哪些作為之重要性不言而喻。

事實上，新聞傳播「內容」的供輸，是相當典型「市場失靈」的案例。

假使欲求傳媒能夠提高影音圖文的質量，良善達成傳媒給予閱聽眾「資訊、教育與娛樂」的功能，勢必有賴公權力有效與穩定的介入（Baker, 2002／馮建三譯，2008）。

除了市場失靈以外，傳播政策必須變革的主因起於資本驅動下的科技演進。科技之發展引領了傳播方式的改變，許多技術創造的目的到最後往往被證明與他們的使用方式截然不同，也進而帶來許多經濟、社會與文化層面上的問題。在假訊息肆虐，社會對立且被分化，不同政治傾向的人相互不信任的今日，新聞產業賴以維生的廣告收入被大型平台襲奪恐致民主體制被摧毀，又在面對強勢文化輸出國的影響且我國內容產業面臨投資不足的景況時…，這種種的問題都顯示了政府亟欲以有效規範介入新的媒體平台與傳播科技，亦須透過制定傳播政策的方式來重建本地的文化自信，但又不得因管制而傷害正在萌芽的發展。

包括新聞傳播在內，因為兩岸關係而衍生的議題是我國獨有，或者，即便見諸他國，也無法與國人的感受比擬。台灣的政經格局自 1980 年代以來明顯轉型，帶來兩個主要的變化：頻繁的、各層次的選舉，而非公共議題本身，主導實際的政治運作議題和時程，此外，族群／統獨政治和動員對於選舉及其議題的牽引有更大的影響力。二者相乘，致使傳媒如同很多公共政策，淪為台灣政黨政治的次級議題和鬥爭場域（魏玓、林麗雲，2012，頁 21-22）。過去數十年來，兩岸在經濟、社會交往面向上往來頻繁，雙方的關係卻會隨執政當局的兩岸政策而變化。民進黨蔡英文在 2016 年當選總統後，美國對華政策也在轉變，使兩岸關係迥異於先前八年，進而造成新聞傳播在內的多種政策議題，受到這個新情勢的影響。

綜上所述，本文將蒐集七個分析議題的相關報導與評論，並透過論述分析法，分別從政治、科技與兩岸關係三個面向進行探討。

## 參、研究發現

### 一、政治面向分析

#### （一）文策院創設

文策院創設這個議題的報導樣本觀察時間範圍起自 2018 年 3 月 8 日，行政院通過文化部提出的《文化內容策進院設置條例》草案之後一日，至 2022 年 6 月 30 日止。相關報導樣本總數為 125 則，以《聯合報》所報導的數量最少，篇幅也相對較短，版次的部分則是《自由時報》的部分較為靠後，過半內容是出現在 B 或 D 的藝術文化版。三報與新聞屬性之交叉分析如下表三所示。

表三：文策院創設之三報與新聞屬性交叉分析（2018/3/8-2022/6/30）

	純淨新聞	社論	記者評論	外稿評論	總和
中國時報	41	0	1	2	44
聯合報	25	0	1	5	31
自由時報	48	0	1	1	50
總和	114	0	3	8	125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

在相關報導中，有近三成的內容主要是與文策院舉辦、資助活動，或帶領、協助業者參展有關，透過個案的形式，呈現出文策院執行了哪些事項，可能對產業帶來哪些幫助。在這之中，又以《自由時報》有最多這類的內容，《中國時報》次之；三報所報導的內容中，也有近一成的報導是把創立文策院當成鄭麗君擔任文化部長期間的政績，暗示文策院的設立將對文化界帶來正向影響，但報導中並未深入討論或評述文策院的功能，僅點到為止。

也就是說，三報在這個議題上，由於選擇呈現的消息來源多為政府官員與較大型的傳媒相關企業，因此，塑造並傳達出的內容以文策院將會對於文化內容產業帶來助益為主，包含將統籌政府的資金建立與民間共同投資的模式、將投融資體系制度建構的更完整以催生產業生態系，亦協助開發台灣原生內容，並媒合製作端與國際合作，既拓展全球鏈結也開拓海外市場，此外，也將導入 AR、VR 等技術應用，並協助建立出版、流行音樂、電影等作品的 IP 資料庫等。

當然，報導也有提及各種面臨及可能出現的問題，像是資源分配不均、

國內與國外市場的先後順序和決策者的作為與選任等，三報最大的差異則源自對於文策院創設原因的解釋。當時，《自由時報》點出文策院是作為中國拉攏台灣影視界的因應措施，《聯合報》指出業者批評其乃政府規畫已久的政策，反觀《中國時報》則未談這段背景。

相關報導沒有明說的部分是，若是以為創設了仿自南韓的文策院，即可跟南韓在文化內容創意產業上有著相同的發展路徑可是大錯特錯。南韓在文化內容產業的運作中，還有許多行政法人、財團法人及民間自組的社團法人，這些中介組織扮演將政府資源橋接到民間產業的中介者，是協調不同角色之間的重要橋梁；反觀台灣，因為缺乏中介組織網絡，常使政府與民間的供需錯置，導致政策無法落實民間或資源分配不均（郭秋雯，2017）。

更有甚者，錢也很重要。錢在文策院創設這個議題裡，只有一開始談到有 100 億國發基金投資額度，和當執行率太低，文化部欲刪減隔年度預算時才會被提起。然而，除了對於影視文創產業相當重要的，如各種租稅減免、市場優先准入等公共補貼政策未被談及之外，南韓自 1999 年金大中政府時期，即開始實施文化部門預算為國家總預算 1% 的政策，雖中間經歷盧武鉉與李明博政府時期有所調降，但朴槿惠上台後，則是兩度提高預算，2017 年文化預算更擴大到總預算的 2%（郭秋雯，2017）。反觀台灣，雖前總統陳水扁與馬英九皆曾承諾要提高文化預算至總預算的 2% 與 4%（陳水扁總統競選指揮中心國家藍圖委員會，2000，頁 105；表演團體訴苦 馬：文化預算 4%，2008 年 2 月 23 日），然而，文化預算卻總是被排擠，儘管 2023 年實際的文化預算相較 2022 年成長 20%，總計達 212.2 億元，卻也只占總預算的 0.7%（加上前瞻預算也僅占總預算的 0.8%，文化部，2022 年 8 月 25 日），若以南韓預算規模為準，應該有 550 億左右。

更不要提南韓還有歷史悠久的廣電發展基金。自 1981 年起，南韓就從無線電視取 6% 的廣告收入（非盈餘），隨著科技形式的變化，後也將衛星電視與有線電視業者廣告銷售額之 6%，和以特別商品呈現與銷售編排之節目（如購物頻道）當年度交易利潤之 15% 併入，用以支持傳播產業發展、落實廣電事業的公益性質，並促進傳播權（林麗雲，2011；馮建三，2012 年 2 月 15 日）。單是以 2005 年的資料為準，光是無線、衛星與有線電視該年度廣告銷售額的 6% 大約是 2100 億韓元（約 50 至 70 多億台幣），而同年台灣 4 家



無線電視總廣告收入是 43.5 億元（馮建三、翁秀琪、羅世宏、魏玓、程宗明，2008，頁 104）。

鑒於廣電發展基金起的良性示範，其他像是文化、電影與動畫發展基金等，無不效仿其而出現，另，南韓還有兩大公廣機構 KBS 和 MBC。未被提到的還包括許多國家並未有文策院這類組織，但都有強大的公共廣電體系，在市場競爭中脫穎而出，進而對整體影視音產業帶來好處。

## （二）國際影音平台

國際影音平台（109 年發展國際傳播數位計畫）這個議題起自 2020 年 7 月 22 日，由時任公視董事爆出公視將接受文化部委託執行國際影音平台一案後兩日，至 2022 年 8 月 18 日，NCC 宣布核准公視受核配頻段新增 Taiwan Plus 服務之隔日止。相關報導樣本總數為 118 則，以《自由時報》報導的篇幅最小，版次也較為靠後，有近六成的內容是出現在 B 或 D 的藝術文化版。三報與新聞屬性之交叉分析如下表四所示。

表四：國際影音平台之三報與新聞屬性交叉分析（2020/7/15-2022/8/18）

	純淨 新聞	社論	黑白集	記者 評論	外稿 評論	總和
中國時報	27	1	0	4	5	37
聯合報	42	2	3	9	4	60
自由時報	18	0	0	2	1	21
總和	87	3	3	15	10	118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

2020 年 7 月，公視承接文化部國際影音平台委託案因程序不正義而開始躍上新聞版面。《自由時報》報導篇幅最小的原因可能是三報當中，該報最為支持政府的政策，因而選擇將批評的火力轉向複雜的人事角力上，而後續的報導多僅是描述事件本身進展；相較之下，《中國時報》與《聯合報》則是放大在野黨與學界的質疑與擔憂，在議題爆發時全力抨擊政府的作為，

包括程序問題與擔心恐有政治黑手介入公視。這些批評之外，另涉以下質疑，包括：法源、民進黨是否以自己而不是台灣的觀點推動外宣、董事看守期間能否做重大決策、預算來自一般用在緊急狀況的第二預備金、作為副業的國際影音平台預算超過公視本業是否合理等。當國際影音平台由中央社承接，甚至又轉回給公視時，雖聲量變小，但質疑依舊，也有刊登部分論者針對平台的設立與向國際發聲之間相關性的討論。

若以報導的數量作為重要程度的評判，可以發現在國際影音平台前導計畫欲委託給公視前，也就是在創設的過程中，當時各種的質疑與黑函是最為被媒體放大凸顯的。雖兜兜轉轉在經過一年多後，國際影音平台的經營權從中央社又交回到公視的身上，前述的質疑實際上仍未解決，但當初各種針對公視的討論好似都消失了。這或許是因為傳播媒體的相關新聞並非由專線記者進行報導，許多爭議或問題僅在後續有又有相關問題傳出時被討論，若沒有消息來源提供新的資訊，記者並不會主動且持續的提出問題，作為推進此議題的有力第四權角色。

在這個議題上，相關報導沒說或僅被點到為止的部分，包括在《公視法》中，公視基金會的業務未包含國際傳播服務，因此亟待修法。此外，不要選擇用委託案，而是應用編列預算的形式辦理，給予公視自由營運的空間，更是在法制上可以做到的。而當談及「副業的預算超過本業」時，隱藏在其中的，是呼籲政府應透過修法擴大捐贈公視經費的額度。

如前部分論者所述，國際影音平台的成立與能否增加本國的外在能見度，和讓外國人了解台灣並沒有必然的關係。現階段更為重要的應是在三報 118 則相關報導中，僅一則記者評論以不到百字所言「國家媒體政策大方向、公廣集團定位…更是值得關注的重點（陳宛茜，2021 年 4 月 2 日）」。我國的影音內容產業在資本推動數位影音的匯流時代能有怎樣的成效，亟須仰賴政府推出相關振興扶持政策。更有甚者，三報的相關報導亦未提及，南韓在開放私人資本時，是因為公有廣電體制在光州事件得到擴大，該民主化後，體制並未丕變，而是在公權力和社會與該體制的互動下，逐步調整。反觀我國，公廣遲至上個世紀末才誕生，不成公廣體制，加上政府無心，社會動能不足，使得公視無法對於整體影視產業的正向發展提供足夠資源。可能是外在環境使然，記者在報導國際影音平台這個議題時，也就比較難以看到這些

更為根本的問題。

### （三）公視董事改選

公視董事改選這個議題的報導樣本觀察時間範圍為 2019 年 9 月 9 日，第七屆公視董監事召開第一次審查會議，至 2022 年 5 月 26 日，即第七屆公視董事首次召開董事會的一周後止。相關報導樣本總數為 133 則，其中以《自由時報》報導的篇幅最小，版次也比較靠後，有三成的內容是刊登於 B 或 D 版。三報與新聞屬性之交叉分析如下表五所示。

表五：公視董事改選之三報與新聞屬性交叉分析（2019/9/9-2022/5/26）

	純淨 新聞	社論	黑白集	記者 評論	外稿 評論	總和
中國時報	33	0	0	7	7	47
聯合報	43	2	1	9	8	63
自由時報	15	0	0	1	7	23
總和	91	2	1	17	22	133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

《自由時報》在這個議題上以談論審查會議經過與結果為主，相較之下，《中國時報》與《聯合報》也有將在此期間提出之《公共電視法》修正案設定為議題，報導較多國民黨籍政治人物對於修正案的意見，主要批評集中在公視董監事同意權門檻的調降與公視董事長由行政院長提名，反之，支持修法的意見則較少被提及；而在《自由時報》少部分與修法相關的內容中，是呈現贊成修法的立場，並強調其必要性。

在整個討論過程中，最主要圍繞的核心是擔憂政府與公視的臂距之遙是否會被破壞，公視的獨立性備受重視，然而，討論的層次卻多只停留在國、民兩黨互相批判對方的黑手欲介入公視這個層次，在對抗的過程中，無疑傷害了公視的形象。

而在消息來源的引述上，三報皆以相關的官員、董事、政治人物與學者作為主要的資訊來源，然而，對於不同黨派的人士有著不同的呈現。《自由時報》引用了國民黨與民進黨人士的言論 4 與 3 次，相較《中國時報》和《聯合報》分別引述了 14 與 6 次和 22 與 10 次，也就是說，光從《中國時報》和《聯合報》引用較多國民黨立委的話語即反應出三報在這個議題上或許抱持的是不同的態度與立場。而又，立場較傾民進黨的《自由時報》對於由政府或民進黨立委所提出的法案會較為支持，會將政府的怠惰與不作為轉化為批評在野黨的不合作；反觀《中國時報》和《聯合報》在一定程度上信任他們的消息來源，甚或在不甚了解公視的運作與理念下，延續消息來源設定的論調與議題大作文章，以顯現其作為社會公器對政府進行的監督與質疑。

當各界在爭論公視董監事同意權門檻是否該降低時，現行由所謂「社會公正人士」進行票選的程序是否真能公平、公正、公開則無人談及，僅有《聯合報》一篇外稿評論中描述「第四屆公視董監事審查委員會，政黨推薦的若干審查委員，開會時無心議程內容，專注接聽黨政人士的電話指示…出現候選人在各輪得票不盡相同現象…（張鷹，2022 年 4 月 28 日）」。近年來公視董監事審查會議雖開放線上直播，然而審查委員看似對於候選人也不甚了解，部分審查委員表現得如同橡皮圖章一般，貌似只是為了完成選出新任董監事這個任務而出席。

進一步言，社會大眾真的都認同經由這個流程所選出來的董事人選就足以代表公共電視具有公共性嗎？這個問題也並沒有被討論。屬於內閣制的日本在選任 NHK 的董事時，是由總務省提名，國會通過，因此在野黨在其中並沒有太大的影響力，但日本民眾依舊最信任 NHK，這是否代表民眾認為公視具有政治獨立性與公視董事選任的過程或許沒有太大的關聯（丘忠融，2013 年 6 月 27 日）？我國在野黨對於名單與程序的指控，都只是政治操作罷了。

更有甚者，我國需面對的現實問題是，過往因高門檻的設計導致公視董監事曾三度延任，顯示我國公視董監事的選任過程亟欲修正，文化部應負起責任，全力推動，不然恐讓人懷疑修法進程緩慢是文化部要藉此將董事會難以組成的原因歸於法律的限制，而非文化部的怠惰。

在修法的部分，除了調降董事人數、降低同意門檻、董事長在提名時已

指定而非由董事互選等在修法過程中有諸多討論的，甚至還應思考包括僅有董事長是有給職，其餘董事都是無給職在匯流時代是否適當。或可學習英國 BBC 與日本 NHK 的作法，除董事長外，在十餘位董事中，加入數位每周作一到四日不等的兼任董事，以因應新時代的需要。

而在《公視法》修正的部分，各方皆未提及第一條有關定位的部分是「彌補商業電視之不足」，乃把公視格局坐小了（馮建三，2020年6月29日），並應擴大政府編列捐贈予公視的預算。

## 二、科技面向分析

### （一）新聞議價法

新聞議價法這個議題的報導樣本觀察時間範圍為 2021 年 2 月 19 日，三報報導澳洲眾議院通過《新聞媒體與數位平台強制議價法》後，臉書以屏蔽澳洲媒體作為反擊的新聞，至 2022 年 9 月 17 日，有相關新聞報導前一日台大新聞所在「新聞產業與平台責任」論壇上，發表平面新聞業消費市場萎縮、廣告營收衰退等調查結果為止。相關報導樣本總數為 90 則，以《自由時報》所報導的篇數最多，整體而言篇幅最大。三報與新聞屬性之交叉分析如下表六所示。

表六：新聞議價法之三報與新聞屬性交叉分析（2021/2/19-2022/9/17）

	純淨新聞	社論	記者評論	外稿評論	總和
中國時報	8	2	0	4	14
聯合報	26	1	2	5	34
自由時報	35	1	0	6	42
總和	69	4	2	15	90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

由於這個議題與各黨派政治勢力的牽扯較無關聯，主要的內容聚焦在

數位平台應該為使用新聞付費，又「新聞有價」乃各界的共識，因此，儘管三報在陳述時會有些微批判力度的強弱差異，但三報對於這個議題的內容與報導論調有著近似的呈現，其中，又以《自由時報》對於相關內容報導得最為詳細。

在此之中，三報最大的差異源自於社論內容——《中國時報》著重在批判政府消極的表現，且忽視媒體的生存危機；《聯合報》順應當時媒體公協會的立場認為基金會模式不可行，並點出政府的責任；《自由時報》闡述支持媒體議價的背後是擔憂數位平台若缺乏規範，將導致假訊息流竄進而混亂社會、衝擊民主，有危害國安的疑慮。也就是說，在這個議題上可以明顯看出，儘管是社會有共識，因此數位巨頭和推諉卸責的政府成為了箭靶，但只要牽涉到意識形態，三報就會有不同的表現。

而在樣本蒐集期間，三報討論的層次多只停留在數位平台應與新聞媒體分潤，而最常被點出的是澳洲的議價模式，即政府應立法要求數位平台與新聞媒體議價協商。這或許與相較雜誌或電視媒體，三報以議價方式能夠獲得更多分潤有關。然而，台灣與澳洲媒體生態的不同是被忽略不談的。澳洲新聞業集中化的程度很高，少數媒體大亨在澳洲擁有極大的影響力，目前大型媒體包括新聞集團（News Corp）、九號娛樂（Nine Entertainment）、七西傳媒（Seven West Media）、ABC 及衛報澳洲版等皆已與兩大數位平台達成協議，可該法通過一年多以來，數位平台仍未與規模較小的新聞媒體協商，協商後願意支付金額的多寡也缺乏明確標準，亦未被公開。

因此，若是要求數位平台為新聞內容付費，或許只能夠讓市場規模較大的媒體獲得一部分財務補償。這種對大型媒體有利，且讓平台有優勢的論點很少被提起。

此外，只有一篇外稿評論談及，雖無法得知澳洲傳媒得自兩大平台的確切分潤金額與方式，但據外界估算，目前 Google 與 Meta 兩大平台給予該國傳媒的分潤僅占數位廣告總額的 1%。若比照澳洲，台灣 2021 年數位廣告總額達 544.3 億元，也就是說我國新聞界可望獲得 5.4 億元的分潤，相較於 1996 年報紙媒體的廣告量約達 110 億元，不僅一點也不多，若再加上考量我國新聞業壟斷情況遠低於澳洲而議價能力較弱，那麼，可望獲得的金額會再更少。

除了議價這個方法外，在三報 90 篇相關報導中，有 6 篇談到可以透過

向數位巨頭課徵數位廣告稅，如引述「建議對谷歌與臉書課徵百分之五十的數位營收…很公平」；或者，其中一篇延續陳國樑教授對於全球稅改的解釋，說明 OECD 在 2015 年發布「稅基侵蝕及利潤移轉」(Base Erosion and Profit Shifting, BEPS) 十五項行動計畫，其中的第一項行動計畫在 2020 年 10 月提出「兩支柱」(Two Pillars) 架構，第一支柱指出，全球營業額超過 200 億歐元的跨國企業，須提交稅前淨利率超過 10% 的部分利潤，由市場國按營收比例分配之；第二支柱則是提出最低稅負機制，使跨國企業之所得不論位於何處，皆可適用至少 15% 的有效稅率(陳國樑，2021 年 11 月 26 日；陳國樑，2021 年 12 月 30 日；陳國樑，2022 年 7 月 19 日)，惟第一支柱的實施有個前提，乃參與的各國要同時取消數位稅或相類似稅捐的課徵(陳衍任，2022 年 12 月 21 日)，亦即數位稅與第一支柱只能二擇一，歐盟成員國多選擇以開徵數位稅作為暫時性措施。我國雖尚未加入由 OECD 與 G20 組成的包容性架構，但可試著透過個別關稅領域的名義，或間接參與的方式申請加入，並不是完全沒有機會。相較於議價，前述兩種方式可能是能以更大力度振興新聞業的方式。報導相關論述中有談到課稅雖非目前各國的主流作法，但不是主流，不代表我國不可以提出這樣的想像。

再者，拿到錢後，該如何確保這些經費能夠真正投資在實際的新聞產製環境，以提升新聞業的公共服務功能，而非被企業主收入囊中，也是多數報導在論述時會忽略不談的部分。Press Gazette 的報導指出，澳洲媒體、娛樂與藝術聯盟(Media, Entertainment and Arts Alliance) 回顧媒體強制議價準則在該國的實踐，特別提到並不清楚這些透過議價獲得的資金是如何被使用；美國記者公會 Newsguild 的主席 Jon Schleuss 認為《新聞競爭與保護法》草案最主要的問題是「沒有強迫新聞機構的老闆要將從科技巨頭得到的資金重新投資在新聞業上」，目前，他們正積極遊說確保至少 70% 的資金要用在創造與保留就業機會(Maher, January 13, 2023)。這樣的聲音在近期台版媒體議價法的討論中也有被凸顯。在 2023 年 2 月 15 日「數位平台和新聞媒體議價」公聽會上，媒體工會的支持平台付費使用新聞之餘，更呼籲議價過程中應讓勞工參與，並成立鼓勵優質報導的資金(徐子苓，2023 年 2 月 15 日)。

最後，當陷入新聞媒體無法從數位平台獲得應有的分潤這樣的說法時，可能也忽略了商業媒體並不能夠完全滿足閱聽眾的需求，廣告對於新聞媒體

的負面外部性也被掩蓋。更重要的，應是呼籲政府給予更多公共資源，壯大公廣媒體，或是如學者們所提，發放新聞消費券和建立優質新聞業振興基金，才能更好的重振民主社會的監督功能，重建民主社會的公共領域。

以及，在這兩年間，已陸續有國家以侵犯隱私或違反競爭法向數位平台開罰，然而，輿論卻未能敦促政府將這些收入用在振興新聞產業的民主功能上，未來若能有此規劃，勢將對新聞業帶來極大的助益。

## (二) 數位中介服務法

數位中介服務法這個議題的報導樣本觀察時間範圍起自 2022 年 6 月 30 日，NCC 提出《數位中介服務法》草案後，至 2022 年 9 月 28 日止。相關報導樣本總數為 135 則，其中以《自由時報》報導的篇幅最少，每篇長度最短，版次也較為靠後。三報與新聞屬性之交叉分析如下表七所示。

表七：數位中介服務法之三報與新聞屬性交叉分析（2022/6/30-9/28）

	純淨 新聞	社論	《聯》 黑白集	《中》 時評	記者 評論	外稿 評論	總和
中國時報	36	4	0	3	6	12	61
聯合報	30	2	1	0	9	12	54
自由時報	13	0	0	0	1	6	20
總和	79	6	1	3	16	30	135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

三報在這個議題上以評論草案的條文為主。《中國時報》與《聯合報》的相關報導批評草案恐會箝制言論自由，聚焦在質疑第 18 條的資訊限制令與第九章關於專責機構的設立，以及要求業者透過下架等手段管理違法內容、法院或行政機關得調取數位中介服務提供者保存的特定使用者資料等；而對比之下，《自由時報》雖也有呈現公開說明會上業者對於草案的疑慮，及呈現少部分國民黨籍人士的批評，但並非如同其他媒體所呈現的草案引發



眾怒的程度，而更是將批評的焦點轉到草案缺乏新聞分潤的規範與未有經濟管制，外稿評論的部分則是正面看待此草案，相當認同其存在的必要性。

報導三場公開說明會時，三報以相關業者與專家學者作為主要引述的消息來源，在輿論發酵期間，NCC 人員及政治人物的發言也經常得到引用。《中國時報》、《聯合報》和《自由時報》分別引述國民黨與民進黨籍政治人物的聲音共 34 與 8 次、16 與 7 次，和 4 與 2 次。就本例來說，執政的民進黨聲音小了很多，這可能是 NCC 與政府似乎理虧，民進黨人也不否認，比較難以辯護，於是選擇少或不發言。這個觀察也符合當民進黨政策有失時，《自由時報》往往選擇以少篇幅報導的方式處理，形同減少暴露政府之失，允稱一種黨派傾向的展現。是以，在此議題上雖三報都出現執政黨發言機會少過在野黨，因而可以理解為三報的政治立場沒能完全解釋其再現該議題的差異，但不妨說這仍然是三報對執政黨立場的某種反映。再者，這個類型的表現，亦即不同立場的報社都負面呈現傳媒政策，有沒有可能是因為三報對於該草案涉及的言論與新聞自由問題，都理解不足，致使很多西方國家早就在實施與該法內涵接近或相同的法律時，我國都無法責成主管機關 NCC 提出，在得到行政院的支持後送入立法院審議。更進一步言，是否，我國政府亦如三報在內的主要傳媒，對於新聞自由與傳播政策的關係，理解並不完整，乃至有誤解？這些都是亟待探索與解答的問題。

從這個議題也可以看出，或許是政府不受信任在先，然當箝制言論自由已與《數位中介服務法》草案畫上等號，各界爭論紛紛，目前關於詐騙頻傳、性私密影像流竄等問題並沒有消失，卻已被爭取言論自由的呼聲遮蔽。網路世界如同實體世界一般，都須被管制，數位巨頭應承擔起相應的責任。參考其他國家的作法並非不妥當，惟仍須考慮我國產業發展現況，做出相應的調整，且在與業者溝通過後，再行推出。

### 三、兩岸關係面向分析

#### （一）OTT 納管

OTT 納管這個議題的報導樣本觀察時間範圍為 2020 年 7 月 15 日，相關新聞提及《網際網路視聽服務管理法》草案即將公開，至 2022 年 6 月 15

日。相關報導樣本總數為 33 則，其中以《自由時報》報導的篇幅最小，版次也較為靠後。三報與新聞屬性之交叉分析如下表八所示。

表八：OTT 納管之三報與新聞屬性交叉分析（2020/7/15-2022/6/15）

	純淨新聞	社論	記者評論	外稿評論	總和
中國時報	9	2	0	5	16
聯合報	9	1	0	1	11
自由時報	6	0	0	0	6
總和	24	3	0	6	33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

在這個議題上，三報以呈現各界對於《網際網路視聽服務管理法》草案的意見為主，主要聚焦討論條文本身，以《自由時報》的批判力度最弱，也有呈現支持草案的聲音；對比之下，《中國時報》與《聯合報》對草案條文的檢討聲音較大，在草案剛推出時，主要討論集中在業者認為公開資料涉及營業機密、條文以懲罰為主，扶植鼓勵性質較少，且將使用者分享平台納入列管是否合理、在數位匯流時代對廣電媒體和新興媒體以不同的力度管制是否合適等。

2020 年 12 月，距離草案討論高峰和公聽會過去 3 個多月，《中國時報》與《聯合報》又有相關報導刊出：《中國時報》質疑此草案第 13 條，認為「網際網路視聽服務事業所提供之服務內容不得有...經相關主管機關認定妨害國家安全」，乃民進黨欲進一步箝制言論與新聞自由；《聯合報》則是聚焦在探討草案未來是否會修正及提出可能的修正方向。

兩報再次對於《網際網路視聽服務管理法》草案進行評論的同時，正巧是中天新聞台因獲不予換照決議而停播之時。加上背景，那麼，似乎就不難理解，與中天新聞台屬於相同集團旗下的《中國時報》會在「涉己事件」上，無限上綱地捍衛自身，從各界最為擔心之言論自由的角度切入，批判並為執政黨貼上危害言論自由的標籤，進而達到討回公道的目的。相較之下《聯合

報》則較為溫和，呈現質疑也客觀而據實的回應。

由前述的分析可以得出，報社本身的政治立場，再次影響消息來源的選擇，自然也就引導媒體報導的走向。與此同時，當個別媒體資本的利益面臨受損時，企業的利益會被放在第一考量順位，優先放大凸顯呈現。

當討論都集中在草案可能產生的問題時，本草案原欲「達成保障公眾視聽權益，及維護本國文化傳播權」等目標，在輔導與獎勵措施中卻未見到詳細的說明，更沒有任何打擊盜版、遏止非法業者的條款，是被遮蓋未談的部分。

而當各界極力呼籲讓跨國平台落地納管，並課以製作本國節目內容義務時，卻未有人談及我國現今尚須面對 OTT 平台過度分散、產業過度競爭的問題，以至於當今天資源不足也不夠集中時，根本不用想要出國競爭，甚至就連吸引本國的觀眾都有一定難度。近期，我國 OTT 業者已在呼籲「台灣 OTT 小而分散，須合作對抗跨國大型業者」（丁奕，2023 年 5 月 5 日）。匯流年代的數位影音政策需要政府積極面對與提出。

而公共補貼也是對於影視文創產業很重要的政策，不管是透過租稅減免、低利或無擔保融資等手段，從源頭的問題開始解決，至為關鍵，不然若本土的影視平台透過買外片壯大平台本身，不僅無法吸引閱聽眾回流欣賞本國作品，也無從解決整體影視產業積弱不振的狀態。

此外，歐盟於 2018 年推出的新版《視聽媒體服務指令》（Audiovisual Media Services Directive, AVMSD）將影片分享平台納入管制，並拉齊線性與非線性媒體的管制強度。洪貞玲（2020 年 9 月 1 日）表示，我國之所以會選擇立法的原因是如果調動既有法規，可能會對既有業者產生相關利害的影響，使業者可能從中試圖影響立法過程，讓立法白忙一場，然統一管制強度仍是我國在未來可以思考的方向。

而郭嫻容（2019，頁 95-97）整理相關材料，指出當時已有法國、德國、葡萄牙等六個國家，依據 AVMSD 另立國內法，針對歐盟以外的串流影視業者，課徵業者年度營業額 0.5-2.5%（多數是 2% 左右）的特別稅，挹注國家影視基金，也有西班牙、法國、義大利、捷克等七個國家，要求隨選服務業者將營業額的 1-5%（法國要求 15-26% 的淨營業額）直接投入歐洲作品的產生。這也是未來我國可以參考的方向。

## (二) 愛奇藝是否納管

愛奇藝是否納管這個議題的報導，選取欲觀察之樣本的時間與 OTT 納管相同，皆自 2020 年 7 月 15 日至 2022 年 6 月 15 日。相關報導樣本總數有 50 則，其中以《聯合報》的相關報導最長，《自由時報》的篇幅最短，當不含外稿評論時，以《中國時報》的內容版次較前。三報與新聞屬性之交叉分析如下表九所示。

表九：愛奇藝是否納管之三報與新聞屬性交叉分析（2020/7/15-2022/6/15）

	純淨新聞	社論	記者評論	外稿評論	總和
中國時報	12	1	2	9	24
聯合報	9	1	1	1	12
自由時報	13	0	0	1	14
總和	34	2	3	11	50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

愛奇藝與騰訊 WeTV 之所以要與其他境外 OTT 平台分開討論，是源自《台灣地區與大陸地區人民關係條例》（簡稱「兩岸人民關係條例」）第 40-1 條第 1 項規定「大陸地區之營利事業或其第三地區投資之營利事業，非經主管機關許可，並在台灣地區設立分公司或辦事處，不得在台從事業務活動」。由於愛奇藝與騰訊 WeTV 皆未取得許可，因此愛奇藝選擇透過香港子公司，並由歐銻銻娛樂以代理的方式在台灣營運，騰訊 WeTV 則是以香港子公司的名義直接在台招募會員。

在 NCC 推出的《網際網路視聽服務管理法》草案中，第 12 與 18 條限制「...相關業者不得對未依台灣地區與大陸地區人民關係條例取得許可之大陸地區網際網路視聽服務提供者或其代理人提供設備或服務，...違反且未改正者得處新台幣五十萬元以上五百萬元以下之罰鍰」。2020 年 8 月 20 日，經濟部修正「在台灣地區從事商業行為禁止事項項目表」，新增唯一的一項：「為大陸地區人民、法人、團體或其他機構代理、經銷網際網路視聽服務，及提供其中間投入服務或相關商業服務」（後被稱為愛奇藝條款，於 9 月 3 日正

式施行)，直接阻擋愛奇藝等大陸影音平台在台從事商業行為。

在這個議題中，《自由時報》的相關內容以支持相關規範為主，稱其為違法業者、因為互惠而不能開放，且在政治、社會與文化上具有敏感性或影響國家安全之虞，若民眾要使用需自行承擔風險。《自由時報》沒說的是，禁止歐銜銜娛樂繼續代理愛奇藝並不能夠解決可能會影響國家安全問題，更為重要的是要增加優質內容的產製；反觀《中國時報》與《聯合報》針對相關規定提出了許多批評與質疑，聚焦在其他社交媒體與影音分享平台沒被納管、拒絕讓歐銜銜代理反而會少了一筆稅收、未來愛奇藝等平台也不再需要購買或投資台灣的影視作品等，認為此命令恐會帶來諸多傷害，亦需擔憂未來大陸會有報復的手段，因此讓愛奇藝落地納管才是更好的處理方式。

在「愛奇藝條款」上路一年後，據文策院「2021年台灣文化內容消費趨勢調查報告」（文化內容策進院，2022年5月）顯示，仍有9.7%的人付費訂閱愛奇藝，與其曾經是跨國影音平台訂閱龍頭的位置相比，雖訂閱人數與比例有極大的下滑，但仍有部分民眾選擇愛奇藝作為其收視影視作品的管道。

與此同時，愛奇藝持續與我國影視業者合作製作影視作品，由其製作且搶先播出的影集《逆局》還奪下第57屆金鐘獎戲劇節目導演獎及男配角獎，顯見愛奇藝在代理商退出後仍持續耕耘台灣市場。

上述簡要闡述愛奇藝台灣代理商終止服務後，愛奇藝與我國閱聽眾和產業間的互動與發展。當初一刀切的行政命令除了滿足政治目的之外，掩耳盜鈴的作法並不代表台灣與大陸的影視互動完全暫停，反而愛奇藝至今仍是部分民眾收看影視內容作品的主要來源。愛奇藝也持續投資，與我國影視業者合作製播作品，而相關作品也多會在 Youtube、臉書等平台上流傳，民眾唾手可得。

劉定基（2020）認為，若是擔心台灣節目為了上大陸平台而自我審查的話，應該關注的是確保台灣節目在大陸平台以外的收視管道，像是禁止大陸平台強迫台灣節目的獨家播映權才應是更直接且合理的作法，而非是採用目前的方式，用非常鸵鳥的心態在面對。

綜上，我國不如讓愛奇藝落地接受管制，並賦予其接受課徵特別捐的義務，以作為其他跨境影音串流業者納管之示範。

更進一步言，台灣與大陸的連結真的有辦法切斷嗎？若不能，為何不乾脆把握現今兩岸關係似有融冰的現象，掌握主動權要求其影視平台落地納管並課予義務，加大力度振興我國內容產業呢？

更別忘了，陳水扁於 1999 年秋首次競選總統期間，曾在其國政藍圖的「傳播篇」寫到：「國家政策是要…使台灣的傳播媒體體制健全，不但在全球競爭環境中自保，並且要在發展之餘，更得餘裕對外展開合作互利的媒體交流計畫，這其中，與中國的傳媒交流亦應該積極進行，但須屏除特定政治意圖或不實的商業企圖」（馮建三，2007）。

## 肆、結論與解釋

本研究探究《中國時報》、《聯合報》與《自由時報》在報導傳播「政策」新聞與評論時，若從政治、科技與兩岸關係三個面向進行分析，三報會有何相同或相異的表現，和有哪些內容是會被覆蓋不談或僅簡單帶過的。研究結果整理如下表十。

表十：三報報導與評論傳播「政策」(2016-2022)：特徵、消失的內容及其解釋

傳播「政策」	特徵	未談及的內容	解釋
文策院創設	三報大致正面呈現	經費問題（預算和基金）	1.以消息來源的意見為主 2.未考慮到更上層次的經費問題
政治面向 國際影音平台	《自由時報》呈現最少，對政府的批判與擔憂程度較弱	1.副業的預算超過公視本業 2.應修法擴大公視經費的額度 3.提出國家傳播媒體政策更重要 4.平台本身的細部規劃	1.《自由時報》在立場上較傾向支持政府推出的政策 2.沒有專線記者導致相關問題容易被政治鬥爭掩蓋
公視董事改選	《自由時報》報導最少，但較支持修法，《中國時報》、《聯合報》則批評多於支持	1.現行公視董監事選任制度是否合適 2.公視董事選任過程與公視政治獨立性的關聯 3.《公視法》條文的修	1.《自由時報》在立場上較傾向支持民進黨推出的政策 2.三報選擇的消息來源在不同黨派上比例不同

		正	3.記者可能對公視的運作不甚了解
科技面向	新聞議價法	<p>《自由時報》相對詳細的呈現</p> <ol style="list-style-type: none"> <li>1.澳洲報業高度壟斷，業者遊說力量大，台灣不同</li> <li>2.台灣即使比照澳洲議價模式，所獲金額可能不高，難以提振新聞業對民主的貢獻</li> <li>3.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建議向數位巨頭課徵廣告稅，雖有報導，但滄海一粟</li> <li>4.OECD 國家將對跨國企業就地課徵最低稅負機制，幾乎沒有輿論敦促政府參加</li> <li>5.鮮少討論業者取得的補償，要有多少比例拿來改善新聞從業人員的工作條件</li> <li>6.廣告的負面外部性</li> <li>7.他國以侵犯隱私與違反公平法罰款科技平台，輿論卻未能敦促政府將此收入拿來振興新聞業</li> </ol>	<ol style="list-style-type: none"> <li>1.產官學界有平台付費給新聞業的共識</li> <li>2.未考慮到經費多寡及使用的問題</li> <li>3.未有針對資本主義邏輯的質疑</li> <li>4.優先考量個別媒體的企業利益</li> </ol>
	數位中介服務法	<p>《自由時報》呈現最少且立場較正面</p> <p>網路世界仍須被管制</p>	<ol style="list-style-type: none"> <li>1.《自由時報》較傾向支持政府推出的政策</li> <li>2.三報呈現不同黨派政治人物的比例不同</li> <li>3.夠大的批評聲浪才足以阻擋草案的推行</li> </ol>
兩岸關係面向	OTT 納管	<p>《自由時報》呈現最少且相較之下批判力度最弱</p> <ol style="list-style-type: none"> <li>1.我國本身影視產業過度競爭、資源過度分散</li> <li>2.缺乏公共補貼政策</li> </ol>	<ol style="list-style-type: none"> <li>1.《中國時報》公器私用</li> <li>2.以消息來源的意見為主</li> </ol>
	不讓愛奇藝在台合法落地納管	<p>《中國時報》呈現最多且負面，惟《自由時報》較正面呈現</p> <ol style="list-style-type: none"> <li>1.愛奇藝依舊與我國影視產業持續互動</li> <li>2.不納管愛奇藝可能讓我國 ISP 業者付出極高的互連費用</li> <li>3.納管愛奇藝並讓其接受我方課徵特別捐可作為其他海外影音串流業者之示範</li> </ol>	<ol style="list-style-type: none"> <li>1.三報兩岸觀的差異決定了支持與否的走向</li> </ol>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

整理以政治意涵進行分析的幾個議題，可以發現主要的討論圍繞在政府的作為或是不作為上，三報報導的表現有差異乃是因為各報對於兩岸關係有不同的立場，以及對於政府是否會介入公廣的獨立性有不同預設為主。而「錢」是在這個面向下都忽略未被談起。

整理以科技意涵進行分析的議題，可以發現，近年我國若欲將管制之手伸進傳媒世界中的某個領域，都會先向西方國家取經，然而，未考慮到適法性常讓這些有些水土不服的法律看起來並不這麼適合我國，猝然推出而未營造討論的環境與空間，也常引起業界與民間的反彈，停滯改革的可能。在此其中，除了業者團結起來的力量不可忽視外，也可看到報社的政治立場會影響如何選擇實際呈現的消息來源，進而影響對於法案的態度。當今天面臨的狀況是為解決因科技進步帶來的問題而提出相關草案時，多數的討論與評析皆會聚焦在立法方向與條文本身，給出支持或反對的意見，而原先欲解決的問題、或現行機制本就存在的困境常是會被忽略的。

整理以兩岸關係意涵進行分析的兩個議題，可以很明顯的看出三報本身對於政治傾向與兩岸關係未來走向的看法會影響報導的論調，亦可從這兩個議題之間的比較看出，同樣都是要面對 OTT 業者，若與對岸有直接相關，則政府會更為精神抖擻地面對處理，甚至可能會忽略各界的批評聲浪，武斷推進其欲推行的某個政策。

綜合七個議題中未被談論到的內容，以經費相關議題和政府應該要提出健全傳播與文化領域的政策為主。大多數針對「錢」的討論，三報引述的意見來源，從產業界、學界到政府相關機關，多只停留在「理想要透過什麼方法實踐」的層次，而會忽略要面對「實際上要有多少錢」的問題。美國前參議員 Marcus Hanna 曾說，「政治上有兩件事很重要，第一是錢，我不記得第二件是什麼。」意即在實際執行上，需要有多少經費才夠，是很重要的。

再者，或許國家控制媒體的歷史依舊令人印象深刻且歷歷在目，政府在執政的過程中也幾度露出欲伸手管制媒體的慾望，導致許多人依舊不信任國家、懷疑國家介入的正當性，因此，在過往研究中發現的「媒體在報導傳播爭議事件時，會將政府管制連結戒嚴意識，而市場機制才是代表新聞自由(顧佳欣，2010)」現象依舊會出現。也就是說，台灣媒體市場失靈，形成過度競爭從而資源無法有效整合運用已經多年，(特別是 OTT 平台與電視新聞頻



道)，這些叢生的問題無法由業者自行矯正。即便如此，當政府提出相關措施與政策時，外界還是很快就會將這些政策與「箝制新聞與傳播自由」畫上等號。這並不代表我國提出的傳播政策都沒有要檢討或改進的地方；相反，這是承認政府法案是有比社會進步的時刻（如 NCC 在 2013 年曾經提出《廣播電視壟斷防治與多元維護法》草案，回應 2012 年入夏以來的「反媒體壟斷」運動。NCC 訂定的草案名稱，明白表示反壟斷是手段，多元維護才是目的，允稱清楚的釐清手段與目的<sup>1</sup>），但類似時刻較少，部分原因，也許是我們的輿論環境使得理性而有效率的討論很難進行，形同增加包含傳播政策在內的所有公共政策，較難得到持平的報導與評論，進而挫損主管有司盡忠研擬相關政策的空間與意志。試想，不同黨派相互對立，重取悅同溫層而輕提升支持者的內涵，透過貼標籤似的負面呈現，這些不合理的連結與謾罵不僅停滯政府面對問題時的被動處理，就連未雨綢繆提出先發制人的手段也蕩然無存，甚至，這些批評成為政府理所當然不作為的藉口。

Edward Herman 與 Noam Chomsky（1988／沈聿德譯，2021）於《製造共識》（*Manufacturing Consent: The Political Economy of the Mass Media*）一書中提出的「宣傳模式（propaganda model, PM）」指明，以廣告作為主要財源的大眾媒體，其社會功能是向大眾灌輸主導國家的特權團體在政治、經濟與社會領域的宣傳內容，並加以捍衛。藉由五層過濾器——大眾媒體的規模、所有權和利益導向；媒體主要營收來源的廣告廠商；政府官員、企業主等權力來源作為傳媒的消息來源；不同意媒體內容、或自認受其損害者，從其出資成立的智庫到直接對媒體發動砲轟（flak）等反制作為；以及，反共<sup>2</sup>作為統攝編採、調查與評述及呈現的言論檢查基準——的過濾，不僅何謂新聞會在此過程中被定義，也會決定新聞論述和解讀的方式。

宣傳模式預測、或至少分析了美國商業媒體何以會有特定報導內涵、評

---

<sup>1</sup> 詳見媒體改造學社、台灣媒體觀察教育基金會、傳播學生鬥陣（2013 年 5 月 19 日）。〈《廣播電視壟斷防治與多元維護法》草案：我們的共同分析與看法〉，取自 <https://reurl.cc/q0E2pN>

<sup>2</sup> 前引書出版於 1998 年，蘇聯於 1991 年解體，隨後大多數前共產國家也都消失，「反共」因此不再是言論檢查的基準，雖然時而還是產生作用。新的言論檢查基準，可能是「自由市場」意識形態等，即目前陷入混亂的新自由主義世界新秩序的基礎。宣傳模式廣為他人援用後，Herman 和 Chomsky 在訪問中指出，要隨時代注意第五個過濾器的變化（Mullen, 2009）。

論尺度乃至禁區。本文開頭即引用 Lazarsfeld 和 Merton 之言，說明一項事實，即傳媒未報導的內容，相較經常得到呈現的內容，可能更為重要，或更有深意。那麼，是否可以這樣形容，特別是第五個過濾器「反共」（及相關的）意識形態，與將近八十年前，兩位學者的讜論，有所輝映？

過去有研究者以宣傳模式試著解讀台灣紙本媒體的兩岸政治新聞報導，從其研究結果印證《自由時報》與《聯合報》最主要的消息來源是官方機構與執政高層，此外，由於兩報皆對於中國的政權與制度無好感，因此反共主義也會在報導中被呈現（錢震宇，2003）。

事實上，宣傳模式同樣適用於本研究的七個傳播「政策」案例，三報很少談及市場失靈，但四處顯示它們對政府失靈的防備，呈現出商業媒體並不質疑商業邏輯，或者，身受其害卻較少動能找尋可能的出路。不僅媒體站在自身利益的角度思考，就連可能成為消息來源的大型業者甚或是政府亦是服膺同一套商業考量，無形中也就壓縮了壯大公共媒體的想像與可能。

本文的發現是，最明顯的部分乃三報不管是沿襲自報老闆的理念，抑或是為了商業目的而選擇支持的政治傾向與兩岸關係立場，不僅會影響各報對於兩岸關係及美中台關係的解讀，這些立場與看法甚至會進一步貫穿各議題的討論，在關鍵時刻或爭議中發揮作用。也就是說，即便法案的推出會對於傳播媒體環境帶來正面改變，各報也可能因政治傾向而選擇放大反對派的聲音，極力批評，並透過社論的主張、記者的用字遣詞和選擇刊登的外稿評論來呈現對於各議題的立場。當然，並非是全有或全無的呈現，而是比例多寡的差異。

媒體的政治（含兩岸關係）立場對於各個議題的呈現，在大方向上都具有一定的影響力，然而，媒體的利益導向，也就是傳媒企業本身的利益，相較於其政治傾向關係立場，時而會更為重要，成為它們的第一考量順位，優先被放大凸顯呈現。以本研究的七個議題來說，最能凸顯這個事實的案例，就是三報對新聞議價法的呈現，不約而同，一致要求國家積極作為，以振興新聞業——雖可能因此議題是朝野立委皆有共識，認為新聞有價而後得出的結論，然或許也可以解讀成，當跨國平台挾強大網路科技能力成為廣告的主要獲利者時，受到最嚴重影響的是這些傳統的紙本媒體，它們因而選擇透過大力報導，呼籲政府主動採取有效的措施，以舒緩新聞業的財政壓力。

不過，即便三報的共識是為自己爭取合理利益，但如本研究的發現，三報在這個議題上似乎是自我設限，停留在能夠得到多少來自谷歌與臉書的「補償」，如此即心滿意足，而未正視即便能仿效全球首度與兩巨頭協議的澳洲，我國傳媒所得也非常有限，僅杯水車薪，完全不能恢復昔日的廣告收入水平，遑論振興傳媒服務民主所需要的財務健全體質。這裡，正如宣傳模式所說，不僅妨礙社會大眾所能取得之資訊質量，傳媒本身也受制於宣傳模式過濾器的限制，如同與擁有公權力的政府共謀，口說民主但口惠而實不至，以致民主難以提振而有向下沉淪的表現，這樣的評價也許不是不公正。

接著，在本研究分析的案例中，也可以看出，消息來源說了什麼在很大程度上會影響報導的論調與走向，更有甚者，當記者與消息來源們建立了信任關係，查證的工作在這個狀態下就變得不那麼重要了——媒體自然而然相信這些政府官員與專家學者所說，不太會去找第二消息來源做確認，好似只要冠上某個頭銜（不管這個頭銜與相關議題是否有關），此「權威」人士的談話內容就有一定的可信度，媒體不需要進一步去確認內容的真偽，跟隨這些主要消息來源的意志去做延伸的論述也開始成為常態。

當然，媒體作為紀錄的功能有其重要性，但記者也不能只是有聞必錄，否則會有淪為傳聲筒的危險。然若無法理性地針對事件本身進行討論，或是提出較為前瞻或領先的看法，相對就有限制事件發展的可能，又礙於我國新聞機構並沒有像海外常有的新聞傳媒路線（*media beat*）記者，如英國的《衛報》自1986年開辦「媒介周刊」、由英國業者創辦的《傳媒公報》（*Press Gazette*）和由美國哥倫比亞大學創辦的《哥倫比亞評論》（*Columbia Journalism Review*），甚至每況愈下，《新聞鏡》周刊（1988-2000）和《目擊者》雙月刊（1997-2009）等準新聞評論刊物也相繼停刊（馮建三，2016），因此，我國新聞媒體對於相關涉己事件，多是在有重大事件發生時，才会有相關報導出現，爭議事件過去後，問題到底有沒有解決、後續發展情況如何，並不太是記者會願意主動選擇跟進追蹤的議題，除非又有新事件爆發，才會被提起，與其他有專線記者的領域相比，報導的深度、廣度與專業程度，甚至是媒體的監督力量或許就沒那麼強。

綜合並整理上述的討論，可以發現宣傳模式之於台灣紙媒報導傳播「政策」而言，是有部分相符的特徵的，包括媒體的個別商業利益凌駕於一切，

商業媒體背後隱含的商業機制不容打破，與媒體十分仰賴政府官員、政黨人士與大型企業主作為主要消息來源。至於宣傳模式第四層之「不同意媒體內容的反制手段」在傳播「政策」這個議題上並未出現，而第五層的「反共意識」所扮演的過濾器角色，如前所述，已由「自由市場」等反對政府介入的意識予以取代。

## 參考書目

- 〈表演團體訴苦 馬：文化預算 4%〉(2008 年 2 月 23 日)。《人間福報》。取自 <https://www.merit-times.com/NewsPage.aspx?unid=75729>
- 丁奕 (2023 年 5 月 5 日)。〈「Taiwan in View」座談會 業界疾呼：台灣 OTT 小而散 需整合對抗跨國業者〉，《自由時報》，A6 版。
- 文化內容策進院 (2022 年 5 月)。《2021 年台灣文化內容消費趨勢調查報告》，取自 <https://reurl.cc/MRv1vp>
- 文化部 (2022 年 8 月 25 日)。〈文化部 112 年度預算 大幅成長 20% 創歷史新高〉，取自文化部官網 [https://www.moc.gov.tw/information\\_250\\_147618.html](https://www.moc.gov.tw/information_250_147618.html)
- 丘忠融 (2013 年 6 月 27 日)。〈從董事難產 看公視的政治問題〉，《人間福報》 取自。 <https://www.merit-times.com/NewsPage.aspx?unid=310635>
- 李瞻、祝基滢 (1986 年 8 月 30 日)。《我國未來傳播政策之研究》，行政院研究發展考核委員會專題研究報告。
- 沈聿德譯 (2021)。《製造共識：媒體政治經濟學》。新北：遠足。(原書 Herman, E. S. & Chomsky, N. (1988). *Manufacturing consent: The political economy of the mass media*. New York, NY: Palgrave Macmillan.)
- 林麗雲 (2011)。〈節制私人資本、護衛公共責任：南韓電視體制的演進〉，《新聞學研究》，107：1-45。
- 洪貞玲 (2020 年 9 月 1 日)。〈針對愛奇藝？NCC 前委員洪貞玲談「OTT 專法」到底管什麼〉，《娛樂重擊》，取自 <https://punchline.asia/archives/56451>
- 徐子苓 (2023 年 2 月 15 日)。〈新聞議價勞方首度發聲：第一線媒體工作者受傷慘重〉，《自由時報》。取自 <https://ec.ltn.com.tw/article/breakingnews/4212386>

- 馬瑞璿 (2022 年 8 月 19 日)。〈中介法若納管 PTT：等於命令關站 NCC 第三場說明會 平台業者質疑傷害言論自由〉，《聯合報》，A2 版。
- 張明貴譯 (2005)。《公共政策的制定—過程與原則》。台北：五南。(原書 Gerston, L. N. (2004). *Public Policy Making: Process and Principles*. Armonk, NY: M. E. Sharpe.)
- 張鷹 (2022 年 4 月 28 日)。〈政黨機關算盡 公廣如何改革〉，《聯合報》，A10 版。
- 郭秋雯 (2017)。〈韓國文化內容產業中介組織設置現況-以行政法人「韓國內容振興院(KOCCA)」為例〉，《文化越界》，2 (3)：49-71。
- 郭嫻容 (2019)。〈治理線上影音串流服務—以歐盟《視聽媒體服務指令》修法為例〉。台灣大學社會科學院新聞研究所碩士論文。
- 陳水扁總統競選指揮中心國家藍圖委員會 (2000)。《新世紀新出路：陳水扁國家藍圖 6：教育文化傳播》。台北市：陳水扁總統競選指揮中心。
- 陳宛茜 (2021 年 4 月 2 日)。〈《新聞分析》賭上烏紗帽 李永得向誰表態〉，《聯合報》，A3 版。
- 陳衍任 (2022 年 12 月 21 日)。〈新聞稿四：國內媒體公學會提立法課徵平台數位稅 學者：不符國際稅改趨勢〉，《新聞民主與平台議價論壇》。取自 <https://reurl.cc/n7oz8X>
- 陳國樑 (2021 年 11 月 26 日)。〈三環馬戲的全球稅改〉，《聯合報》，A8 版。
- 陳國樑 (2021 年 12 月 30 日)。〈全球稅改的兩支柱大戲〉，《聯合報》，A8 版。
- 陳國樑 (2022 年 7 月 19 日)。〈全球稅改的四個對策〉，《聯合報》，A7 版。
- 馮建三 (2007)。〈台灣傳媒及其政策變遷 20 年：以中國為背景與想像〉，《思想》，7：119-139。
- 馮建三 (2012 年 2 月 15 日)。〈師法南韓 公廣集團也能揮出強棒〉，《新新聞》，1302 期，頁 46-48。
- 馮建三 (2016)。《一種新聞史的書寫與建構：台灣報紙為主的涉己報導與評論，1954 至今》。(科技部計畫，MOST 105-2410-H-004-096 -)。臺北市：政治大學新聞系。
- 馮建三 (2020 年 6 月 29 日)。〈修正《公視法》五條文 文化部善哉善哉〉。取自媒體改造學社官網 <http://twmedia.org/archives/2651>
- 馮建三、翁秀琪、羅世宏、魏均、程宗明 (2008)。《97 年國家通訊傳播委員會委託研究報告：數位匯流後之傳播內容監理政策研析》。台北：財團法人台灣媒體觀察教育基金會。
- 馮建三譯 (2008)。《傳媒、市場與民主》。台北：巨流。(原書 Baker, C. E. (2002).

- Media, Markets, and Democracy. Cambridge, U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 劉定基 (2020),〈試評「網際網路視聽服務管理草案」〉, 彭芸 (主編),《「5G、OTT、匯流」論文集》, 頁 295-313。新北市: 風雲論壇。
- 錢震宇 (2003)。《檢視台灣報紙兩岸政治新聞的脈絡與演變—以李登輝執政時期為例》。淡江大學大眾傳播研究所碩士論文。
- 魏均、林麗雲 (2012)。〈三十年崎嶇路: 我國公視的演進、困境與前進〉, 媒改社、劉昌德編 (2012),《豐盛中的匱乏—傳播政策的反思與重建》, 頁 1-30。高雄市: 巨流。
- 顧佳欣 (2010)。《傳媒社會責任論之論述與想像》。政治大學新聞學系碩士學位論文。
- Herman, E. S. & Chomsky, N. (1988). *Manufacturing consent: The political economy of the mass media*. New York, NY: Palgrave Macmillan.
- Lazarsfeld, P. F. & Merton, R. K. (1948). Mass communication, popular taste and organized social action. In L. Bryson (Ed.), *Communication of ideas* (pp. 95-118). New York, NY: Harper and Row.
- Lazarsfeld, P. F. (1941). Remarks on administrative and critical communications research. *Philosophy and Social Science*, 9: 2-16.
- Maher, B. (2023, Januray 13). Why the US journalists' union is concerned about law forcing big tech to pay for news, And why the UK's National Union of Journalists has been more welcoming of the legislation. *Press Gazette*. Retrieved from <https://pressgazette.co.uk/platforms/nuj-newsguild-big-tech-news-payments-jcpa/>
- Mullen, A. (2009). The propaganda model after 20 Years: Interview with Edward S. Herman and Noam Chomsky. *Westminster Papers in Communication and Culture*, 6(2):12-22.
- Papathanassopoulos, S., & Negrine, R. (Ed). (2010). *Communications policy: Theories and issue*. New York, NY: Palgrave Macmillan.

**Politics, Technologies and Cross-Strait Relations:  
Reporting and Commenting on Communication ‘Policies’,  
2016-2022**

Tzu Yu Wu

**ABSTRACT**

Focusing on *the China Times*, *the United Daily News* and *the Liberty Times*, this thesis analyses their reports and commentaries on communication 'policies', discusses the 'policies' from politics, technology, and cross-strait relations aspect, between 2016 and 2022. Differences of their coverage are explored, reasons giving rise to their divergences are investigated, and significant policy issues not represented in the media are emphasised.

Seven 'policies' as presented in the media are carefully scrutinised. They are 'setting up Taiwan Creative Content Agency and TaiwanPlus', re-electing PTS's board of governors, (not) regulating OTT and iQiYi, enacting 'News Bargaining Act' and 'Digital Intermediary Service Act'. All three dailies endorse setting up 'Taiwan Creative Content Agency' and enacting 'News Bargaining Act'. For the other five 'policies', the media's perspectives on 'cross-strait relations' and correspondingly their political affiliations cast significant impacts upon how these policies were covered, though media's respective interest normally has its say in related representation.

It's further discovered that 'politics-oriented' items mostly touch upon what government has or has not done, 'technology-oriented' items are mainly on law-makers' ideas and legal texts proper, and 'cross-strait relations' items necessarily reflect the dailies' perspectives. What is missing in all three dailies are resources needed for fulfilling promises of policies concerned, and in the meantime, practical constraints the press and the audio-visual industry have been suffering is as well not attended.

**Keywords:** communication 'policies', cross-strait relations, propaganda model

---

\* Tzu Yu Wu, Master's graduate student, College of Communication, National Chengchi University, e-mail: 109464014@g.nccu.edu.tw

· 傳播 文化 與政治 · 第十八期  
2023 年 12 月



## 陳映真小說的左翼實踐和《人間》工作者的社會實踐

林淳華\*

### 本文引用格式

林淳華（2023）。〈陳映真小說的左翼實踐和《人間》工作者的社會實踐〉，《傳播、文化與政治》，18:33-56

---

投稿日期：2022 年 5 月 11 日；通過日期：2022 年 8 月 20 日。

\*林淳華為中央大學客家學院博士後研究員，e-mail: iris1221@ms43.hinet.net。

## 《摘要》

本文以陳映真的九篇小說主角左翼實踐，對照陳映真與四位《人間》工作者的社會實踐，研究結果發現，只有社運工作者才是同時出現在小說左翼實踐和《人間》人的工作中，而兩位《人間》人後來從事社區工作者，這種職業從來沒有出現在小說中的左翼實踐，但是在現有制度下，他們仍以社會改革之筆和左翼觀點來延續《人間》雜誌的社會實踐。

**關鍵詞：**人間雜誌、左翼實踐、社會實踐、陳映真

何謂「左翼實踐」？陳映真曾舉一個例子，有甲、乙兩個素質和訓練都一樣的知識份子，從小都很會唸書，甲生大學畢業之後，出國取得博士學歷，繼續留在美國的大公司的研發部門工作，順利娶妻、生子、住高級住宅、開兩部汽車，順利追求個人幸福。乙生在大學醫學系畢業之後，到台西鄉當鄉下醫師，其動機來自於他認為自己離開社會生產有一段時間，是無數他的同輩和許多人參與社會上各種生產讓他得以讀書，因此，在學成之後，就該到最需要他的地方行醫，他把所學到的知識的福祉和快樂貢獻於此，才得以滿足、快樂、自在（陳映真，1984）。

本文將乙生定義為左翼青年，從事左翼的社會實踐。左翼是源自於社會學家馬克思，而馬克思的左翼思想，反映在他對於社會的人道關懷。他貼近底層的勞工，訪問過紡織廠工人、地下水道工人，當時工廠工人一日工時多達 17 到 18 小時；工人工作環境差，擠在狹窄、有害健康的場所工作；且工人和危險機器在同一場所；另外，採礦過程危險，不採取任何防護措施，工人付出過時的勞動後，其代價是呼吸器官疾病大增，肺病死亡人數多（Marx, 1991）。

像馬克思這樣的左翼青年，原本有正常的大學教授之職業，足以安身立命，躺在安樂椅上寫論文、教學生，但是他卻選擇投入社會改革，他不停的逃亡，流離失所，和工人站在同一陣線，在《共產黨宣言》中，最後登高一呼：「全世界的普勞分子，聯合起來吧！」

馬克思生前最後一本著作——《資本論》第一卷英文的序言中，還針對《資本論》德文版出版之後的讀者之來函一一回覆，他非常重視所有讀者對他的批評。我們原本會以為，馬克思的桀傲不遜對於各方批評應該會不屑回應，沒想到他每封信都認真回覆（吳家駟譯，1990），足見馬克思急切想要宣揚革命的理念，希望以思想來影響讀者，讀者進而採取革命行動。

馬克思在《資本論》中，表現的左翼實踐是人道關懷和貼近大眾，而第三世界文學家和中國作家則以文學作品反映大眾心聲。第三世界的文學家依靠文學作品，引發大眾的共鳴，無數民眾圍繞著正在朗誦詩歌的詩人旁，大批群眾擠入鄉間戲院去看戲，中國作家在反省文革浩劫所帶來的創傷作品中，作家每周可以收到兩、三百封來自大陸各地的讀者來信，這是給作家最

好的回饋（陳映真 1984）。

而身為台灣左翼作家的陳映真，他的左翼實踐為何？本文透過陳映真小說文本以及針對《人間》雜誌工作者的深度訪談，企圖探討三個研究問題：

（一）陳映真小說中的左翼主角，是否像第一段中引述的乙生，是從事人道關懷、非計算性、不以市經濟利益為主的工作呢？

（二）陳映真小說主角畢竟是虛構人物，是沒有真實的社會實踐，但是陳映真本人社會實踐，就是在 1985-1989 年經營《人間》雜誌，這份雜誌經營和其他主流媒體經營有何差異？除了辦雜誌時，他又做到哪些左翼實踐呢？

（三）《人間》工作者後來從事的工作，是否與小說中的左翼實踐有關？

本文分兩部分，第一部分是研究者和人間工作者在閱讀陳映真的九篇小說之後，詮釋主角的左翼實踐。第二部分則是訪談四位曾經在《人間》雜誌工作者，分析以陳映真作為左翼的小說家，是如何以辦《人間》雜誌而做到社會實踐，而從《人間》雜誌走出來的老《人間》人，之後他們所從事的工作和左翼實踐的關聯性。

## 壹、陳映真小說中左翼實踐

陳映真小說主角帶有左翼實踐者，包括〈麵攤〉、〈故鄉〉、〈賀大哥〉、〈夜行貨車〉、〈雲〉、〈鈴鐺花〉、〈山路〉、〈趙南棟〉、〈夜霧〉等九篇，以下則進入小說脈絡中，分析小說中虛構人物的左翼實踐。

### 一、〈麵攤〉

陳映真第一篇小說是〈麵攤〉，其中大眼睛的警察，讓人印象深刻。他是瘦削的年輕人，有男人少有的大大的眼睛，充滿困倦、熱情，甚至那銅

色的嘴唇都含著說不出的溫柔，連他凝視母子時，嘴唇也彎成倦怠的微笑，和他對比的是另一位肥胖而粗暴的警察。

〈麵攤〉表現台北城是充滿慾望的城市，在後街經營麵攤一家人打從苗栗而來，苗栗縣三灣鄉大河底當年遭遇清鄉的肅清，村內男子無一倖免，不是流亡山區，就是被問訊，成為傳奇又悲劇的「紅色客家庄」（藍博洲，2004）這家麵攤不賣麵，卻賣圓麵餅和牛肉湯，開市第一天，就被警察抓去派出所問筆錄，在白色恐怖下長大的苗栗一家人，原本以為面對國家威權的執法機構，肯定會被抓入監，但是大眼睛警察只做了筆錄、要求繳罰款六十元，就放人了，「這個警察，不抓人呢。」（陳映真，2001a，頁7）後來，警察還到麵攤上，點了麵餅和肉湯，放了十元，就不拿找回的五元了，等於同情後街麵攤的一家人，光顧後街麵攤的同時，也捐出五元給金蓮一家人。

警察和攤販原本是對立的，但是後街仍有大眼睛的警察，本著社會良心，不亂抓人，當然還有警察和金蓮之間，無法言喻的愛戀情慾關係。這樣的警察如同陳映真的年輕時期，擁有左翼的思想，想要幫助麵攤這樣一群的底層的人民，但是卻不知道如何靠近，完全使不上力氣，他只能匆匆丟錢離去，做完筆錄放人，發揮基本的社會公義，連對於金蓮的愛戀，也只能選擇離開，對於罹患肺結核猛咳血的小孩也幫不上忙，只能寄望夢裡橙紅、橙紅的早星—社會主義的來臨。

## 二、〈故鄉〉

〈故鄉〉的哥哥從日本學醫，返回台灣之後，成為基督教信徒，帶領全家人受洗，哥哥不久便在焦炭廠做著保健醫師，象徵傳遞社會主義和基督教思想，全鎮的人都不理解哥哥的想法。哥哥白天在焦炭廠當醫師，卻因為工作環境惡劣，像個滿黑污黑的煉焦工人，象徵和煤炭工人在一起，關懷他們的健康，而晚上則洗刷煤煙之後，又在教堂裡做事當志工。（陳映真，2001b）

哥哥回來當保健醫師的時代背景，約莫白色恐怖前夕，他的祈禱詞如同暴風雨前的寧靜，如果沒有之後的家變、白色恐怖，會讓人覺得哥哥的保健

醫師是非常棒的工作，雖然是非主流的工作，不像開業醫師和大醫院醫師般的生活優越、社會地位高，但是他的所學和理想可以並行，哥哥也能引導信徒、病人，如同祈禱詞中的進入桃花源之社會中。

保健醫師和教堂傳教志工，則會聯想到梵谷年輕時也當過礦區的傳教員。在 1878 年，梵谷到比利時礦區 Nuenen 當傳道員。當時礦區人民生活的困苦，礦區的小孩八歲就要到礦洞幫忙搬運，十三歲就得挖掘煤礦，三十歲左右就會患上肺病，一般活不過四十歲，即使他們辛勞了一生，也不能換取溫飽。梵谷為了和礦工打成一片，用煤炭塗黑自己的臉頰，在煤渣堆中撿拾煤屑，送給區內的老弱，又把自己所有的金錢、食物、衣服分派清光，仍無法幫助眾多的貧民，最後他改善礦區人民的生活，親自到煤礦公司，為工人爭取合理的工資及較安全的工作環境，但是徒勞無功，且引起教會的不滿。該年冬天，礦洞坍塌，死傷慘重，梵谷對宗教開始失望，1879 年，教會也撤除了梵谷的傳道員職務。

這段梵谷的工作經驗，竟然和哥哥從日本學成歸國的選擇的工作非常神似，由於陳映真曾經和吳耀忠在 1958 年一起考上師大美術系專修班（陳映真，1984，頁 334），因此，陳映真除了對於繪畫有天份之外，對於西方畫家生平應該有所接觸，不然也會受到高中同學吳耀忠的影響，對於梵谷短暫生命的起伏應該非常熟悉，而且研究者懷疑，在 1960 年，真的有台灣傳教士、醫師願意進入礦區服務嗎？這應該是虛構的，這段虛構的社會實踐，是參照梵谷年輕的工作經歷所寫成的，創作這篇小說時，陳映真還是淡江文理學院的大學生。

### 三、〈賀大哥〉

小曹初識的賀大哥是美善的形象，賀大哥在經歷越戰、精神崩潰之後，轉到第三世界的台灣療傷，做社會服務工作。小曹第一次看到賀大哥在船上，賀大哥將袋子從右肩換到左肩（陳映真，2001c，頁 87），象徵身上的包袱從右傾，轉為左傾，代表意識型態轉換成為左翼份子，接下來就是外國

青年的賀大哥表明是無神論者，他不是傳教士，他在聖心小兒麻痺復健所的美工室，教導病童鋸木頭、刻木頭，讓病童解放身體的殘障，憑著想像和一雙巧手，仍能雕刻出各種各樣的動物、車輛、人像等，在肢架室輔導病童使用義肢站起來，不再趴在地上爬行。他服務別人的心境是「幫助這些小孩，其實也幫助了我自己」、「從他的爬行的境地裡站立起來的努力中，認識到人的尊嚴…」(陳映真，2001c，頁 93-94)。儘管他遭逢越戰的殘忍、精神科的治療，但是賀大哥仍堅持要實踐愛的哲學，而且是不圖回報的，從一個人的生命內層去愛人、信賴別人，那美麗的新世界就伸手可及了。

賀大哥是陳映真入獄之後，重返社會之後第一部小說，曾在人間出版社工作的 F 先生指出，賀大哥是他最喜歡的男主角，他看到賀大哥對人的付出，是無神論者，有陳映真的身影，那樣的階級出身，卻是正義之士、社會受害者(F 先生訪談紀錄，2010 年 1 月 11 日)。

研究者認為，陳映真在入獄時，應該看到比他更悲慘的事情，他雖然想要寫出來，但是受限於 1978 仍在戒嚴期間，他仍不能透露更多，否則又必須入獄，賀大哥這樣角色的社會實踐，在於「愛」人類的實踐，只有愛才能不分彼此，就不會有二二八事變、白色恐怖；只有愛才能不分種族，就不會有越戰事件；只有愛才能打破種族藩籬、帝國主義和第三世界的藩籬、正常人和身心障礙者的藩籬，讓賀大哥從美國飛到第三世界的台灣，服務身心障礙的病童。

小曹出身良好世家，祖父是律師，曾為思想犯辯護，後來和現實妥協了，成為銀行股東，堅持兒子不能攻讀文史，小曹父親學化工，後來擁有紡織廠、餐飲、建築等跨界事業，成為高雄地區的世家。小曹是外文系的女大學生，暑假參加學校慈惠社服務，到聖心小兒麻痺復健所當義務復健員。她對這種服務的工作，其實表現有點異化，格格不入，但是陳映真對於大學生參加這種服務工作，基本上是持肯定的態度。

在 1970 年保釣運動之後，台灣大學生出現省思。陳映真指出，年輕的一代喊出一個口號：「要擁抱這個社會，要愛這個社會」。於是，有了社會調查的運動，到山地、漁村、礦區等調查當地生活情形，開始展開服務工作，青年人帶著一顆赤誠的心，到孤兒院、老人院去慰問，他們開始關心校園以

外的事務，關心實際的社會生活，他認為，這些關心當然不夠深入，但從發展的過程說，這是卅年來，第一次在台灣的青年字典有了一個新的詞彙—「社會意識」、「社會良心」、「社會關心」（陳映真，1984，頁 12）。

報導人 F 很喜歡這篇小說，他認為賀大哥姓很有特色，原本姓 Chalk 是粉筆，是可以塗掉的污點，後來叫 Hopper，從名字就可以看到陳映真根本不會原諒從越戰歸來、沾滿血腥的賀大哥。但是陳映真對於賀大哥描寫，幾乎是完美的人格，他來第三世界做義肢給肢體殘障者，只求贖罪（F 先生訪談記錄，2010 年 1 月 11 日）。

#### 四、〈夜行貨車〉

研究者在大二（1987 年）第一次讀到這篇小說，對於小說結尾印象深刻。詹奕宏不願再面對外商公司老闆的羞辱，憤而離開外商公司，為劉小玲套上景泰藍戒指，兩人一起回鄉下，最後如同電影的結尾，一列長長的貨車，駛向詹奕宏的故鄉。當時研究者還住在鐵路宿舍，每晚從四樓往鐵軌眺望，看到長長亮亮的火車經過時，都會想起這篇小說的結尾。而研究者的父母親就是離開故鄉北上工作，研究者小學的暑假長住在彰化田尾外公、外婆家，鄉下對研究者是度假玩耍的地方，這樣一列返回外公、外婆家的火車，對研究者非常有吸引力。

廿三年後，研究者重新閱讀這篇小說，自己也如同劉小玲般，從北部地區嫁到台中，研究者對於那列火車仍刻骨銘心。但是研究者想要知道的是，為何小說描述的是一列如同載運煤炭的貨車，而不是載客的光華號客車？詹奕宏選擇離開主流的外商公司返鄉結婚，這是他反社會期待的社會實踐，也是對於資本主義的反擊，勇氣十足，但是理性不足，因為返鄉後的生活該如何繼續？他和劉小玲在鄉下要如何找工作，以劉小玲的背景和身世，她願意當農婦嗎？詹奕宏會農事嗎？他和劉小玲在台北時，常常拳打腳踢，不斷出現家暴，返鄉之後，家暴會停止嗎？

詹奕宏的左翼實踐是離開台北公司，離開資本主義的社會，一個人返回



中南部。詹宏志提到，資本主義可能隨著夜行貨車進入中南部，終至吞沒一切，個人絕對沒有能力和資本主義對抗，詹奕宏可以一人回家，但是問題沒有解決，不可能因為離開台北，解決了所有問題，這是過於樂觀的結論。（詹宏志，1987）

左翼實踐造成的日常生活衝突的一面，才是最為棘手的，但是小說中沒有交代，研究者好奇：以陳映真的心胸、人生的高度會如何處理這些現實社會的問題？因為陳映真寫的是社會寫實小說，理應在小說中回答這些問題的。（趙剛，2011）

## 五、〈雲〉

小說中男主角張維傑是具有左翼實踐的青年，他還沒有上師大前，在台東縣大武鄉小學接下放牛班導師工作，曾經幫弱勢的排灣族的原住民小學生墊錢買珠算練習本。他對小學生喊話，老師是關心他們的，要好好學習，多一份保護自己的力量，自己講完，就淚流滿面，連小學生也紅了眼眶。當時張維傑若要從台北坐車到這個小學，從北迴鐵路繞東部幹線轉南橫公路，一趟要七、八小時，幾乎一整天的通車時間，確實是非常另類的老師。

師大畢業之後，他到礦區教國中，發現啞巴女學生，他親自帶著啞巴學生到台北上盲啞學校，張維傑關心身心障礙的學生，在當初升學主義掛帥的年代，願意這樣為盲啞學生付出的老師也不多。他將生活視為為了別人的苦樂和輕重而生活，也就是說，生活的目的在於關懷別人。

他在外商公司和自組的貿易公司期間，讓張維傑忘記曾經有過的左翼實踐，他讀小文的稿子，雖然很感動想要寫信給她，但是終究是「忘了」，不像在礦區國中時，會親自帶領啞巴學生接受特殊教育，後來他忙於為生活掙錢，生活中充滿無日無夜的奔波焦慮；淡忘了小文寄來的日記，淡忘了曾經和他並肩作戰的朋友和理想（陳映真，2001d）。

最後張維傑反省之後，指責日本公司屢次不守口頭協定，以強勢的公司，壓低台灣代理人的利益、定位，最後他轉而以關懷的口氣寫信給他的秘

書 Lily「倘若妳今晚有空...」，邀請單親媽媽朱麗娟一起帶著女兒到台北吃飯。

這是在他面對留在故鄉教書、跨國企業、工會組織、資本主義的巨大挑戰節節敗退之後，他選擇關心自己身邊的人做起，當作左翼的實踐和社會關懷，因為當初麥迪遜台灣公司在中壢廠成立工會，最初的目的就是要關心工人，而他自組的公司只有一名員工，他不關心朱麗娟，要關心誰？這樣的企業才走得下去。而他離開跨國公司，就是不滿意跨國公司的操弄，如今可以獨當一面，對於跨國貿易的不合理，在能力範圍，當然必須予以反擊，表現自己立場和堅持，也當作是左翼的反思和實踐。

〈雲〉的男主角張維傑即使淪為小資本家，但是仍保留愛人的心，也是因為女性的情愛，這是人類愛他人最基礎、本能之處，讓張維傑生活出現生機（詹宏志，1987）。這時的左翼實踐是「重新肯定現實生活中的一些小小但尊嚴的決定、一些對他人的小小的但由衷的關懷」，這些小小的日常生活改變也是左翼實踐。（趙剛，2011，頁 121）

## 六、〈鈴鐺花〉

國小「看牛仔班」導師高東茂，他的左翼實踐在於說服小學生阿順的家長，讓阿順繼續讀書，教過共產黨歌曲、幫貧窮學生的農家種地、整頓社區公共衛生、帶學生到田間務農，還讓弱勢學生阿順當班長。他極力反對分班制度，有意無意的打耳光在右翼家庭長大的阿助臉上，原本是要罵醫師小孩，卻罵到阿助「還沒有到社會上去，就學會欺負窮人麼？」（陳映真，2001e，頁 18）

但是也很少有老師願意向學生認錯，左翼青年高東茂向學生阿助認錯，他說：「莊源助，老師對不起你。」、「分班是…大人的壞事」、「老師的錯，在於用一個壞事來反對另一個壞事。」、「我們都不要讓別人教你們從小就彼此分別，彼此仇恨」、「啊，彼此...」。 （陳映真，2001e，頁 19）

趙剛（2009）詮釋，阿順是左翼的小孩，阿助的右翼小孩，作者透過

左翼、右翼小孩之眼，來看待當時的社會情況，那高東茂以上那些話則別有用意。高東茂用這樣的打耳光的事件，講出台灣政府在處理白色恐怖事件，不該分外省人、本省人，不該分左派、右派，不該用一個壞事反對另一個壞事。

報導人 F 先生曾經當過高中老師，當他閱讀〈鈴噹花〉時，高東茂還向學生懺悔：「老師，對不起你」，這在他當過老師的經驗，小說中老師向學生道歉的場景是非常驚訝，「我覺得對高東茂景仰又感動。」（F 先生訪談記錄，2010 年 1 月 11 日）

## 七、〈山路〉

整篇小說就是蔡千惠年輕到老年的左翼實踐，她雖然沒有像李國坤、黃貞柏嚮往中國，從事社會改革行動，但是因為她二哥漢廷透露國坤、貞柏行蹤，以出賣朋友來交換自己的自由，蔡千惠以贖罪的心情，加上對於國坤的愛慕，在沒有婚約下、沒有肉體的親近，竟然以國坤妻子的身分，進入貧窮的李家，服侍李家兩老，扶養小叔李國木長大。

她的左翼實踐除了幫助白色恐怖受害者家屬處理善後，李國坤的母親悲傷過度，咳血、悲傷致死，李國坤的父親李乞食則礦區失業，到台北當建築零工養家活口，沒想到從鷹架上摔死，蔡千惠還因要讓小叔國木念書，她也進入礦區工作，進入馬克思資本論第三卷中描述的礦區作業區中，女工、童工汗流浹背的搬運煤礦和推台車（陳映真，2001e，頁 79-80）。雖然從李國木的描述中，似乎是好玩的工作，但是礦區暗無天日，其實是最低賤、環境最差的工區，在那個年代，煤礦礦區的意外時有所聞。

蔡千惠在煤礦工作之餘，仍會幫助弱勢的家庭，她刻意將煤渣往外播，讓窮孩子們掃回去燒火，她教國木，窮苦人家，就要互相幫助，甚至唱誦李國坤生前寫的三字集，這是用來教育工人和農人。

蔡千惠一生的左翼實踐，走了那麼長崎嶇的山路後，就是栽培李國木長大，除了讓國木念書沒有經濟壓力外，還驅使他迴避政治、努力上進，最後

取得會計師資格，在她責任終了，加上晚年自己生活沉溺於資本主義商品化的社會、中國革命的墮落，在黃貞柏出獄後，召喚她年輕時左翼實踐的夢想，有些實現了，有些沉淪了，最後她選擇終了生命。

F 先生認為這篇反映小說主角是有理想，蔡千惠為了扶養白色恐怖的家屬，她獨自扶養國木長大成人，且取得會計師執照，這是因為她想要補償受難者家屬，支撐她到晚年（F 先生訪談記錄，2010 年 1 月 11 日）。

## 八、〈趙南棟〉

女主角葉春美，因鹿窟事件，從十九歲被保密局帶走之後，入獄廿五年，返回石碇老家時，已經是四十四歲的中年婦女，她又花了十年找趙南棟，終於在趙慶雲過世那天，找到了趙南棟。

鹿窟事件是 1950 年代白色恐怖時期政治事件中，涉案人數最多的政治事件，在 1952 到 1953 之間，共抓走 183 人，確定判刑者 165 人，槍決 36 人，感訓、自首無罪和不起訴者 32 人，其餘 97 人總共被關了 871 年。當時石碇鄉鹿窟村被認定為共產黨的武裝基地，有一說法是武器進駐的基地，但是後來只查獲長短槍八支，另一說法則是參加二二八事變者，後來逃往鹿窟，發展組織建立基地，吸納共產黨員（張炎憲、高淑媛，1998）。

小護士葉春美因認識八堵林內科診所的養子林慎哲，慎哲開啟了她知識和語文的知識，兩人分開之後仍通信，她將慎哲送的《辯證唯物論之哲學》放在石碇老家，沒想到鹿窟事件後，她從基隆、八堵、石碇一路回家，就無辜入獄了。

葉春美入獄之後，幫助槍決的宋大姊，照顧趙南棟，這件事成為葉春美活下去的動力，她在獄中，想知道趙南棟過得好不好，她出獄之後，一心念著趙南棟，但是因為知道趙慶雲出獄後，應該有能力繼續照顧兩兒子趙爾平、趙南棟，並未介入扶養趙南棟，後來因趙慶雲身體狀況變差，小說進展的六天之內，葉春美終於找到她心中掛念卅五年的趙南棟。

葉春美在獄中，以自己當護士擁有的醫藥常識，幫助宋大姊減輕受刑的

痛楚，不致於流產，保住趙南棟，這是她的左翼實踐。她再見到趙南棟已經是高挺、頹廢的年輕人，正在吸食強力膠，手臂上都是菸頭燙觸的傷口，研究者認為，以葉春美的年紀和知識，應該一看就知道趙南棟在吸毒，但是她仍發揮母性的包容他，她扶著汗臭、神智不清的趙南棟，回到石碇老家，那是紅色基地，共產黨的老家，繼續照顧宋大姊的第二代，在她五十多歲的中年歲月之後，培植和照顧趙南棟是她的左翼實踐。

報導人 F 歸納陳映真的小說總是帶有希望的，像宋大姊雖然在牢裡生產和被毆，但是她仍舊生出了趙南棟，葉春美將趙南棟帶回石碇仔撫養，石碇仔是紅色基地，為革命留下種子，並非絕望的（F 先生訪談記錄，2010 年 1 月 11 日）。

報導人 L 認為，陳映真在卅年前就預言社會結構問題，金融風暴、跨國企業、資本主義的惡質會造成如此的必然，〈趙南棟〉這篇則感覺時代氛圍的轉換，他認為：「還好，有這些作品，對時代有點醒作用。」（L 先生訪談記錄，2010 年 1 月 14 日）

## 九、〈夜霧〉

張清皓以反省寫日記方式，當作左翼的實踐，希望有一天，隨著日記曝光，國安資料密案解密之後，能還給這些受害者清白的交代和歷史的評價。儘管他是國家機器的執行者—調查局員工，但是他每處理一案，就深刻反省，諸如 1979 年的高雄美麗島事件，在校園佈線調查時，逮捕「親匪言論」的昆明籍貫的阮老師，之後張清皓一直以夢到幫阮老師的岳母搬書搬到腰痠背痛，當作對於阮老師的贖罪。

接下來，政黨輪替，白色恐怖受害者陸續出獄，張清皓完全接受福建南靖師範案子的張明的在百貨公司的所有指控，儘管在商品社會中，百貨公司內充滿消費人口，人聲喧嘩氛圍中，但是張清皓對於張明的指控，一字一句都聽得到，最後他反省，黨政合體的調查局人員宛如夜霧，在夜晚濃得化不開，希望黎明的出現，讓這群夜霧消逝（陳映真，2001f，頁 119）。

## 十、小結

在陳映真小說中主角中，這些左翼的實踐有〈麵攤〉中不抓人的警察；〈故鄉〉中哥哥在焦炭廠裡做著保健醫師；〈賀大哥〉中的賀大哥跑到第三世界國家復健中心為病童服務，小曹參加大學慈惠社，從事社會服務工作；〈夜行貨車〉的詹奕宏憤而離開跨國公司、〈雲〉小文加入工會，張維傑當過放牛班的導師，最後轉而關心身旁的 Lily。〈鈴鐺花〉高東茂老師希望學生不要分班，不要分彼此；〈山路〉的蔡千惠一生奉獻給李家，〈趙南棟〉葉春美一心想要照顧趙南棟；〈夜霧〉的李清皓寫下日記來反省調查員工作。

陳映真小說中主角多半是出身高社經家庭，選擇的職業也符合主流社會期待，但是其工作內容往往和一般人對此職業的高收入、良好的工作環境想像有所距離。即使是女性的角色，也非傳統的賢妻良母形象，而是想要照顧白色恐怖受害家屬的蔡千惠和葉春美，還有組織工會的小文，這是陳映真小說中主角的左翼實踐。另外，左翼實踐也不見得是崇高理想主義的實踐，或許只是改變自己、關心他人的小小舉動，例如張維傑關心單親媽媽 Lily。

## 貳、陳映真和《人間》工作者的社會實踐

報導人 F 認為陳映真小說主角的實踐都是不成功的，就是因為不成功，才要給讀者在生活中實踐，陳映真也不會滿足小說寫得多好，這些都是虛幻的，重要是要讀者在社會中實踐，讀過小說之後，像大資本家不會苛刻對待員工，企業管理者如張維傑善待員工（F 先生訪談紀錄，2022 年 8 月 2 日）。

那陳映真本人和《人間》工作者又是如何做到社會實踐呢？本文第二部分回答本文所提出的第二個、第三個研究問題，也就是陳映真在經營《人間》時，是如何做到左翼實踐呢？他和主流媒體經營者的差異在哪裡呢？而《人間》工作者在離開雜誌工作之後，個人是如何追尋左翼實踐呢？

本研究訪談《人間》工作者離職後的四位工作者，選擇這四位工作者是因為他們離開《人間》後的工作，分別為從事出版業、報社攝影記者、社區

工作者、社運工作者等，四人各自代表不同的職業，具有代表性。

儘管《人間》工作者不只這四人，本研究考慮到受訪對象可以提供充分的資料，足以回答本研究問題。除了取得資訊可達到飽和之外，也評估研究者時間、財力等現實因素下所能找到的報導人（吳嘉苓，2015），訪問他們對於陳映真小說主角左翼實踐的理解，同時請四人回憶《人間》雜誌工作情形，挑出陳映真辦雜誌和一般主流媒體工作情況的差異處。

而由於《人間》雜誌只有營運四年，這些人間工作者離開人間之後，還從事哪些工作？是否受到陳映真小說主角左翼實踐之影響呢？因為這群《人間》人，已經是六十到七十歲的年紀，陸續從職場退休，社會實踐告一段落，在此之際，由他們回顧來時路，也還記憶猶新（表一）。

表一：深度訪談對象

報導人	《人間》 職稱	社會實踐	訪談時間	訪談方式
F 先生	文字編輯	主編	2010/1/11	親身訪談
			2022/8/2	親身訪談
S 先生	攝影記者	攝影記者	2009/12/18	電話訪問
			2010/1/11	親身訪談
			2022/7/21	親身訪談
L 先生	文字記者	社區工作者	2010/1/14	親身訪談
			2022/8/8	電話訪談
Y 先生	特約記者	社運工作者	2022/8/3	親身訪談

## 一、陳映真辦《人間》雜誌

陳映真在 1985 年創辦《人間》雜誌，歷經四年之後，在 1989 年停刊。雖然是短短四年，但是從《人間》從業人員背景、新聞室社會控制、新聞價值，則和主流媒體迥異。

在過去主流媒體的從業人員研究中，主要包括三類人，第一是專業背景出身，像電影製作人來自於大學電影科系畢業，其次是作家型，例如大學英文和新聞科系從事電影製作人工作，第三是基層出身者，不見得是大學畢業生，但是經驗豐富（Cantor, 1971；引自翁秀琪，1992）。

而陳映真聘用的《人間》工作者除了新聞科系和非新聞科系背景出身之外，還有跟他一樣曾經遠行入獄者，還有曾經因為組織工運者，被警方毆打、判刑者，也有熱愛森林的素人，他雖然只有高中畢業，但憑藉對於森林熱愛，揭露山老鼠和政府破壞山林情形，同時影響森林政策。

在新聞室社會控制方面，通常新聞價值是以報老闆好惡來決定。《人間》則重視記者想法、意識形態，讓每一個記者發揮觀察，會在採訪後的討論會議中討論，陳映真採取「口袋孵蛋」，大題目則共同討論，這一季題目也拿出來討論，會議自由發展，陳映真不會主導方向，從報導人本身的發展性來討論，偶而會放入即時新聞，如湯英伸事件（L 先生訪談紀錄，2010 年 1 月 14 日）。

被陳映真都會很認真幫忙記者改稿，同時要求記者仔細看看他改的部分，與他同輩的文壇人士，都認為陳映真花太多時間在改《人間》記者的稿件，而耽誤了他自己的小說創作時間，但是陳映真仍不以為意，繼續改稿。（F 先生訪談紀錄，2022 年 8 月 2 日）

曾經被他改稿改得密密麻麻紅字的 L 先生，他在 1986 年 10 月到 1989 年之間在《人間》雜誌服務，他每次都很高興被陳映真改稿。在修改過程中，他看到小說家的高度和視野，每次拿到修改稿，他都很興奮，經過陳映真改稿之後，出奇地好，而且不會扭曲原意，且仍保留記者的想法（L 先生訪談紀錄，2022 年 8 月 8 日）。

在雜誌發稿管理上，《人間》記者可能出差外地採訪一個專題，一去就是十天，十天之後回到台北，休息一下，再把片子整理出來。但是，陳映真對於農民、工人、學生運動都要求文字記者和攝影記者要在現場守候，全程記錄，當林義雄祖孫命案出殯日，他也打電話要人在花蓮的攝影記者立即到宜蘭拍照紀錄，陳映真會告訴 S 先生：「先記錄再說」。（S 先生訪談紀錄，2009 年 12 月 18 日、2022 年 7 月 21 日）



在如此的人性化管理之下，《人間》記者從來不會在背後罵陳映真，他們還擔心雜誌的財務問題，都主動幫陳映真省出差費用，甚至到了後來雜誌社虧損嚴重，他們還願意減薪、當無給職志工繼續在《人間》繼續工作。（S先生訪談記錄，2022年7月21日、F先生訪談紀錄2022年8月2日）

最後，新聞價值通常是媒體運作和報老闆來決定的，翁秀琪（1992）歸納過去文獻，所謂的「新聞價值」是新聞易得性和低成本、符合新聞從業人員的新聞價值認定、愈接近高層的消息來源是愈有新聞價值。但是人間報導的消息來源，都是底層、弱勢的人，除了報導之外，陳映真還親身關心曾經報導過的外省老兵，一般主流媒體主管很少能做到的。

當時有一位安徽外省老兵在兩岸緊張時，被抓來台灣，他大字不識一個，《人間》也曾報導過他，後來他在輔大附近開麵店，常常罵蔣匪，陳映真請他來雜誌社做打雜工作，後來他又到宜蘭開麵店，也常常罵政府，黃春明的朋友聽到了，要黃春明轉告陳映真，他遲早會出事，陳映真和S先生搭國光號車子到宜蘭，專程關懷這位來自安徽的外省老兵（S先生訪談記錄2009年12月18日、2010年1月11日）。

陳映真在經營《人間》雜誌時，他聘請的記者背景非常多元，包括新聞科班出身、曾經入獄者、工運組織者、熱愛山林的素人等。在新聞室社會控制方面，他不會主導專題的方向，而是交給記者來討論，這是由下而上的決策。在消息來源取捨方面，他和一般主流媒體選擇差異相當大，他選擇娼妓、老兵、罕見疾病病患、客家人、原住民來報導，且在報導完，還繼續關心這些弱勢者。

## 二、陳映真與社會運動

除了辦雜誌之外，陳映真也經常參加社會運動，這是外界比較不熟悉的一面，但是藉由「綠色小組社會運動紀錄片網站」，發現陳映真會去參加社會運動，有時候發表演說，有時候則只有跟著抗議隊伍而行，不發一語。

在1987到1990年之間，陳映真參加八場的社會運動，這些社會運動的

議題也很多元，包括人權、環保、原住民、老兵、學運等議題，足見陳映真一方面辦雜誌，另一方面也投入多項的社會運動，以活動倡議者作為社會實踐（表二）。

表二：陳映真參與的社會運動

社會運動事件	日期	地點
人權運動	1987/1/25	二二八紀念公園
鹿港反杜邦	1987/2/9	台大校友會館
反核	1987/4/27	台北耕莘文教院
湯英伸事件	1987/5/15	台北殯儀館
揭穿吳鳳神話	1987/9/19	台北耕莘文教院
老兵返鄉運動	1987/9/20	台北金華國中
保護森林	1988/3/26	台北耕莘文教院
五月反郝學運	1990/5/5	中正紀念堂廣場

資料來源：范綱增編（2020）

### 三、《人間》人的社會實踐

F 先生原本在鹿港推動反杜邦運動，當時《人間》即將發行，陳映真到中部推廣雜誌時，認識了 F 先生，於是邀請 F 先生到《人間》擔任執行編輯的工作，1987 年，F 先生在《人間》雜誌工作一年之後，遂投入工黨建黨和農民運動，2005 年陳映真要去大陸之前，知道 F 先生暫時無工作，於是力邀他回到人間出版社擔任常務編輯，陳映真除了惜才之外，也是給予他薪資津貼。

F 先生在擔任《人間》雜誌執行編輯期間，陳映真教他改寫、修正、潤飾、分段、下標題，經過這樣的訓練，F 先生自認為編輯和寫稿都能駕輕就熟，同時也以此來訓練兒子從事寫作。當他重新返回人間出版社印製一系列

的《人間思想與創作叢刊》，是延續陳映真的思想，編輯社會改革書籍就是 F 先生認為的社會實踐。

帶領環保運動是 F 先生的左翼實踐，除了在當地向人民群眾做些組織、宣傳反杜邦之必要的工作之外，也做一些打雜、清理座談演講現場、幫忙掛宣傳標語、布條等很實務的工作。F 先生印象最深刻的是在 1987 年時，當時用歌聲聲援新竹水源裡居民圍堵李長榮化工廠污染事件，當時由歌手邱晨創作一首「水源里之歌」，報導人 F 先生、Y 先生和綠色小組王發行人一起為主唱的邱晨合音，號稱是「原野三匹狼」，呈現搞環保運動多采多姿的一面，他們是用歌聲來連結群眾。

圖一：內湖垃圾山



圖二：救援雛妓社會運動



資料來源：圖片由 S 先生提供，2022 年 7 月 21 日授權使用。

以上兩張照片是 S 先生擔任《人間》雜誌攝影記者時所拍攝，左邊是內

湖垃圾山，右邊是救援雛妓的照片。在拍垃圾山時，他跟著撿拾垃圾者同進同出，長期蹲點，才取得拾荒者的信任，得以拍照。救援雛妓的照片則是反映 S 跟在陳映真身旁工作的六年中，台灣族群運動、人權運動、環保運動、學生運動風起雲湧，S 幾乎每場親臨現場拍照，為 1980 年代台灣的社會運動留下完整的紀錄，成為他的社會實踐。

S 先生離開《人間》後，進入主流報社擔任地方中心攝影記者，之後，又進入某周刊擔任編輯部主管後退休，即使在主流媒體中，他仍有左翼的觀點來達到他的社會實踐。他從《人間》中學習到的左翼觀點，就是長時間蹲點和整體的關注。

雖然報社要的不多，要的照片一張、兩張，可是我把它累積下來，就是台中 pub 的一個紀錄，像我退休之後，就把它整理出來，就是 90 年代台中 pub 的現象，我會用這樣態度去把它記錄下來（S 先生訪談紀錄，2022 年 7 月 21 日，）。

以 1999 年的九二一地震為例，當其他攝影記者都在拍攝明星災區時，S 先生騎乘摩托車在當時的中部偏遠災區拍攝，長達一個月時間用相機來記錄，他拍攝到了一面都是罹難者遺像的牆面，爸爸在撿兒子的教科書，一位媽媽抱著遺像在說話，廿三年過去了，他永遠忘不了這些刻骨銘心的畫面，這幾年，S 先生退休之後，才慢慢將這些有故事的照片整理出來，這是他的社會實踐。

Y 先生因為在大學時代參加詩社，曾經聽過陳映真演講之後，就和詩社同學一起打電話到陳映真住家，當時力邀陳映真來演講，可是他忘記陳映真才剛出獄，電話仍被監聽中，他的邀約只得到陳映真禮貌性的回應而已，並未來大學詩社演講。大學畢業後，Y 先生擔任教職，後來又辭去教職，擔任專職社運工作者，但是掛在《人間》雜誌社投保（圖三），陳映真也給他一張《人間》雜誌社特約記者的名片，主要不是採訪、寫稿的需要，而是方便他組織民眾，或是給名片給要接觸的人和單位，他後來組織工黨、勞動黨，

也都是受到陳映真影響，和民眾站在一起，即使受到警方毆打、判刑等，過的是有一餐沒一餐的生活，都是左翼的理念來支撐他繼續走下去。

後來他有了女兒之後，突然意識到搞社會動，這樣的收入是無法養活一家人，於是轉向社區工作。一樣是以社區工作作為社會實踐的L先生認為，左翼的核心價值影響他後來從事社區工作，因為社區蹲點，就會重新定義社區價值。農村在現代化發展過程中，是被擠壓的、犧牲的，農村人口外移到都市，爭取農村的公平正義，其實就是在對抗都市化、工業發展。

圖三：Y先生保留當年在《人間》的投保資料

保險證號碼	投保單位名稱	投保薪資	生效日期	退保日期
商010124	龍日行股份有限公司	08400	730705	730724
家002223	人間雜誌	06900	760918	
		08400	770801	
		09000	780801	780929
自011441	勞動風	08820	781020	

備註欄 請參閱背面注意事項 總頁次: 0103317 頁次: 00013 78.10×1500×4200種120P 藥射用紙

資料來源：研究者攝於 2022 年 8 月 3 日

經過社區營造之後，L先生發現這個社區在生態環境、經濟、社會網絡都有所改變，透過生態旅遊發展，農村經濟收入提高，原本是貧窮的社區，地震後的重建社區中，該社區成為收入所得第一名。其次，農村原本都是宮廟、鄰里長的社會組織，但是投入生態村的經營之後，要學習解說、導覽、農產品相關課程等，新的社群網絡打破原有的舊的社會關係，有了新的社會

網絡發展和動員，比較有資源的人，比較有影響力的人，就連結新的社會網絡。

這種社區運動被歸屬於間隙式的轉型，這是在資本主義基礎下，建立起不會威脅支配階級和菁英的新的社會培力形式，且深植於公民社會中，看起來似乎沒有什麼影響力，且這種轉型常常被資本主義批評，同時也被馬克思主義者所輕視，但是社區運動長久累積之下，確實是可以改變人們生活（黃克先譯，2015）。

## 參、結論

透過研究者和人間工作者讀陳映真小說中，主角的左翼實踐，其理念有馬克思主義、無政府主義、中國社會主義革命傳統、基督教信念。小說中主角的左翼實踐，是不抓人的警察、健保醫師、社會服務、組織工會、照顧 228 受害者家屬等。

而現實社會中，陳映真的社會實踐有經營《人間》雜誌和參加社會運動，其中經營雜誌是小說主角左翼實踐所未曾出現的職業。陳映真挑選的記者，其背景是多元的，在新聞室社會控制則有別於主流媒體，當主流媒體的消息來源多為企業家、高官、社會賢達人士之下，《人間》的消息來源則是弱勢和底層生活者，即使在報導結束之後，陳映真和消息來源也還維持長期互動。

《人間》人的社會實踐，是書籍出版商、媒體工作者、投入社會運動和社區工作者，只有社會運動者則和小說中的左翼實踐吻合，其他職業都不曾出現在小說中。《人間》人即使從事出版和主流媒體的工作，可是仍可在其中有左翼的想法，例如，他們仍用改革社會之筆出版書籍，以長期蹲點和整體關照的左翼之眼來從事新聞攝影工作。

尤其是 Y 先生和 L 先生從事的社區工作，是九二一地震前後才開始投入的社會實踐，雖然是立基於現有的制度之下，但是仍會為間隙式的轉變，這種在見縫插針的方式，有一天也會滴水穿石，也讓社會改革成為可能，在 L 先生的社區工作中，就看到在生態環境、經濟發展的前提下，在傳統宮廟、

派系關係中，重新找到新的社會關係，人與人連結在一起而形成社群團體。

## 參考書目

- 吳家駟譯（1990）。《資本論（第一卷）》。台北：時報。（原書 Marx, K.[1894], *Das Kapital I*. Hamburg: Verlag von Otto Meissner）
- 吳嘉苓（2015）。〈第 2 章 訪談法〉，瞿海源、畢恆達、劉長萱、楊國樞編《社會及行為科學研究法：質性研究法》。頁 33-62。台北：東華。
- 范綱堉編（2020）。《變革者陳映真：社會實踐講演集》。未出版。
- 翁秀琪（1992）。《大眾傳播理論與實證》。台北：三民。
- 張炎憲、高淑媛（1998）。《鹿窟事件研究調查》。台北：北縣文化。
- 陳映真（1984）。《孤兒的歷史·歷史的孤兒》。台北：遠景。
- 陳映真（2001a）。《陳映真小說集 1 我的弟弟康雄》。台北：洪範。
- 陳映真（2001b）。《陳映真小說集 2 唐倩的喜劇》。台北：洪範。
- 陳映真（2001c）。《陳映真小說集 3 上班族的一日》。台北：洪範。
- 陳映真（2001d）。《陳映真小說集 4 萬商帝君》。台北：洪範。
- 陳映真（2001e）。《陳映真小說集 5 鈴鐺花》。台北：洪範。
- 陳映真（2001f）。《陳映真小說集 6 忠孝公園》。台北：洪範。
- 黃克先譯（2015）。《真實烏托邦》。新北市：群學。（原書 Wright, E. O.[2010]. *Envisioning real utopias*. N. Y.: Verso.）
- 詹宏志（1987）。〈尊嚴與資本機器抗爭〉，康來新、彭海瑩（編）《扭曲的鏡子－關於台灣基督教會的若干隨想》，頁 57-69。台北：雅歌。
- 趙剛（2009）。東海大學社會學九十八年第一學期「陳映真的文學與社會」課堂筆記。未出版。
- 趙剛（2011）。〈從仰望聖城到復歸民眾：陳映真小說〈雲〉裡的知識份子學習之路〉。《台灣社會研究季刊》，84: 59-135。
- 藍博洲（2004）。《紅色客家庄：大河底的政治風暴》。台北：印刻。
- Marx, K. (1991). *Capital: A critical economy volume III*. London, UK: Penguin Books.
- Cantor, M. G. (1971). *The Hollywood Television Producer*. N.Y.: Basic Books.

## Leftist Practices of Chen Ying-chen's Novels & Social Practices of Workers of Magazine Ren Jian

Chun-Hua Lin\*

### ABSTRACT

The articles is devoted to 9 novels of Chen Ying-chen about the leftist practices of narrators. It also discuss the social practices of workers of magazine Ren Jian. As the result, the same of the two is social activist. The two workers of magazine Ren Jian became the community worker, but that profession didn't show in the novels.

Even their occupations didn't become the leftist practices of narrators, they use the leftist's pen and leftist's eyes in the institution to continue the social practice of magazine Ren Jian.

**Keywords:** Chen Ying-chen, leftist practice, Ren Jian, social practice

---

\* Chun-Hua Lin, Postdoctoral researcher, Dept. of Hakka Language and Social Sciences, National Central University, e-mail: iris1221@ms43.hinet.net



# 「真實」的傳遞或複製： 臺灣媒體在俄烏衝突的角色扮演

趙怡雯\*

## 本文引用格式

趙怡雯（2023）。〈「真實」的傳遞或複製：臺灣媒體在俄烏衝突的角色扮演〉，《傳播、文化與政治》，18:57-87

---

投稿日期：2023 年 9 月 25 日；通過日期：2023 年 11 月 25 日。

\* 趙怡雯為政治大學傳播學院碩士在職專班學生，110941013@g.nccu.edu.tw

## 《摘要》

2022 年 2 月俄烏戰爭爆發，臺灣對於這場戰爭的報導數量明顯高於其他戰爭，若追溯俄烏衝突，自 2014 年起的克里米亞公投，便被西方媒體視為俄羅斯吞併烏克蘭領土的關鍵指標，並連帶影響烏東地區紛紛而起的自決訴求，而 2022 年 9 月的北溪天然氣管爆炸案當下，則被美國及烏克蘭指認為俄羅斯所為，儘管俄羅斯官方及部分媒體有不同聲音，但仍不被西方主流媒體所採納。本研究以克里米亞公投及北溪天然氣管爆炸案此二事件為研究案例，透過不同媒體的論述報導，尤其關切臺灣的消息來源與訊息採納，發現無論是質報、電視新聞或是網路原生媒體，對於上述訊息的揭露幾乎無條件地採納英、美等主流媒體觀點，如遇不同觀點之報導則以選擇或迴避的方式來呈現。研究認為儘管在國際新聞流通的機制下，臺灣媒體無可避免地採用較容易取得的西方觀點，但亦透過報導分析發現，我們在有其他的訊息來源時仍傾向選擇英美等主流媒體，從 2014 年到 2023 年，我們在俄烏衝突時的重要事件更像是英美的仿聲鳥而非是新聞報導者，然若能從單一觀點的複製到多元角度的併現，或許仍有機會吟唱出不同曲調。

**關鍵詞：**主流媒體、北溪、克里米亞、俄烏衝突、媒體再現、戰爭新聞

## 壹、研究背景與動機

俄烏戰爭自 2022 年 2 月 24 日爆發以來，便影響了全球而成為重大議題，過去研究發現，臺灣媒體在報導戰爭新聞時多採用國際通信社及美國、歐洲的新聞報導（方鵬程，2006；賴映潔、陳慧蓉、莊錦農，2017），而在這次爆發的俄烏戰爭中，可以看到西方——尤其是美國——主流媒體（mainstream media, MSM）的觀點充斥於我們眼前，採用單一觀點，尤其是代表「自由、和平、正義」的新聞，有些人認為或許沒有不好，多項研究或論述均提出「有心人士製造虛假消息、俄羅斯運用網路戰」（Noemí, Pablo & Juan-Pablo, 2022；黃郁文，2022），但如果這些單面向的訊息只會增加仇恨及對立感，而我們又是有別於過往地關心這場遠在 8,000 公里外的俄烏戰爭，那麼我們就該知道自己被「餵食」了什麼。

本研究以「克里米亞公投」以及「北溪天然氣管道被炸」進行媒體報導分析，位於黑海北岸的克里米亞（Crimea）在 2014 年舉行公投，西方媒體稱俄羅斯「吞併」克里米亞，亦有人認為這場公投激發了烏克蘭境內頓巴斯地區的自決意識<sup>1</sup>，並進而向基輔政府訴求自主地位以及俄語作為烏克蘭官方語言之一等權利（包亞克、馮建三註譯，2022）；2022 年由俄羅斯向德國輸送能源的天然氣管道「北溪一號」（Nord Stream 1）、「北溪二號」（Nord Stream 2）位於波羅的海的海底管道，於同一日發生氣體外洩，丹麥、瑞典

---

<sup>1</sup> 瑞士參謀本部退役上包亞克（馮建三譯註，2022）於北約時，密切注意烏克蘭 2014 年後的變化，並指出當時烏東的頓內次克及盧甘斯克並沒有試圖要從烏克蘭分離，普丁反對前述兩個地區的人公投，但公投仍然進行，且第一次及第二次明斯克協議均未說到上述二個共和政權要獨立，而是在烏克蘭的架構內給予自治，故倘用「自決」或「自主」公投，應更能傳達本意；另政治大學民族系教授趙竹成（2017，頁 115）寫到烏東二地的公投題目為「您是否支持頓內次克人民共和國／盧甘斯克人民共和國獨立法」，後經研究者向其請教，趙竹成（電子郵件，2023 年 11 月 17 日、2023 年 11 月 18 日）表示 2014 年前述二地區的選票上只有一個選項：是否支持「государственная самостоятельность」，以俄文及烏克蘭文說明，翻譯成英文是 state independence，被認為這是指要從烏克蘭「獨立」出去。研究者受限於語言及烏克蘭歷史背景，故於正文中採用較為寬鬆之「自決」文字，盼日後能進一步查詢到更明確之資料。

及德國等調查報告顯示此為蓄意的爆炸行為，美國及俄羅斯互相指責對方需為這場爆炸負責。

「今日烏克蘭，明日臺灣」，國內媒體於俄烏戰爭的第 2 日開始，便將俄烏戰爭和臺灣處境展開探討（羅印沖，2022 年 2 月 25 日；社論，2022 年 2 月 25 日；莊榮宏，2022 年 2 月 25 日），而俄烏戰爭對臺灣帶來的啟示亦引起不同學者的觀點對話（瑞迪，2022 年 3 月 16 日）。追本須溯源，俄烏戰爭的發生並非在 2022 年那天拔地而起，本研究試圖剖析普遍被視為「俄羅斯入侵烏克蘭領土」的 2014 年克里米亞公投，以及影響歐洲能源與經濟甚鉅的 2022 年北溪天然氣管爆炸案的媒體再現與爭論，此兩事件在西方主流媒體及俄羅斯之間，一直持有截然不同的看法，且克里米亞公投為烏國東部俄語居民城市帶來了骨牌效應、紛紛要求自治權（簡嘉宏，2014 年 3 月 28 日），故本研究將透過上述案例藉以探討臺灣媒體在俄烏衝突過程所傳遞的訊息，以及是否有值得我們省思之處。

## 貳、研究範圍與資料蒐集

本研究針對臺灣三報（聯合報、中國時報、自由時報）、網路原生媒體（風傳媒、報導者）、電視新聞臺（TVBS、三立、中天）<sup>2</sup>作為分析對象，因主要報導均集中於事發後的一個月內，故將以 30 日為新聞蒐集期間，盼能瞭解臺灣媒體如何描述這些爭議事件；三報的紙版樣本蒐集工具採用輿情蒐集系統《潤利艾克曼》，其為臺灣第一家媒體信息廣告監測資料庫公司，擁有豐富資料庫並專責各類信息監測<sup>3</sup>，網路及電視新聞則是分別至媒體官網與官方 YouTube 頻道蒐集，蒐集方法為在研究區間內以「烏克蘭」、「克里米亞」、「北溪」、「天然氣」等關鍵字，逐一搜尋及檢視新聞，與本研究目的有關則納入研究樣本，以下為樣本數量：

---

<sup>2</sup> 《中天新聞臺》自 2020 年 12 月 12 日已不能在有線電視播出，本研究概括與 TVBS 及三立等均歸為電視新聞，以其播放內容為研究樣本。

<sup>3</sup> 參考自《潤利艾克曼》官方網站 <https://www.xkm.com.tw/>

表一：克里米亞公投及北溪天然氣管爆炸之臺灣媒體報導數量統計

項目	克里米亞公投	北溪天然氣管被炸毀	合計
樣本蒐集區間 <sup>4</sup>	2014年3月14日 至2014年4月13日	2022年9月26日 至2022年10月25日	-
中國時報	10	9	19
聯合報	27	10	37
自由時報	28	7	35
風傳媒	39	8	47
報導者	還未成立	0	0
TVBS	2	10	12
三立	4	5	9
中天	0	9	9
合計	110	58	168

## 參、從 2014 年「黑海」到 2022 年「波羅的海」

### 一、不被承認的公投：克里米亞訴求與爭議點

2014年3月16日，位在烏克蘭南部的克里米亞半島舉行公投，內容為二選一：「您支持克里米亞以俄羅斯聯邦主體的身分重歸俄羅斯？」、「您支持回復1992年克里米亞共和國憲法效力及克里米亞作為烏克蘭一部分的地位？」(趙竹成, 2017)，在公投開始的前二日，烏克蘭法院裁定這場公投違反烏克蘭憲法(РБК-Україна, 2014, March 14)，但仍有將近84%的克里米亞

<sup>4</sup> 克里米亞公投發生於2014年3月16日，因公投前已有媒體開始報導，故新聞蒐集期間自公投前二日開始彙整；北溪天然氣管於2022年9月26日被發現氣體外洩，在此之前並無太多報導，故以事件發生日起開始蒐集新聞。

選民參加了公投，其中 93% 的人投票支持克里米亞主權（Petro, 2022, November 25），以一個主權獨立國家身分「重歸」成為俄羅斯聯邦一部分（趙竹成，2017，頁 121）；聯合國組織、中國大陸、大部分的西方國家和烏克蘭政府拒絕承認這次公投結果，在中文的維基百科上，分別以「吞併」、「併吞」及「兼併」來形容俄羅斯<sup>5</sup>。

在 15 至 18 世紀時，克里米亞是鄂圖曼帝國的一個附屬汗國，18 世紀末時，由俄羅斯占領該區域並將整個克里米亞半島納入版圖，成為俄羅斯帝國的一部分，在沙皇被列寧等人的紅軍推翻後，克里米亞自然地成為蘇維埃共和國的領土，直至 1954 年 2 月 19 日，在當時的蘇聯第一書記赫魯雪夫（Nikita Khrushchev）主導下，為紀念烏克蘭和俄羅斯簽訂《佩列亞斯拉夫爾條約》統一 300 週年，將克里米亞劃入烏克蘭蘇維埃社會主義共和國管轄（Korolkov, 2014, March 19）；因此，在克里米亞境內，分別有著原來鄂圖曼帝國的韃靼人、同屬斯拉夫民族但語言不同的俄羅斯族裔與烏克蘭族裔，依據 2001 年官方普查結果，其人口比例分布依序約為俄羅斯裔佔 58.5%，烏克蘭裔佔 24.4%，克里米亞韃靼人佔 12.1%（National composition of population, n.d.）<sup>6</sup>。

在克里米亞作為「禮物」送給烏克蘭的 60 年後，由克里米亞自治共和國最高拉達（克里米亞地方議會）發起公投，要求回到 1992 年的憲法以擁有更多主權，傳聞是俄羅斯非正式武裝部隊的「小綠人」以保護當地居民為名進駐（Shevchenko, 2014, March 11），哈佛大學烏克蘭研究中心，Serhii Plokyh 教授在其著作《烏克蘭：從帝國邊疆到獨立民族，追尋自我的荊棘之路》形容這次公投過程是「一群身著無標識軍裝的人奪取了克里米亞議會的控制權……克里米亞公民被要求前往投票所決定是否與俄羅斯重新統一……這場由莫斯科支持的公投結果讓人想起柏列日涅夫時代的投票……投票率高達百分之九十九」（Plokyh, 2021／曾毅、蔡耀緯譯，2022 年，頁 450）。而臺

---

<sup>5</sup> 有關 2014 年的克里米亞公投，中文維基百科共有二條，主題分別為「2014 年克里米亞歸屬公投」（<https://zh.wikipedia.org/wiki/2014年克里米亞歸屬公投>）及「俄羅斯聯邦併吞克里米亞」（<https://zh.wikipedia.org/wiki/俄羅斯聯邦併吞克里米亞>）；其中「吞併」共出現 19 次、「併吞」共出現 7 次、「兼併」共出現 5 次、「重歸」共出現 1 次（上網時間：2023 年 11 月 16 日）。

<sup>6</sup> 透過網路公開資料及書籍查詢，克里米亞的人口結構最新資料均採用 2001 年烏克蘭人口普查結果。

灣，亦有電視媒體到克里米亞的公投現場，拍攝到小綠人駐守的畫面（段士元、倪嘉徽，2014年3月16日）。

本研究透過輿情蒐集平臺《潤利艾克曼》、媒體官網及 YouTube 搜尋統計，自克里米亞公投的前二日起之一個月內，國內三報分別報導則數為《中國時報》報導 10 則、《聯合報》報導 27 則、《自由時報》報導 28 則，網路原生媒體《風傳媒》報導 39 則，無線電視新聞頻道《TVBS 新聞臺》報導 2 則、《三立新聞臺》報導 4 則、《中天新聞臺》報導 0 則；從報導數量來看，《中國時報》的報導則數明顯低於其他二報，與《中國時報》同屬於「旺中媒體集團」的《中天新聞臺》則無任何報導。

初步以新聞標題分析，《聯合報》初期傾向將克里米亞公投事件放在前四版（A1 至 A4）當作要聞處理，但《聯合報》亦是將「西方／美國」置入最多次的平面報紙（佔 37%），例如「公投前夕出兵 俄軍入侵烏本土 美歐將制裁」（任中原編譯，2014年3月17日）、「疏遠又敵對 美俄新冷戰」（張佑生編譯，2014年3月20日）、「俄占克島 普亭保密一流 美情搜鬧笑話」（任中原編譯，2014年3月25日），三報在報導方向多以俄羅斯吞克、俄國經濟受影響、美歐制裁俄等軍事、政治及經濟面向為論述內容，對於克里米亞則是以為較為悲情且「前途茫茫」的單一形象論述。

甫於 2014 年初成立的《風傳媒》，則積極且較為立體地報導克里米亞公投，是本次蒐集的報導樣本唯一有將「韃靼族」放置於新聞標題的媒體，例如「克里米亞公投在即，韃靼人捍衛家園」，內文提到「一支在歷史上飽受俄國欺壓的民族克里米亞韃靼人（Crimean Tatars）已正式聲明……誓死守護得來不易的家園」（傅莞淇，2014年3月14日），而《風傳媒》亦有 11 篇文章以「克島公投」作為標題開場，以彰顯此為系列報導。相較於紙媒在標題上以「俄主播嗆聲」（管淑平編譯，2014年3月18日）、「以牙還牙」（賴昭穎、蕭白雪，2014年3月21日）、「普亭狼爪」（社論，2014年3月24日）、「遭踢出 G8」（江靜玲，2014年3月26日）、「俄羅斯責難德國部長的希特勒之喻」（魏國金，2014年4月9日）等帶有情緒性的文字，《風傳媒》的新聞標題則偏向以敘述性的文字來說明公投及國際情況，例如「普京十年磨劍新干涉主義成形」（張凱耀，2014年3月17日）、「《海牙宣言》定調 俄羅斯 G8 停權」（簡嘉宏，2014年3月25日）。

克里米亞會舉辦公投，與同年 2 月的基輔廣場事件發生時間相當接近。當時被國會解職並棄職出境的烏克蘭前總統亞努科維奇（Viktor Yanukovich），便於 2 月底針對克里米亞的局勢表示「是對基輔那幫暴徒的自然反應」（簡嘉宏，2014 年 2 月 28 日），而部分的媒體報導或讀者投書則強調「給了俄國導演克里米亞危機的藉口，這是國家內部分裂造成外國強權介入」（張安平，2014 年 3 月 23 日）、「俄方認為推翻亞努科維奇是不折不扣的違憲政變，基輔臨時政府也無憲法正當性，況且克里米亞人有權決定自己的未來」（楊芬瑩，2014 年 3 月 14 日）。不過整體而言，媒體僅就廣場事件對克里米亞的影響略略揣測，並未特別強調俄羅斯如何詮釋基輔廣場事件與克里米亞的關聯，反倒是直接使用「兼併」、「併吞」、「入侵」等詞彙來強調俄羅斯的野心。

在電視的報導標題，《三立新聞臺》及《TVBS 新聞臺》呈現的均是俄、烏之間在克里米亞的緊張關係，例如《TVBS 新聞臺》「克里米亞今公投 親俄民兵嚴格盤查」（段士元、倪嘉徽，2014 年 3 月 16 日）、《三立新聞臺》「克里米亞公投在即 俄羅斯、烏克蘭大舉軍演」（查修傑，2014 年 3 月 15 日）、《三立新聞臺》「反對克島入俄 俄主播：我們能將美國化為核灰燼」（陳品好，2014 年 3 月 17 日）；《TVBS 新聞臺》是派遣記者及攝影師至克里米亞採訪公投情況，《三立新聞臺》則是由實習編輯進行外電整理；值得注意的是，無論是派經驗豐富的國際記者到現場採訪或是由實習生整理外電內容，二家媒體不約而同地以「怎麼投都一樣」，來強調這次公投其實是沒有選擇權、被逼迫的行為（段士元、倪嘉徽，2014 年 3 月 17 日；范庭瑄整理，2014 年 3 月 17 日），佔樣本數 50%。

這是一場沒有選擇權的公投嗎？這場公投的最大爭議就在於沒有「維持現狀」的選項（施正鋒，2015，頁 37），就公投訴求來說，第二條公投內容為「是否支持回復 1992 年克里米亞共和國憲法」，而這部憲法早於 1995 年被烏克蘭國會廢止（同上引）；政治大學民族學系、通曉俄羅斯語的趙竹成教授表示 1992 年的烏克蘭憲法，保障了克里米亞在文化語言權等相關的共和國權益，而近年來烏克蘭政府逐漸地去除俄羅斯語言及文字，忽略原本以俄羅斯語為母語的居民權益（訪談趙竹成，2023 年 1 月 3 日），趙竹成強調該公投項目第二條，僅訴求恢復本來就有的克里米亞自治憲法權益，而非脫



離烏克蘭<sup>7</sup>，至於媒體拍攝到的「透明投票箱」，在蘇聯、烏克蘭、中亞地區都是使用透明的票廂<sup>8</sup>，目的是不讓任何人預先放置選票，卻被媒體影射為因這次公投而特別設計的制度。

國內媒體的引用或消息來源，並不意外地以美國通信社及主流媒體為主，包含 CNN 及《美聯社》(AP)，亦有部份媒體引用《法新社》及 BBC，但令人感到無法理解的是完全未引述中東地區的《半島電視臺》或是日本 NHK，這二家機構都是國內會購買或翻攝的外媒之一；而我國媒體會點綴似地採用俄羅斯的媒體，例如《自由時報》引述俄羅斯國營電視臺《俄羅斯一臺》(Russia-1)的內容<sup>9</sup>，該主播基謝約夫(Dmitry Kiselyov)於節目上表示俄國有能力將美國化為灰燼，並於新聞最後一段加註基謝約夫為反美國、反同性戀(管淑平，2014年3月18日)等與克里米亞公投無關之個人標籤。

歷史上，這不是克里米亞第一次就主權問題舉辦公投，1991年1月隨著蘇聯解體，克里米亞地區政府決定就恢復克里米亞自治而舉行全民公投，93%的人投票支持擁有自己的主權，在多方協調下，直至1992年克里米亞議會始撤銷了其獨立宣言，但交換的是克里米亞為烏克蘭境內的共和國，擁有軍事與外交權，包含了能與其他國家談判和簽署條約(周建宏，2016，頁35)，以及成立區域武裝部隊的權力(Sasse, 2007, pp. 145; Baudier, 2009, pp. 22; 轉引自施正鋒，2015，頁35)。

2014年的這場公投，反映的亦是克里米亞長久以來渴望自治、並要求烏克蘭應該遵守承諾的民意；2017年總部位於德國的《東歐和國際研究中心》(Centre for East European and International Studies, ZOiS)在克里米亞當地進

---

<sup>7</sup> 2014年克里米亞公投是二個題目在同一張選票上，二選一；第一題為「您支持克里米亞以俄羅斯聯邦主體的身分重歸俄羅斯？」是指加入俄羅斯，第二題為「您支持回復1992年克里米亞共和國憲法效力及克里米亞作為烏克蘭一部分的地位？」是指保持原來屬於烏克蘭的自治共和國狀態；各用俄文、烏克蘭文、克里米亞韃靼文說明(趙竹成，2017；趙竹成，電子郵件，2023年11月17日)。

<sup>8</sup> 例如2023年烏克蘭11個地區地方選舉、2022年哈薩克各級議會選舉、2023年俄羅斯地方選舉均採透明票廂，分別依序見 <https://uatv.ua/v-yanvare-sostoitsya-povtorno-golosovanie-na-vyborah-v-18-otg-tsik/> ; <https://ru.sputnik.kz/20230319/vybory-v-kazahstane--eto-shag-k-demokratii-nablyudatel-za-vyborami-ot-sng-33061818.html> ; <https://elista.bezformata.com/listnews/izbiratelnie-uchastki-v-eliste-rabotayut/121223726/>

<sup>9</sup> 雖說是採用《俄羅斯一臺》的內容，但因新聞前方註明為「綜合報導」，故無法確認是直接引述或是透過其他的國際通信社報導再轉引述至該則新聞。

行研究調查發現，如果再一次投票，有 79% 的人表示他們會是與當初一樣的選擇，而《外交事務》(Foreign Affairs) 在 2020 年的一份「加入俄羅斯聯邦會使他們過得更好」的研究報告發現，克里米亞韃靼人已從 2014 年的 50% 上升到 2019 年的 81% 對此表達肯定 (Petro, 2022, November 25)，克里米亞的居民若是被逼迫而投下贊成票，那麼 2017 年的這項調查只能說是「再次被迫」？但沒有任何資料顯示這項研究有俄羅斯軍方或小綠人的介入。

克里米亞 2014 年公投的爭議點，主要在於是否該定義為俄羅斯的惡意兼併或是克里米亞當地的民主自覺，臺灣媒體多引用美國方面的論述並強化俄羅斯或疑似俄羅斯軍方的兵力強大，當時臺灣正發生著太陽花學運，因此亦有部份報導以「烏克蘭領土被俄侵占」與臺灣和中國大陸關係相提並論，在媒體的論述中，臺灣等同於是烏克蘭，而非渴望擁有主權的克里米亞。

## 二、Mad Man? 被炸毀的北溪天然氣管

2022 年 9 月 26 日，丹麥的海事交通當局通報在波羅的海「北溪二號」(Nord Stream 2) 天然氣管路附近發現危險性天然氣外洩，接著同一日在波荷木島 (Bornholm) 東北方的「北溪一號」(Nord Stream 1) 管線亦被發現有兩處位置漏氣；歐盟執委會主席范德賴恩 (Ursula Von der Leyen) 表示這是人為蓄意破壞，美國國務卿布林肯 (Antony Blinken) 也表達相同看法，儘管沒有明確的證據支持，但歐洲、美國政要及若干專家皆表示輸氣管被炸乃俄國所為 (李晉緯譯，2022 年 9 月 27 日；張佑之譯，2022 年 9 月 29 日)。

依據英國廣播協會 BBC 針對北溪管線及烏克蘭危機影響性的整理報導得知，北溪二號管線甫於 2021 年竣工，全長 1,200 公里，是一條由俄羅斯聖彼得堡 (St Petersburg) 經波羅的海海底通往德國盧布明市 (Lubmin) 的天然氣管道，與北溪一號相加，每年可向歐洲運送 1,100 億立方公尺的天然氣，供應歐盟國家 25% 以上的能源需求；美國、英國、波蘭和烏克蘭都曾反對修建北溪二號，擔憂管線啟用後，歐洲天然氣的供給將會更依賴俄羅斯 (張曉雯譯，2022 年 2 月 23 日)。然而有關「俄羅斯的能源要脅」，似乎都是從美國或其他國家傳出，例如澤倫斯基便曾說過「天然氣管線是危險地緣政治武

器」(陳怡君譯, 2021年8月23日), 布林肯亦在北溪爆炸後稱道「一勞永逸地消除對俄羅斯能源依賴的巨大機會」(Greene, 2022, October 7); 但他們沒有講出口的是, 倘若天然氣透過原先的「陸路」輸往歐洲, 不但捨近求遠且還會被沿途國家——包含烏克蘭——收取高達數十億到幾百億美元的過路費, 而美國的頁岩油氣不但價格高昂, 且運輸過程的碳排以及對北極汙染的風險都比海底管道來得高, 這些交換成本都和歐美等「先進國家」倡議的環保背道而馳(轉角國際, 2022年11月30日)。

臺灣媒體對於北溪天然氣管被炸的新聞報導數量不算多, 本研究透過輿情蒐集平臺《潤利艾克曼》、媒體官網及 YouTube 搜尋統計, 自 2022 年 9 月 26 日丹麥發現北溪二號天然氣不明洩漏開始之 30 日內, 國內三大報分別報導則數為《中國時報》報導 9 則、《聯合報》報導 10 則、《自由時報》報導 7 則, 網路原生媒體《風傳媒》報導 8 則、《報導者》報導 0 則, 無線電視新聞頻道《TVBS 新聞臺》報導 10 則、《三立新聞臺》報導 5 則、《中天新聞臺》報導 9 則<sup>10</sup>。三家平面媒體的報導量差異不大, 在克里米亞公投事件積極報導的《風傳媒》這次的報導量相對為低, 但已不亞於平面媒體, 二次派遣記者前往烏克蘭邊境的《報導者》則於調查期間無任何報導, 而《三立新聞臺》可被搜尋到的新聞則數相較其他二臺略低。

初步以新聞標題分析, 《自由時報》是直接將天然氣管爆炸與俄羅斯連結, 例如「北溪管線氣爆 歐美控俄搞破壞」(管淑平編譯, 2022年9月29日)、「北溪管線新漏氣處 發現俄艦」(管淑平編譯, 2022年9月30日), 《聯合報》較多的是經濟面向的論述, 例如「今日北溪, 明日台積?」(黑白集, 2022年10月12日), 並為唯一在新聞標題直接關懷天然氣外洩對全球暖化的影響(羅方好, 2022年10月14日), 《中國時報》幾乎全是以讀者投書方式來陳述這場爆炸, 選用內容多為關切歐洲困境及敵意螺旋, 或是於標題中詢問「社會觀察 北溪管線誰炸的」(黃智賢, 2022年9月29日)。

在電視新聞的樣本蒐集, 《TVBS 新聞臺》以美、俄雙方互相指責的論述

---

<sup>10</sup> 《TVBS 新聞臺》透過搜尋引擎共搜得 28 則網路新聞, 但經由 YouTube 及官方網站蒐集到的影片為 10 則, 而《三立新聞臺》透過搜尋引擎獲得 13 則網路新聞、《中天新聞臺》透過搜尋引擎獲得 23 則網路新聞, 因無法確認網路新聞內容是否有透過電視頻道撥出, 故本研究僅以透過媒體官網及 YouTube 所獲得之影片為研究樣本。

為主，例如「誰破壞北溪管線？西方控俄羅斯動手 克宮駁美國才有動機」（陳佳伶，2022 年 9 月 29 日），並強調俄羅斯疑似破壞北溪管線，影響歐洲的天然氣供應，反而讓「北約更團結」（鄭郁萱，2022 年 10 月 1 日）；《三立新聞臺》則引述烏克蘭官方講法，提出「北溪管路漏氣 烏克蘭指控：俄國策劃恐攻造成」（2022 年 9 月 28 日），亦有引述俄羅斯克里姆林宮的發言，並偏向情緒性文字，新聞標題為「外傳『俄國蓄意破壞』北溪天然氣！克里姆林宮駁斥：愚蠢的推測」（陳慈鈴，2022 年 9 月 29 日）。《中天新聞臺》則引用了較為不同的新聞來源，包含美國前總統川普在社群平臺發文暗示拜登政府可能是此事件的幕後黑手（綜合報導，2022 年 9 月 30 日）、美國福斯新聞網認為俄國沒有理由炸毀對自己有利的管道設施（陳李信，2022 年 10 月 3 日），同時亦為唯一有報導哥倫比亞大學教授薩克斯（Jeffrey Sachs）受訪時，因認為「美國嫌疑最大而被主持人打斷並被要求提供證據」之事件（綜合報導，2022 年 10 月 6 日）；相較其他二臺，《中天新聞臺》顯得更為平衡報導，然而諷刺的是其亦因有著政治立場而平衡，就如同先前所引的報紙或電視媒體，均呈現出同立場而同溫層的內容。

《風傳媒》在新聞標題則指明著「歐洲緊張情勢升高！波羅的海天然氣管線遭破壞，北約嚴厲警告俄羅斯」（閻紀宇，2022 年 9 月 30 日）、「俄羅斯把天然氣當武器，能源荒難解」（郭家宏編輯，2022 年 10 月 11 日），相較於報紙，《風傳媒》在標題及內文加重了俄羅斯可能是這起爆炸凶手的可能性，例如引述有關《待售的世界》系列叢書作家布拉斯（Javier Blas）所言「洩漏更可能是一個信息，即俄羅斯正在對歐洲開啟能源戰爭的一個新的前線。它先是把天然氣供應武器化……可能攻擊過去用來輸送能源的能源基礎設施」（美國之音，2022 年 9 月 28 日），然而連《美國之音》都沒有提到的是，布拉斯亦為美國最大財經資訊公司彭博社（Bloomberg News）資深記者，他的發言很有可能是從美國利益出發，而美國正是在這場天然氣管炸毀的疑雲中，順利售出頁岩油氣的獲利者。2018 年，《美聯社》曾經報導，當時美國總統的川普嘲笑、也反對德國與俄羅斯的北溪天然氣管道興建計畫與交易，就是為了要取代俄羅斯，以美國的液化天然氣賣給德國與歐洲，川普因此在北約峰會開始時，表示「北溪天然氣管使德國完全被俄羅斯控制，並淪為俘虜」（AP, 2018, July 16）。在爆炸發生前，烏克蘭總統澤倫斯基稱北溪二號是

「危險的政治武器」、當時的英國首相強生(Boris Johnson)則說歐洲必須「阻止北溪天然氣流入我們命脈」，美國更對參與工程的俄國企業祭出制裁以擋下北溪二號的興建(張曉雯譯，2022年2月23日)，布林肯在2021年的美國國會聽證會上表示「決心盡我所能地阻止北溪二號管道的建成」，副國務卿 Victoria Nuland 則於2022年1月提出警告「無論俄羅斯以任何方式入侵，北溪二號都不會前進」(Green, 2022, October 7)；爆炸發生後，平日被認為是「專業」報紙或「質報」的西方主流媒體，卻都沒有再提問上述這些政治人物對於先前發言的回應。

德國前總理梅克爾(Angela Merkel)卻與美國持相反的態度，期望從俄羅斯得到更多的天然氣，而當時德國已有35%的天然氣來自俄國，梅克爾卻希望還能更高；對俄羅斯而言亦希望透過海底管線向歐洲輸出天然氣，而非仰賴這些老舊、缺乏效率，且須繳交高額過境費給波蘭與烏克蘭的陸路管線(張曉雯譯，2022年2月23日)。

管線爆炸後緊接著冬季來臨，歐洲多國如捷克、德國、義大利、瑞典以及英國等，皆因天然氣價格暴漲而爆發遊行，美國能源大亨、德州天然氣業者 Tellurian 董事長 Charif Souki 表示，美國將會是最大受益者，能以大幅的溢價出口天然氣(高永光，2022年9月30日)。法國總統馬克宏直指美國以貴4倍高價出售，並非真正友誼，接著法國經濟兼財政部長勒梅爾(Bruno Le Maire)也表示，無法接受美國借俄烏衝突獲取暴利，並強調「不能讓美國利用俄烏戰爭主導全球能源市場」(吳美觀，2022年10月12日)。

總部設於紐約的媒體評論組織 *Fairness & Accuracy In Reporting (FAIR)* 綜整了北溪天然氣管爆炸後的相關媒體報導，發現儘管沒有證據，仍有許多西方媒體都對俄羅斯表示懷疑，包括彭博社(2022年9月27日)、Vox(2022年9月29日)、美聯社(2022年9月30日)等，並發表了大量文章(例如 Business Insider, Vox, Newsweek)與使用「陰謀論」一詞來回覆有關美國動機的可能性；FAIR 提出雖然目前仍然不確定誰是北溪管道事件的幕後黑手，但這次爆炸是擁核大國之間直接對抗升級的分水嶺，媒體在這一問題上的瀆職行為不僅威脅到新聞界的信譽，實際上更危及了整個人類文明(Greene, 2022, October 7)。

英國泰晤士報(The Times)刊載一篇報導，烏克蘭總統顧問波多利亞克

告訴記者「俄羅斯的工作方式和其他國家不同，不要在俄羅斯的行動中找任何理性的邏輯」，德國前情報局長漢寧（Augst Hanning）則指出美國、烏克蘭、波蘭和英國及波羅的海國家都有理由反對北溪二號；並用了《紐約時報》關於俄羅斯已經開始估算修復費用的報導，並認為在這次的「全球懸案」中，美國、俄羅斯甚至英國都有嫌疑（Bennetts, 2023, February 2）。

如此看來，俄羅斯似乎沒有理由炸毀自己的重要生財器具，但為何美國及歐盟仍信誓旦旦地表示「只有俄羅斯具備動機跟手段來破壞北溪天然氣管」？曾於北溪被炸毀後在個人推特寫道「謝謝你，美國」（Thank you, USA）的波蘭議員 Radek Sikorski，便持續於個人推特表示「北溪的唯一邏輯是讓普京能肆無忌憚地對東歐進行詭詐或發動戰爭」，紐約時報亦提出俄羅斯犯案的可能性是「普丁要給西方一個教訓」、CNN 則表示「破壞北溪可以顯示出俄羅斯的能力」，歐洲官員與西方媒體均傳達出普丁的瘋狂，以至於不惜炸毀可以向歐洲售出每年數十億美元的重要管道；政府及媒體只要將俄羅斯貼上邪惡標籤，那麼一切的指控便不需要證據，反正普丁已經被傳為得了帕金森氏症、尿失禁、跌倒到滿身穢物、深陷政權危機、以核彈威脅世界的「瘋子」一名（Fagin, 2022, February 24; Krepon, 2022, March 1；趙怡雯，2023 年 11 月）。

## 肆、媒體的「報導」與「不報導」

### 一、戰爭與媒體的共舞

第一次世界大戰，英國建立了資訊部（the Ministry of Information）以及敵軍宣傳部（the Department of Enemy Propaganda），美國則成立了公共資訊委員會（Committee on Public Information），透過官方部門的成立，政府可宣揚一致性的資訊內容（Young & Jesser, 1997／陳衛星譯，2005；轉引自胡光夏，2007a，頁 88-89）；在政府與媒體的宣傳下，人們憎恨敵軍「德國」，並影響到文化交流等其它層面，例如當時的波士頓交響樂團便不再演奏德國作曲家貝多芬的交響樂曲（Scahill, 2022, April, 15）。

越戰則是美國軍隊與媒體間衝突及不信任的轉捩點（Sharkey, 1991；轉

引自胡光夏，2007a，頁 93），儘管當時會由國防部固定舉辦「說明會」，提供給媒體戰爭消息，但對於報導內容採取較為寬鬆的態度，導致活生生的戰爭畫面被帶到美國民眾的家中時，造成境內的反戰浪潮，因此越戰也埋下了美國政府在後來的軍事行動中，對媒體採取有效的規範想法與舉措（胡光夏，2007a，頁 94）。接著，美軍在入侵巴拿馬時首次啟用「全國媒體聯合採訪」制，並於第一次波斯灣戰爭期間更為精緻且制度化，聯合採訪系統的成立協助軍方得以限制記者的行動，並可要求審查媒體採訪的新聞稿（胡光夏，2007b，頁 142-145），「媒體就像是魚缸裡的金魚，軍方餵什麼，記者們就吃什麼」（江志強，2006，頁 31）。

第二次波斯灣戰爭時，美國則進一步建置「隨軍採訪記者團」，媒體的組成大多是軍方所信賴的記者所組成，戰爭中的新聞都是由美國政府巧妙地安排，美軍中央指揮部在固定時間提供簡報給新聞界，以爭取媒體及國際認同，美國及英國的記者可以在最重要的戰場位置進行報導，美國媒體甚至獲得了許多獨特的技術與服務，例如大多數的媒體僅能依賴 CNN 提供的戰車畫面（胡光夏，2007b，頁 148）。波灣的另一個戰場是在發兵之前的英美與主流媒體；2003 年，美國總統布希（George W. Bush）以及國務卿包威爾（Collin L. Powell）分別在國情咨文以及聯合國安理會上，指控伊拉克藏匿大規模、毀滅性的武器，這番言論成為各國媒體大規模報導的題材，例如《紐約時報》以及《華盛頓郵報》均在社論中肯定華府提供的「證據」，讓全世界都知道了伊拉克的作為；直到 2011 年伊拉克戰爭結束時，美國及英國都未能找到他們所聲稱的「大規模、毀滅性武器」，然而在開戰前西方國家都已「透過媒體的報導向國際輿論爭取認同，進而形塑出一個戰爭政策民意」（江志強，2006，頁 41），輿論戰成為實現戰略目標的重要武器（孟繁宇，2006）。

媒體成為政府爭取國內民意及國際輿論的重要夥伴，卻未能盡到「第四權」的職責對政府行為進行監督，甚至連「平衡報導」、讓利益衝突的雙方或多方，在新聞報導或評論過程中有平等被呈現的機會都難以實現，臺灣媒體對於俄烏戰爭的報導數量遠高於敘利亞內戰及阿富汗戰爭，然而並不是敘利亞及阿富汗的戰爭不夠慘重或不夠重要，而是我們的媒體選擇性地報導。

在亞洲，敘利亞受「阿拉伯之春」影響，於 2011 年初的反政府示威活動演變成了武裝衝突，進而爆發內戰；據《敘利亞人權瞭望臺組織》及《聯

合國教科文組織》<sup>11</sup>公佈，包含平民約有 38 萬敘利亞人死於戰爭、560 萬人因此成為難民（劉軒毓編輯，2021 年 3 月 15 日）；直至 2023 年 1 月，敘利亞的內戰尚未停止，依據《聯合知識庫：全文報紙資料庫》查詢，聯合報系國內報紙 2022 年 1 月 1 日至 10 月 19 日止，有關「敘利亞」的新聞僅有 71 筆，遠低於聯合報系國內報紙有關「烏克蘭」的新聞 2,819 筆。

另一個則是讓美國參戰最久的國家：阿富汗。依據美國政府對外設立及資助的國有非軍事國際媒體機構《美國之音》（VOA News）報導，布朗大學（Brown University）以戰爭成本計算，從 2001 年開始的阿富汗戰爭已造成約 24.1 萬人死亡，聯合國阿富汗援助團亦提供數據指出，僅僅是在 2021 年的前三個月已有超過 570 名平民喪生（Noorzai, Niazi & Sirat, 2021, May 4）。阿富汗戰爭帶來的死亡與財力損耗並不亞於俄烏戰爭，2021 年的喀布爾國際機場撤僑行動，人群攀爬飛機、民眾從空中墜落的畫面仍歷歷在目，但透過《聯合知識庫：全文報紙資料庫》查詢 2021 年有關「阿富汗」的新聞為 477 筆，依然遠低於 2022 年的「烏克蘭」新聞於臺灣的聯合報系報導數量。

從文明的搖籃「敘利亞」到中亞十字路口「阿富汗」，數據資料揭示這些國家因戰爭而失去生命與家園的人，累計高達數百萬，然而在臺灣主流媒體的報導量卻遠少於俄烏戰爭；倘若生命的質量應是同等，那麼是什麼原因讓臺灣如此關心這場距離我們 8,000 公里的「他者」戰爭？

經濟學者郝曼（Edward Herman）與語言學家杭士基（Noma Chomsky）長期關注政府機構如何聯手媒體以形塑社會的共同認知，包含將戰爭的受害者區分為「有價值」與「無價值」，「有價值的受害者」會被大力報導，並用以顯示出某些國家的邪惡，協助推進美國政府當局的政策制定（Herman & Chomsky, 2002／沈聿德譯，2021），此外他們更提醒主流媒體在處理美國附庸國或其它國家選舉時的雙重標準，倘若遇上政權不受美國認同，便會強烈主張「有問題的選舉比沒有選舉更糟糕」（同上引，第三章）；Chomsky 進一步以美國 911 事件為藍本，批判媒體與政客一同起舞，強化人民的國家意識型態且催化了不必要的戰爭（Chomsky, 2001／丁連財譯，2001）。

---

<sup>11</sup> 為閱讀通順而省略上述二個組織的英文名稱，特此註釋：《敘利亞人權瞭望臺組織》（Syrian Observatory for Human Rights, SOHR）、《聯合國教科文組織》（United Nations Education Scientific and Cultural Organization, UNESCO）。



## 二、回顧與思考「克里米亞」及「北溪天然氣管」新聞，餵養了我們什麼？

曾經有研究者針對美國六大報紙在 2014 年的克里米亞事件上進行頭條新聞分析，結果顯示俄羅斯和美國等「強大」的國家以代理人之姿占據媒體的頭條版面，而烏克蘭和克里米亞則沒有發言權，大眾媒體可能反映了當前的世界秩序，即有影響力的國家在國際舞臺上占據著主導地位。研究同時還發現自由派和保守派的媒體在構建事件的方式上沒有重大差異，相比美國以國際事務調解者與最終權威的身分呈現，俄羅斯則被型塑為侵略者的單一形象<sup>12</sup>，研究認為這些結果表示了某些國際事件可能由美國媒體統一報導，而這簡化了多元的敘事與觀點，對民主社會來說是有問題的 (Sorokina, 2017)。

同樣是克里米亞的公投，里斯本大學是以俄羅斯及烏克蘭的媒體報導進行研究，發現兩國的電視頻道對於公投的評論有著截然不同的解釋，例如俄羅斯電視臺認為公投過程是符合國際程序的、鞑靼人有被納入投票名單、駐紮於黑海的俄羅斯軍方未干涉公投過程、機場與基礎設施的封鎖為防止基輔的必要措施、公投結果是克里米亞「回家」的表現，而烏克蘭電視頻道則對以上議題採取相反的論點；研究結果認為「兩國媒體都在複製各自政府的官方話語，而沒有對真正引發事件的不同觀點進行論述與討論」，媒體通過呈現具體事實、省略部份事件、重新解釋與反映雙方政治及經濟菁英的利益，都協助了克里米亞重返家園或是被大國吞併的公眾輿論聲浪 (Krutikova, Freire & Santos, 2019)。

臺灣媒體也可以顯見「報／不報」、「消息來源」或是「議題」的選擇，在克里米亞公投事件，一向與俄羅斯保持戰略夥伴關係以制衡西方的中國大陸，因其公投觸及了北京面對「領土完整性」的敏感性，以及反對外國干涉他國內部事務的方針，並考量到中國所主張的國境內，包含新疆、西藏、蒙

---

<sup>12</sup> 由於該研究未針對消息來源進行內容分析，因此難以明確得知俄羅斯是否有發言權，但依據研究結果發現媒體均以「克里米亞／烏克蘭侵略者」的形象呈現，與俄羅斯官方所稱之「回家」不同 (Krutikova, Freire & Santos, 2019)，故合理推斷俄羅斯的發言權應相對美國為低。

古、甚至臺灣與香港問題等，可能會藉由克里米亞而為自己發聲，因此並不承認這次的公投結果（潘維庭，2014 年 3 月 17 日；魏國金，2014 年 3 月 19 日），而長期被質疑是「紅媒」的「旺中媒體集團」，《中國時報》在此事件中的報導數量明顯低於其他二家報社，《中天新聞臺》更是選擇完全不報導。

中國若忌憚克里米亞公投會帶動領土內其它地區的獨立主張，那麼臺灣的媒體這時應該是支持公投、支持克里米亞所提出的自治與語言文化的自決權，尤其是立場與中國站在對立面的「綠媒」更應如是；然而從媒體的議題設定與消息來源來看，我們在這件事情上，幾乎是不分黨派立場地站在「大烏克蘭」與代理者「美國」的角度，而漠視克里米亞訴求並選擇性地報導「非俄裔民族」的聲音。

2022 年北溪天然氣管爆炸案，臺灣媒體的報導量亦不多見，自丹麥於波羅的海發現漏氣的一個月間，三報僅有 26 則報導，相較於 2022 年報導烏克蘭與俄羅斯的 2,919 則新聞<sup>13</sup>，這場爆炸事件嚴重影響歐洲能源供給，已導致多國政府及民眾無法負擔節節高漲的能源價格、甚至影響到英國最短命的首相特拉斯（Elizabeth Truss）上任僅 45 天便宣布辭職的重大能源與經濟通膨問題（Victor, 2022, October 21），臺灣媒體對於北溪天然氣管的報導力道可謂相當「輕盈」。

依據華盛頓郵報的報導顯示，在普丁長期執政期間，克里姆林宮將能源作為一種政治和經濟槓桿工具，利用切斷能源來脅迫歐洲各國；這項指控可靠嗎？來自 9 個國家、23 名外交官認為俄羅斯沒有道理自己炸毀北溪天然氣管而放棄這種影響力，俄羅斯甚至在俄烏戰爭的前幾日，便已將北溪二號泵滿了 3 億立方米的天然氣，為輸往德國做準備（Harris, Hudson, Ryan & Birnbaum, 2022, December, 21）；況且俄羅斯只需要關掉氣閥，便可以停止販售天然氣給歐洲，如同普丁所說「只要打開閥門即可」（周辰陽，2022 年 10 月 14 日），供應與否僅是閥門的開或關，無須大費周章地進行海底爆破。

---

<sup>13</sup> 研究者透過輿情蒐集系統《潤利艾克曼》以關鍵字「烏克蘭 & 俄羅斯」的方式查詢，樣本調查區間為 2022 年 2 月 24 日至 12 月 24 日，共計蒐得《中國時報》532 則、《聯合報》754 則、自由時報 1,633 則，三報合計為 2,919 則，因本數字僅採取三大報以及單篇新聞中同時出現「烏克蘭」及「俄羅斯」者，故和前述透過《聯合知識庫》查詢聯合報系（《聯合報》、《經濟日報》等）有「烏克蘭」的新聞則數有所差異，此為母體及關鍵字條件設定之不同。

連續 2 次派遣記者前往烏克蘭邊境的網路原生媒體及獨立媒體《報導者》，對於俄烏戰爭議題有著深刻的描寫<sup>14</sup>，在這次的北溪天然氣管炸毀的議題中未見其論述，研究者透過其官網搜尋「北溪」可發現 2022 年共計 1 則新聞及 1 則評論與北溪天然氣的議題較為直接，標題分別為「為何掉入為普丁買單的兩難？專訪三黨國會議員，俄烏戰爭給德國的慘痛一課」（劉致昕，2022 年 4 月 8 日）、「黃哲翰／德國『俄夢』醒了沒（下）：誰為『普丁同情者』負責？」（黃哲翰，2022 年 5 月 12 日），報導方向將德國及歐洲若使用俄羅斯的天然氣便是協助普丁增加軍援攻打烏克蘭作為連結，可惜卻未見在北溪爆炸後，歐洲支付高於 4 倍的價格向美國購買液化天然氣、購買美國的天然氣亦是在資助戰爭經費等相關探討，畢竟美國在這場戰爭中一直源源不斷地為烏克蘭提供軍援。

2023 年 2 月 8 日，曾獲普立茲新聞獎的獨立記者赫希（Seymour Hersh）在其個人網頁上發布一篇名為「How America Took Out The Nord Stream Pipeline」的調查報導，透過祕密證人及多項間接證據，揭露美國是北溪爆炸案的兇手，而美國爆破的北溪天然氣管，德國等多個歐洲國家都有股權，美國的行為等同是毀損盟友的財產（Hersh, 2023, February 8），然而《紐約時報》及《華盛頓郵報》卻對這篇報導降溫處理，讓人懷疑美國政府能夠影響媒體報導題材取捨態度，或者可說美國主流媒體長年來在類似北溪等議題，自動服膺白宮的視野，無論是哪一種，都讓人對於具有政治與國際影響力的美國主流媒體感到不寒而慄（張競，2023 年 2 月 11 日）；中國大使透過官方聲明提出西方媒體對北溪爆炸最新調查結果「集體沈默」，西方媒體的選擇性失明，說明了奉行偏見和雙重標準在西方輿論界大行其道，並呼籲美國向世界作出解釋（俄羅斯衛星通信社，2023 年 2 月 15 日）。

在戰爭中，「凶手」可能顯而易見或是各自有其立場論述，但「推手」卻包含了有意為之或不自知。透過新聞的檢索與閱讀，無論是在克里米亞公

---

<sup>14</sup> 研究者粗略觀察，相較於各國媒體於俄烏戰爭在經濟、能源、國家安全、自由和平等不同的報導內容，初期臺灣媒體派遣記者前往戰地採訪時，著重於烏克蘭難民的處境以及臺灣相關議題，例如《報導者》關懷的是「試圖傳遞戰火下人們的多元而真實的切面」（劉致昕、洪琴宣、柯皓翔，2022 年 3 月 14 日）、《中央通信社》則訪問烏克蘭哈爾科夫市長並表示「感謝臺灣人善心 盼戰後來訪」（鍾佑貞、林行健，2022 年 6 月 3 日），然研究者亦感受到其報導所傳遞出來的俄烏戰爭與歐美主流新聞，並無差異。

投或是北溪天然氣管炸毀的重大事件中，發現臺灣媒體會選擇性地減少報導量、或是技巧性地缺席於不同觀點，尤其以北溪事件來說，在動機及證據不足的情況下，直接以「俄羅斯行為不需要合理解釋」來「解釋」一切，那麼在更多複雜的俄烏問題時，媒體又會花多少時間來陳述不同意見。當媒體長期地提供單方面立場的論述，閱聽大眾便容易以敵意的眼光看待與自己立場不同的人，日積月累媒體忽略了自己第四權的責任，成為戰爭的推手與催化劑，就像是現在烏克蘭境內的不同語言族裔，彼此仇視而不容見於彼此。

## 伍、反思，媒體生態的結構性問題與西方觀點的影響

最後，撇除愛國主義對媒體立場的影響（Mercier, 2005），又或是公共媒體例如 BBC 的虛假平衡（高佩勳，2019 年 11 月 29 日），研究者反思在媒體私有化的制度下，對於克里米亞事件及北溪天然氣管爆炸的媒體責任，是否真有其難以平衡報導或採用多方訊息來源之困難處？

其一是外媒採購的高額成本，由於購買海外新聞的授權費用對於營運已日漸困難的媒體來說，是相當不輕的負擔，以電視新聞臺為例，每年在 CNN 的版權採購便是百萬元臺幣的成本，因此臺灣媒體大多會優先選購較有收視率的海外通信社或是主流媒體，例如 CNN、AP、BBC、NHK、半島電視臺等等，代表俄羅斯觀點的《RT 電視臺》（Russia Today）或是《俄羅斯衛星通訊社新聞》（Sputnik）在畫面少、不被臺灣熟悉的情況下，自然不會置於採購清單，也就不太可能出現在社會大眾面前。

其二則是外語編譯人才的組成與培訓，承接著外媒採購的流程，接下來則是媒體內的國際新聞部需篩選並將新聞編譯成中文內容，而英語的編譯人才最易獲得與培訓，其次例如法語、日語等，俄羅斯語在臺灣較為冷門，儘管有俄羅斯語文學系或是研究所，但仍是少數，且媒體未必肯花經費及員工編額來培養少數語言的編譯人才，語言的距離自然造成了媒體在採用新聞來源來的障礙之一；不只是語言，對於國際政經關係或是對於歐美外交的認知與熟悉，或許更為重要，諸如我們有從美、英、澳、加等國海歸的學子，卻較少見東歐或其他國家的人才。

其三則是臺灣本地自 1958 年發生的「823 金門炮戰」後，未再發生直接的軍事衝突，僅有來自對岸的 50 萬發炮彈於 21 年間零散地射在金門土地上，直到 1979 年美、中正式建交後，便再無任何砲彈及軍事衝突（薛承泰，2020 年 8 月 23 日），因此臺灣沒有培養戰地記者、對於戰爭也相對陌生，當碰到國際衝突時也只好以外媒消息為主（賴映潔、陳慧蓉及莊錦農，2017），難以發展出有別於外電的獨特觀點。

最後則是新聞駐外人員的萎縮，2014 年的克里米亞公投雖說有媒體派記者前往當地採訪，卻可能因不熟悉東歐及中亞的「透明票匭」制度，導致畫面傳回臺灣顯得突兀，倘若有熟悉東歐文化的駐地記者，那麼或許搭配解說反而能降低「選舉不公」的誤解；依據過往研究資料，1998 至 2010 年間有 18 家美國報社關閉了海外分社（Wadekar, 2015, September 24）、《洛杉磯時報》的 12 家海外分社有 8 家只剩 1 人（Martin, 2012, April 23），超過 1,700 家印刷媒體及 5,000 家廣播電視頻道，依賴《美聯社》進行大部分國際報導（Sorokina, 2017）。西方通訊社被視為資訊帝國主義的一種形式（Boyd-Barrett, 2011），我們都可能只是在重複同樣的故事，如同《冰與火之歌》培提爾以「仿聲鳥」作為自己的家族紋章，本研究力有未逮尚無法調查或研究臺灣各媒體的駐外記者數量及駐處分布，卻感到仿聲鳥不斷鳴唱著沒有自我靈魂的歌曲。

臺灣媒體在成本、語言、戰爭熟悉及駐外人力等考量下，對於俄烏之間的衝突會選用美國等西方媒體的觀點，似乎顯得情有可原，然研究者亦自問倘若這些非主流的媒體願意無償或以更低價格供臺灣授權使用，臺灣媒體可自由閱讀這些小媒體並採綜合編譯等方式，都有可能提供更多樣與豐富乃至修正主流觀點的事實與看法，我們的媒體又有多少比例會採用？而英語系的國家或媒體亦有提供不同的觀點，例如這次赫希對於北溪二號的報導，臺灣僅有《聯合報》刊載於平面，其他二報皆以網路新聞的方式處理，語言或成本雖然成為一個障礙，但亦非絕對的原因。而 2022 年臺灣媒體《報導者》、《中央通訊社》、《上報》均有派遣記者前往烏克蘭及波蘭，除了帶回與臺灣相關的訪問議題外，對於難民及戰爭的報導與美國主流媒體並無不同，增加了國際事務的參與，卻令人反思自我的觀點在哪？

一如英國《衛報》（The Guardian）的文章自省，在批判俄羅斯媒體偏頗

的同時，西方習慣性地淡化俄羅斯說法或是沒有證據的胡言亂語，又做到多少的客觀報導（New East network expert panel, 2014, August 4）？泱泱大國如美、英、俄尚無法做到多方併陳，要求臺灣能海納百川多元呈現似是過於能人所不能；臺灣媒體親近或選擇新自由主義下的美國觀點，有其體系相近的前因，英美主流媒體的觀點透過臺灣媒體「仿聲」而吟，或許音頻各有不同，但整體來說若能多方吟唱，或許能逐漸演變出自我曲調。

烏克蘭在 1991 年獨立後，親歐派建立新民族與去俄羅斯化的政策（吳玉山，2022），在公投後的克里米亞已逐漸恢復俄羅斯語言的電視頻道、烏克蘭語的電視頻道則相對減少，那麼這些年輕人在對民族與自我的認同，可能又將再一次經歷矛盾。2023 年 1 月，美國表示將協助烏克蘭拿回克里米亞，而這有可能成為俄羅斯發動核戰的紅線（Johnstone, 2023, January 19）；《莫斯科時報》（The Moscow Times）專欄作家 Mark Galeotti 曾形容「7 年後的克里米亞既沒有成為人間樂土，也未至於淪為地獄」（Galeotti, 2021, April 21），儘管克里米亞在 2019 年上半年成為全俄經濟增長最快的地區，但實際上還是接近墊底<sup>15</sup>（The Moscow Times, 2019, June 3）；那麼，我們看到了是樂土還是地獄的克里米亞？

## 參考書目

- 〈中國大使痛批西方媒體對北溪爆炸最新調查結果集體沈默，呼籲美國向世界作出解釋〉（2023 年 2 月 15 日），《俄羅斯衛星通信社》。取自 <https://big5.sputniknews.cn/20230215/1047945040.html>
- 〈北溪管路漏氣 烏克蘭指控：俄國策劃恐攻造成〉（2022 年 9 月 28 日），《三立新聞臺》。取自 <https://www.setn.com/News.aspx?NewsID=1184318>

---

<sup>15</sup> 依據《莫斯科時報》報導，自 2014 年起克里米亞就獲得了來自莫斯科當局的大量資金注入，2015 年至 2022 年間，俄羅斯花費超過 130 億美元用於克里米亞經濟，克里米亞 2019 年經歷了俄羅斯迄今為止最快的經濟成長，1 月至 3 月的經濟受到建築業和製造業的推動分別成長了 20% 以上，雖然如此，這僅意味著克里米亞不再是俄羅斯最貧困的地區，但排名仍然接近墊底，該報引用莫斯科國立大學區域經濟專家及加拿大皇家銀行業者的話提出，克里米亞的經濟成長來自於過去太窮困，所以基數低導致成長幅度快，但整體仍然是貧窮（The Moscow Times, 2019, June 3）。

- 〈北溪管道炸毀之謎：追蹤俄國金雞母與歐洲「能源算計」〉（2022年11月30日），《轉角國際》。取自  
[https://global.udn.com/global\\_vision/story/8663/6804583](https://global.udn.com/global_vision/story/8663/6804583)
- 丁連財譯（2001）。《9-11》。臺北市：大塊文化。（原書：Chomsky, N. [2001] 9-11: *Was there an alternative?* New York, NY: Seven Stories Press）
- 方鵬程（2006）。〈全球傳播的媒體操控與框架競爭：以2003年波斯灣戰爭為例〉，《復興崗學報》，88：71-96。
- 包亞克、馮建三譯註（2022）。〈烏克蘭的軍事情境〉，《傳播、文化與政治》，15：139-159。
- 任中元編譯（2014年3月17日）。〈公投前夕出兵 俄軍入侵烏本土 美歐將制裁〉，《聯合報》，A4版。
- 任中原編譯（2014年3月25日）。〈俄占克島 普亭保密一流 美情搜鬧笑話〉，《聯合報》，A15版。
- 江志強（2006）。《美國媒體再現戰爭新聞之研究－以2003年美伊戰爭為例》。中國文化大學美國研究所碩士論文
- 江靜玲（2014年3月26日）。〈遭踢出G8 俄：沒在怕〉，《中國時報》，A10版。
- 吳玉山（2022）。〈導讀：交界、混和與衝突所定義的千年歷史〉，曾毅、蔡耀緯（譯）《烏克蘭：從帝國邊疆到獨立民族，追尋自我的荊棘之路》，頁23－29。臺北市：聯經。（原書：Plokhy, S. [2021] *The gates of Europe: A history of Ukraine*. New York, NY: Basic Books）
- 吳美觀（2022年10月12日）。〈美靠天然氣大發橫財 歐洲2大國被坑怒嗆〉，《中時新聞網》。取自 <https://ctee.com.tw/news/global/733976.html>
- 李晉緯譯（2022年9月27日）。〈外海發現北溪二號漏氣 丹麥劃設海上禁航區〉，《中央通訊社》。取自  
<https://www.cna.com.tw/news/aopl/202209270117.aspx?topic=4013>
- 沈聿德譯（2021）。《製造共識：媒體政治經濟學》。臺北市：野人文化。（原書 Herman, E. S. & Chomsky, N. [2002]. *Manufacturing consent: The political economy of the mass media*. New York, NY: Pantheon Books.）
- 周辰陽（2022年10月14日）。〈普亭提議恢復供氣 德立刻拒絕〉，《聯合報》，A10版。
- 周建宏（2016）。《俄羅斯兼併克里米亞：地緣政治的視角》。政治大學俄羅斯研究所碩士論文。
- 孟繁宇（2006）。〈論析輿論戰與戰爭之關係〉，《復興崗學報》，86：87-113。
- 社論（2014年3月24日）。〈在普亭狼爪和西方口惠下的烏克蘭〉，《聯合報》，A2版。

- 社論（2022 年 2 月 25 日）。〈記取烏克蘭教訓 對自己命運負責〉，《中國時報》，A02 版。
- 施正鋒（2015）。〈烏克蘭的克里米亞議題〉，《台灣國際研究季刊》，11(2)：21-50。
- 查修傑（2014 年 3 月 15 日）。〈克里米亞公投在即 俄羅斯、烏克蘭大舉軍演〉，《三立新聞臺》。取自  
<https://www.setn.com/News.aspx?NewsID=16833&From=Search&Key=克里米亞公投>
- 段士元、倪嘉徽（2014 年 3 月 16 日）。〈克里米亞今公投 親俄民兵嚴格盤查〉，《TVBS 新聞臺》。取自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Hvy6OIUZBY4>
- 段士元、倪嘉徽（2014 年 3 月 17 日）。〈克里米亞公投 選民一面倒挺「入俄」〉，《TVBS 新聞網》。取自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A0O68kGudHk>
- 美國之音（2022 年 9 月 28 日）。〈寒冬將至，北溪天然氣管線出現「不明洩漏」 歐洲各國領導人：顯然是人為破壞！〉，《風傳媒》。取自  
<https://www.storm.mg/article/4539709?mode=whole>
- 胡光夏（2007a）。〈媒體與軍隊關係的演進：戰時新聞媒體管制與運用的發展〉，《復興崗學報》，89：77-106。
- 胡光夏（2007b）。《媒體與戰爭：「媒介化」、「公關化」與「視覺化」戰爭新聞的產製與再現》。台北：五南。
- 范庭瑄整理（2014 年 3 月 17 日）。〈怎麼投都一樣！克里米亞公投 選項全是「同意入俄」〉，《三立新聞臺》。取自  
<https://www.setn.com/News.aspx?NewsID=16941&From=Search&Key=克里米亞公投>
- 高永光（2022 年 9 月 30 日）。〈【專家之眼】到底是誰炸掉北溪天然氣管道？〉，《聯合新聞網》。取自 <https://udn.com/news/story/6809/6651268>
- 高佩勳（2019 年 11 月 29 日）。〈失衡的平衡報導—以氣候變遷的科學爭議為例〉，《台灣科技媒體中心》。取自 <https://smctw.tw/4571/>
- 張安平（2014 年 3 月 23 日）。〈烏克蘭的一課〉。《聯合報》，A14 版。
- 張佑之譯（2022 年 9 月 29 日）。〈北溪天然氣管線疑遭人為破壞 外媒分析一次看〉，《中央通訊社》。取自  
<https://www.cna.com.tw/news/aopl/202209290384.aspx>
- 張佑生編譯（2014 年 3 月 20 日）。〈疏遠又敵對 美俄新冷戰〉。《聯合報》，A17 版。
- 張凱耀（2014 年 3 月 17 日）。〈《克島公投》普京十年磨劍 新干涉主義成形〉，《風傳媒》。取自 <https://www.storm.mg/article/28696>



- 張曉雯譯（2022年2月23日）。〈北溪二號天然氣管線是什麼？與烏克蘭危機有何關係？爭議一次看〉，《中央通訊社》。取自 <https://www.cna.com.tw/news/aopl/202202230061.aspx>
- 張競（2023年2月11日）。〈【專家之眼】北溪爆炸羅生門 證據講話見真章〉，《UDN 聯合新聞網》。取自 <https://udn.com/news/story/10930/6964616>
- 莊榮宏（2022年2月25日）。〈這裡不缺內賊〉，《自由時報》，A09版。
- 郭家宏編輯（2022年10月11日）。〈能源類股大漲30%，還會再漲？俄羅斯把天然氣當武器，能源荒難解〉，《風傳媒》。取自 <https://www.storm.mg/lifestyle/4553835?mode=whole>
- 陳李信（2022年10月3日）。〈【每日必看】俄可能自炸北溪？福斯記者反駁"沒理由"〉，《中天新聞臺》。取自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pccFunN-F04>
- 陳佳伶（2022年9月29日）。〈誰破壞北溪管線？西方控俄羅斯動手 克宮駁美國才有動機〉，《TVBS 新聞臺》。取自 <https://news.tvbs.com.tw/world/1919987>
- 陳怡君譯（2021年8月23日）。〈烏克蘭總統：俄歐天然氣管線是危險地緣政治武器〉，《中央通訊社》。取自 <https://www.cna.com.tw/news/aopl/202108230112.aspx>
- 陳品妤（2014年3月17日）。〈反對克島入俄 俄主播：我們能將美國化為核灰燼〉，《三立新聞臺》。取自 <https://www.setn.com/News.aspx?NewsID=16989&From=Search&Key=克里米亞公投>
- 陳慈鈴（2022年9月29日）。〈外傳「俄國蓄意破壞」北溪天然氣！克里姆林宮駁斥：愚蠢的推測〉，《三立新聞臺》。取自 <https://www.setn.com/News.aspx?NewsID=1185060>
- 傅莞淇（2014年3月14日）。〈克里米亞公投在即韃靼人捍衛家園〉，《風傳媒》。取自 <https://www.storm.mg/article/28567>
- 曾毅、蔡耀緯譯（2022）。《烏克蘭：從帝國邊疆到獨立民族，追尋自我的荊棘之路》。臺北市：聯經。（原書：Plokhy, S. [2021]. *The gates of Europe: A history of Ukraine*. New York, NY: Basic Books）
- 黃郁文（2022）。〈淺析俄羅斯「網路戰」—以2022年「俄烏戰爭」運用為例〉，《海軍學術雙月刊》，56(4)：88-104。
- 黃哲翰（2022年5月12日）。〈黃哲翰／德國「俄夢」醒了沒（下）：誰為「普丁同情者」負責？〉，《報導者》。取自 <https://www.twreporter.org/a/opinion-russian-invasion-of-ukraine-2022-germany-complex-2>

- 黃智賢（2022 年 9 月 29 日）。〈社會觀察 北溪管線誰炸的〉。《中國時報》，A10 版。
- 黑白集（2022 年 10 月 12 日）。〈今日北溪，明日台積？〉。《聯合報》，A2 版。
- 楊芬瑩（2014 年 3 月 14 日）。〈克里米亞公投面面觀〉，《風傳媒》。取自 <https://www.storm.mg/article/27997?kw=克里米亞&pi=69>
- 瑞迪（2022 年 3 月 16 日）。〈俄烏戰爭對台灣有何啟示-兩位台灣學者的不同觀點〉，《RFI 法國國際廣播電台》。取自 <https://www.rfi.fr/tw/專欄檢索/公民論壇/20220316-俄烏戰爭對台灣有何啟示-兩位台灣學者的不同觀點>
- 管淑平編譯（2014 年 3 月 18 日）。〈俄主播嗆聲：俄能把美化成輻射灰〉，《自由時報》，A5 版。
- 管淑平編譯（2022 年 9 月 29 日）。〈北溪管線氣爆 歐美控俄搞破壞〉，《自由時報》，A7 版。
- 管淑平編譯（2022 年 9 月 30 日）。〈北溪管線新漏氣處 發現俄艦〉，《自由時報》，A6 版。
- 綜合報導（2022 年 10 月 6 日）。〈【每日必看】專家揭北溪管道"美國炸的" 訪問馬上被卡掉〉，《中天新聞臺》。取自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lK\\_g8HSi3Bk](https://www.youtube.com/watch?v=lK_g8HSi3Bk)
- 綜合報導（2022 年 9 月 30 日）。〈【每日必看】美國做的？俄控：北約曾在北溪漏氣點附近演習〉，《中天新聞臺》。取自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XyGMt-wLtrY>
- 趙竹成（2017）。〈徘徊在歸附與自決之間——烏克蘭東部與克里米亞的選擇〉，洪泉湖編《當代歐洲民族運動：從蘇格蘭獨立公投到克里米亞危機》，頁 101-128。臺北市：聯經出版。
- 趙怡雯（2023 年 11 月）。〈戰爭的兇手與推手：從「妖魔化普丁」論述媒體再現俄烏衝突〉，「2023 台灣社會研究學會年會」，臺北市大安區
- 劉致昕（2022 年 4 月 8 日）。〈為何掉入為普丁買單的兩難？專訪三黨國會議員，俄烏戰爭給德國的慘痛一課〉，《報導者》。取自 <https://www.twreporter.org/a/russian-invasion-of-ukraine-2022-germany-a-brutal-lesson>
- 劉致昕、洪琴宣、柯皓翔（2022 年 3 月 14 日）。〈俄羅斯入侵烏克蘭全紀錄 俄烏戰爭日誌：報導者在波烏邊境見證戰火下的面容〉，《報導者》。取自 <https://www.twreporter.org/a/liveblog-russian-invasion-of-ukraine>
- 劉軒毓編輯（2021 年 3 月 15 日）。〈敘利亞危機十周年 | 十年戰亂 十個數字〉，《央視新聞》。取自

- <http://m.news.cctv.com/2021/03/14/ARTIuyUPxgZzLtXW1lIJ0Abv210314.shtml>
- 潘維庭（2014年3月17日）。〈涉獨立議題 中國作壁上觀〉，《風傳媒》。取自  
<https://www.storm.mg/article/28667?kw=%E5%85%8B%E9%87%8C%E7%B1%B3%E4%BA%9E&pi=61>
- 鄭郁萱（2022年10月1日）。〈護能源！英、法、德加強巡邏波羅的海 北約為俄羅斯更團結〉，《TVBS新聞臺》。取自  
<https://news.tvbs.com.tw/world/1922164>
- 賴映潔、陳慧蓉、莊錦農（2017）。〈誰的他者－臺灣報紙筆下的美國攻伊論述〉，《傳播與發展學報》，34：134-162。
- 賴昭穎、蕭白雪（2014年3月21日）。〈以牙還牙 美俄互制裁〉。《聯合報》，A20版。
- 閻紀宇（2022年9月30日）。〈歐洲緊張情勢升高！波羅的海天然氣管線遭破壞，北約嚴厲警告俄羅斯〉，《風傳媒》。取自  
<https://www.storm.mg/article/4542982?mode=whole>
- 薛承泰（2020年8月23日）。〈八二三 台海最後一次戰役？〉，《中國時報》，A15版。
- 鍾佑貞、林行健（2022年6月6日）。〈烏克蘭難民踏上返鄉路：我們不怕俄軍轟炸 只想住自己家〉，《中央通訊社》。取自  
<https://www.cna.com.tw/news/aopl/202206060024.aspx>
- 簡嘉宏（2014年3月28日）。〈頓內次克 等待歷史抉擇的烏克蘭城市〉，《風傳媒》。取自 <https://www.storm.mg/lifestyle/29290?page=2>
- 魏國金（2014年3月19日）。〈刻意與俄不同調 中國怕激勵分離主義〉。《自由時報》，A5版。
- 魏國金（2014年4月9日）。〈Russia rebukes Germany for minister's 'Hitler comparison' 俄羅斯責難德國部長的「希特勒之喻」〉。《自由時報》，A12版。
- 羅方妤（2022年10月14日）。〈北溪天然氣外洩 暖化雪上加霜 史上最大甲烷災難 10萬公噸氣體進入大氣 影響比二氧化碳更嚴重〉。《聯合報》，A14版。
- 羅印冲（2022年2月25日）。〈「今日烏克蘭 明日台灣」？邱坤玄：可思考北京底線〉，《聯合報》，A10版。
- AP (2018, July 16). Reaction after Trump claims Germany "totally controlled" by Russia. AP. Retrieved from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VV2Lm18kxDo>
- Bennetts, M. (2023, February 2). Who attacked the Nord Stream pipelines? In this

- global whodunnit, the US, Russia and even Britain have all been suspects. *The Times*. Retrieved from <https://www.thetimes.co.uk/article/who-attacked-nord-stream-pipeline-russia-uk-west-ukraine-war-wv99ds7tx>
- Boyd-Barrett, O. (2011). Rethinking news agencies, national development and information imperialism. *Economic and Political Weekly*, 46(13), 85 – 94.
- Fagin, B. (2022, February 24). Column: Putin: A madman among more madmen. *The Gazette*. Retrieved from [https://gazette.com/opinion/column-putin-a-madman-among-more-madmen-barry-fagin/article\\_7d8ec48e-94af-11ec-94c3-1b212cb794c3.html](https://gazette.com/opinion/column-putin-a-madman-among-more-madmen-barry-fagin/article_7d8ec48e-94af-11ec-94c3-1b212cb794c3.html)
- Galeotti, M. (2021, April 21). Crimea endures, neither hellhole nor paragon: Crimea seems to be neither a shining beacon nor a slough of despond, disappointing both Moscow and its critics. *The Moscow Times*. Retrieved from <https://www.themoscowtimes.com/2021/04/13/crimea-endures-neither-hellhole-nor-paragon-a73572>
- Greene, B. (2022, October 7). US media’s intellectual no-fly-zone on US culpability in Nord Stream attack. *Fairness & Accuracy In Reporting*. Retrieved from <https://fair.org/home/us-medias-intellectual-no-fly-zone-on-us-culpability-in-nord-stream-attack/>
- Harris, S., Hudson, J., Ryan, M. & Birnbaum, M. (2022, December, 21). No conclusive evidence Russia is behind Nord Stream attack. *The Washington Post*. Retrieved from <https://www.washingtonpost.com/national-security/2022/12/21/russia-nord-stream-explosions/>
- Hersh, S. (2023, February 8). How America took Out the Nord Stream Pipeline. [Substack]. Retrieved from [https://seymourhersh.substack.com/p/how-america-took-out-the-nord-stream?utm\\_source=substack&utm\\_campaign=post\\_embed&utm\\_medium=email](https://seymourhersh.substack.com/p/how-america-took-out-the-nord-stream?utm_source=substack&utm_campaign=post_embed&utm_medium=email)
- Johnstone, C. (2023, January 19). US may help Ukraine launch an offensive on Crimea. *Scheerpost*. Retrieved from <https://scheerpost.com/2023/01/19/us-may-help-ukraine-launch-an-offensive-on-crimea/>
- Korolkov, A (2014 年 3 月 19 日)。〈回溯克里米亞：赫魯曉夫將其贈與烏克蘭〉，《透視俄羅斯》。取自 <http://tsrus.cn/eshi/2014/03/19/32983.html>

- Krepon, M. (2022, March 1). Putin plays the mad man card In Ukraine. *Forbes*. Retrieved from <https://www.forbes.com/sites/michaelkrepon/2022/03/01/putin-plays-the-mad-man-card-in-ukraine/?sh=27e96e451405>
- Krutikova, Y., Freire, M. R. & Santos, S. J. (2019). Agenda-setting and framing in foreign policy the case of Russian and Ukrainian televised coverage of the Crimea case. *JANUS.NET, e-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10(1), 44-65. e-ISSN: 1647-7251, doi: 10.26619/1647-7251.10.1.4
- Martin, J. D. (2012, April 23). Loneliness at the foreign ‘Bureau’: News organizations exaggerate the size of their overseas newsrooms. *Columbia Journalism Review*. Retrieved from [https://archives.cjr.org/behind\\_the\\_news/loneliness\\_at\\_the\\_foreign\\_bureau.php](https://archives.cjr.org/behind_the_news/loneliness_at_the_foreign_bureau.php)
- Mercier, A. (2005). War and media: Constancy and convulsion. *International Review of the Red Cross*, 87(860), 649 – 659.
- National composition of population (n.d.) About number and composition population of UKRAINE by data All-Ukrainian population census'2001 data. *State Statistics Committee of Ukraine*. Retrieved November 15, 2023, from <https://web.archive.org/web/20080323110131/http://www.ukrcensus.gov.ua/eng/results/general/nationality/>
- New East network expert panel (2014, August 4). Is western media coverage of the Ukraine crisis anti-Russian? *The Guardian*. Retrieved from <https://www.theguardian.com/world/2014/aug/04/western-media-coverage-ukraine-crisis-russia>
- Noemí1, M. L., Pablo1, M. R. & Juan-Pablo, M. B. (2022). Twitter content curation as an antidote to hybrid warfare during Russia's invasion of Ukraine. *El Profesional de la Información*, 31(3), 1-17.
- Noorzai, R. Niazi, L. & Sirat, S. (2021, May 4). Afghan War victims, human rights groups demand cease-fire, inclusive peace. *VOA News*, Retrieved from [https://www.voanews.com/a/extremism-watch\\_afghan-war-victims-human-rights-groups-demand-cess-fire-inclusive-peace/6205439.html](https://www.voanews.com/a/extremism-watch_afghan-war-victims-human-rights-groups-demand-cess-fire-inclusive-peace/6205439.html)
- Petro, N. (2022, November 25). The tragedy of Crimea. *Responsible Statecraft*. Retrieved from <https://responsiblestatecraft.org/2022/11/25/the-tragedy-of-crimea/>
- Sasse, G. (2007). *The Crimea question: Identity, transition, and conflict*. Cambridge, MA: Harvard Ukrainian Research Institute.
- Scahill, J. (2022, April, 15). Noam Chomsky and Jeremy Scahill on the Russia –

- Ukraine war, the media, propaganda, and accountability. *The Intercept*. Retrieved from <https://theintercept.com/2022/04/14/russia-ukraine-noam-chomsky-jeremy-scahill/>
- Shevchenko, V. (2014, March 11). "Little green men" or "Russian invaders"? *BBC*. Retrieved from <https://www.bbc.com/news/world-europe-26532154>
- Sorokina, A. N. (2017). Crimean crisis of 2014 in the conservative and liberal U.S. media. *Russian Journal of Communication*, 9(2), 169-184.
- SZE, H. (2021 年 4 月 25 日)。「被吞併的第 7 年，克里米亞有甚麼變化？」，《CUP Media》。取自 <https://www.cup.com.hk/2021/04/15/russia-crimea-transformation/>
- The Moscow Times (2019, June 3). Crimean economy named fastest growing in Russia. Retrieved from <https://www.themoscowtimes.com/2019/06/03/russian-gravedigger-fakes-death-to-avoid-paying-alimony-debt-a65849>
- Victor, D. (2022 年 10 月 21 日)。「英國最短命首相」：特拉斯為何黯然辭職》，《紐約時報中文網》。取自 <https://cn.nytimes.com/world/20221021/uk-politics-liz-truss/zh-hant/>
- Wadekar, N. (2015, September 24). State of the media: International coverage in U.S. journalism. *Neon Tommy: Annenberg Digital News*. Retrieved from <http://www.neontommy.com/news/2015/09/state-media-international-coverage-us-journalism>
- РБК-Україна (2014, March 14). Ukraine to КСУ признал неконституционным решение о проведении референдума в Крыму restrict Russian books, music in latest cultural break from Moscow. *РБК-Україна*. Retrieved from <https://www.rbc.ua/rus/news/ksu-priznal-nekonstitutsionnym-reshenie-o-provedenii-referenduma-14032014171500>

**Transmission or copy of "truth":  
The role play of Taiwanese media in the Russia-Ukraine conflict**

Yi-wen Chao

**ABSTRACT**

Since the outbreak of the Russia-Ukraine war, it has had a significant impact on global politics and the economy. Taiwan's coverage of this war has been noticeably higher compared to other conflicts. This research focuses on two case studies: the Crimea referendum and the Nord Stream explosion. These two events are regarded by the West as the beginning of Russia's annexation of Ukrainian territory and the profound impact on Europe's energy supply. However, the Russian official stance and certain media outlets hold different perspectives on these matters.

By analyzing the discourse and reporting of various media outlets, with particular attention to Taiwan's news sources and information adoption, it was found that regardless of print media, television news, or digitally native news, the exposure of the aforementioned information almost unconditionally adopted the viewpoints of mainstream Western media. When faced with different perspectives in reporting, they tended to choose or avoid presenting them. The research suggests that from 2014 to 2023, our coverage of significant events in the Russia-Ukraine conflict appeared more like an echo chamber of British and American narratives rather than independent reporting from Taiwanese media.

**Keywords:** Crimea, Nord Stream, mainstream media, media representation, Russia-Ukraine conflict, war journalism

---

\* Yi-wen Chao is a Master's degree student at the College of M.A. Program in Communication, National Cheng Chi University, Taipei, Taiwan. ROC. Email: 110941013@g.nccu.edu.tw

· 傳播 文化 與政治 · 第十八期  
2023 年 12 月



## 在川普時代回顧《虐殺器官》： 兼論伊藤計劃眼中的世界體系

黃彥儒\*

### 本文引用格式

黃彥儒（2023）。〈在川普時代回顧《虐殺器官》：兼論伊藤計劃眼中的世界體系〉，《傳播、文化與政治》，18:89-112。

---

投稿日期：2023 年 5 月 31 日；通過日期：2023 年 7 月 30 日。

\* 黃彥儒為政治大學歷史學系博士生，e-mail: 105153501@nccu.edu.tw

## 《摘要》

本文對伊藤計劃的《虐殺器官》提出一種政治性的解讀方式：「屠殺文法」隱喻了本質主義的族群認同和民主政體的結合，給第三世界新興民主國家帶來的族群衝突風險；而屠殺文法反噬美國的結局則預示了川普時代身分政治撕裂美國的現況。伊藤計劃在其小說中描寫的世界體系是強弱二元的，第三世界是沒有主體性的，而世界體系傾覆的動力只來自極少數超人的機械降神。這反映活在 21 世紀 00 年代的伊藤計劃對世界體系有過人的洞察力，但卻也無法超越時代。

**關鍵詞：**世界體系、伊藤計劃、身分政治、虐殺器官、第三世界

## 壹、緒論

早逝的日本科幻小說家伊藤計劃（1974-2009），雖然寫作生涯只有短短三年（大森望，2015，頁 363），生前僅完成兩部原創長篇小說《虐殺器官》及《和諧》（第三部長篇小說《屍者的帝國》只寫了開頭，由圓城塔續完），但離世至今，十餘年來始終受到注目。其中 2015 年至 2017 年，《屍者的帝國》《和諧》《虐殺器官》三部小說均先後改編為動畫電影上映，合稱「伊藤計劃三部曲」，尤為一時盛事。有些論者甚至稱伊藤計劃開啟了「日本 SF 之夏」（若林弘太郎，2018，頁 30）。而臺灣近年也出現了以伊藤計劃為研究對象的碩士論文（楊奕琦，2021）。

至今對伊藤計劃作品的解讀，主要延續作者在作品中的思路展開，以傅柯（Michel Foucault, 1926-1984）、阿甘本（Giorgio Agamben, 1942-）、精神分析等理論為方法，闡發伊藤計劃作品蘊含的意義（如前引若林弘太郎、楊奕琦等）。但筆者更加重視伊藤計劃作品中在科幻文類之內少有的涉及國際政治的一面，因此筆者並不想沿襲既有的討論，寧願站在一個比起後現代主義，對國際政治更感興趣的讀者的角度來思考。本文的目的便是嘗試對伊藤計劃的兩部主要小說《虐殺器官》及《和諧》（前者為主）中的政治性情節略作推敲，解讀其中所呈現的「世界像」，以及它對十餘年後、筆者寫作本文的 2020 年代的讀者來說意味著什麼。

## 貳、作為寓言 / 預言的《虐殺器官》

### 一、「屠殺文法」簡介

《虐殺器官》一書以「屠殺文法」為核心概念。小說敘述美國麻省理工學院語言學者約翰·保羅，在美國國防部贊助下研究古今發生大屠殺社會的語言，包括納粹德國、史達林時代蘇聯、紅色高棉、盧安達大屠殺等。約

翰·保羅發現，這些大屠殺發生前，該社會的語言中都出現了屠殺文法。屠殺文法是和語言不同的深層文法，來自於人腦深處的語言模組，非語言學專家的普通人無法辨認，只能被影響。普通人長時間聆聽含有這種文法的語言後，人腦就會產生變化，腦中的價值判斷受到抑制、扭曲，從而導致大屠殺（伊藤計劃，2007／麥盧寶全譯，2015，頁 187-189）。約翰·保羅將其起源追溯到原始時期，在生存所需糧食不足時，屠殺文法透過語言在群體中散播，以引發屠殺，使人口降低到食物供給穩定的數量（同上引，2015，頁 316-318）。

由於約翰·保羅的妻女在塞拉耶佛被恐怖分子的核彈炸死，他決定：

在他們憎恨我們之前，先讓他們彼此憎恨。在他們想要殺死我們之前，先讓他們互相殘殺。這麼一來，他們的世界和我們的世界就可以隔離開來，殺戮與憎恨的世界，就能與和平的世界隔絕。（同上引，頁 322）

約翰·保羅開始在部分美國官員協助下，在第三世界各國散播屠殺文法使之陷入內亂，從而避免了第三世界恐怖分子繼續襲擊西方。約翰·保羅的行蹤引起了美國政府注意，《虐殺器官》的主角——美國特種部隊上尉克拉維斯·薛帕德數次奉命從事刺殺約翰·保羅的任務。故事結局，克拉維斯得知了屠殺文法的真相，並決定利用約翰·保羅留下的資料，在自己的發言中加入屠殺文法，使美國也陷入內戰和崩潰中，以拯救美國以外的所有國家。

## 二、「屠殺文法」的非現實性

《虐殺器官》的情節一方面緊貼了 911 事件後反恐戰爭時代的現實，但另一方面卻給人一種玄學感。本書初稿於 2006 年參加第 7 屆小松左京賞，於初選獲得最高分，但在決選時，遭到擔任評審的小松左京（1931-2011）本人批評：

伊藤計劃先生的《虐殺器官》，在文筆與「屠殺語言」的點子上都很優秀，但是我認為他應該在最重要的「屠殺語言」上有更多的著墨。此外，引發屠殺行為的男性的動機，以及主角最後採取的行動，都欠缺了說服力，以及與主題的輝映。（大森望，2015，頁 366）

當屆獎項因而從缺。身為日本科幻界元老的小松對本書的這番批評，或許有一定的主觀性質，但也並非無的放矢。「屠殺文法」的相關設定，以及圍繞著這些設定產生的兩位男性角色的行動，如果加以深思，則確實不能不感到有自相矛盾、難以自洽之處。

顯然，現實中的語言學無法找到語言中有「屠殺文法」存在。但即使讀者先假設它有可能存在，小說中對「屠殺文法」所引發的大屠殺過程的描寫，和書中列舉的納粹德國、史達林時代蘇聯、紅色高棉、盧安達等真實歷史中的大屠殺案例，相較之下也有許多扞格之處。

約翰·保羅引發屠殺的國家，在書中具體描寫過的有未明言的某前蘇聯國家（伊藤計劃，2007／麥盧寶全譯，2015，頁 31-54）、索馬利亞（同上引，頁 72-85）及印度（同上引，頁 214-216, 234-254）。另外還有結局克拉維斯·薛帕德引發的美國（同上引，頁 341-342）。從這四個案例，大致能歸納出屠殺文法會帶來三種社會現象：

- （1）屠殺在短期（約半年）內忽然發生
- （2）發動屠殺的軍政領袖處於迷茫或狂熱的不理性狀態
- （3）發動屠殺造成本國政治、社會秩序瓦解，進入「所有人對所有人的戰爭」（使得本國人沒有餘裕襲擊他國）

然而，以大屠殺案例最著名的代表——納粹德國來說，納粹對猶太人的大屠殺，幾乎和這些特徵完全相反。納粹政權雖然不斷向國民灌輸對猶太人的仇恨，但從 1933 年 1 月 30 日希特勒上台，到 1942 年 1 月 20 日萬湖會議確定了滅絕所有歐洲猶太人的《最終解決方案》，迫害行動花了九年時間才提升到最大程度。在這之前，納粹政權內部還一度考慮過流放猶太人到馬

達加斯加的替代方案 (Crowe, 2008/張旭譯, 2015, 頁 245-248)。大屠殺的執行也沒有造成德國秩序崩潰, 它恰恰是國家機器有條理的行動, 由軍警特務人員執行, 對絕大部分德國人保密。<sup>1</sup>如果對萬湖會議的史實略有了解 (2001 年和 2022 年, 兩次被美國和德國改編為電視電影), 便可窺知《最終解決方案》是在官僚的辦公桌和酒會之間擬定的, 與會人員對於如何在屠殺猶太人的同時榨取其勞動力、如何處置德國猶太混血兒等問題進行討論, 充滿了理性的官僚行政風格 (Crowe, 2008/張旭譯, 2015, 頁 351-356)。大屠殺執行者的這種官僚主義風格, 甚至激發了漢娜·鄂蘭 (Hannah Arendt, 1906-1975) 提出「邪惡的平庸性」的著名概念 (Arendt, 1963/薛絢譯, 2013, 頁 279)。納粹德國是先對英法美蘇等列強開戰之後才執行全面的大屠殺, 執行了長達三年之後的 1945 年, 納粹政權才被英美蘇的百萬大軍消滅。我們頂多只能說執行大屠殺佔用了納粹德國不少原可供應戰爭的人力物力, 但本質上沒有妨礙納粹戰爭機器對外侵略爭奪世界霸權, 更不是它覆亡的原因。

至於書中提及的另一案例——蘇聯史達林時代的卡廷森林屠殺, 行動內容是處決兩萬餘名波蘭戰俘而非無差別殺害波蘭人, 由蘇聯祕密警察暗中執行, 真相保密了數十年, 其過程和蘇聯、波蘭兩國普通民眾也是隔離的 (烏蘭譯, 2012, 頁 1-5)。

至此, 我們可以推導出: 《虐殺器官》所談論的, 與其說是種族滅絕式的屠殺, 不如說是內戰。國家機器對無武裝的少數群體發動的種族滅絕, 通常都是單方面、一面倒的處決行動, 完全可以只依靠少數軍警特務人員執行, 執行同時能夠維持國內秩序甚至對外戰爭。只有在一國之內的敵對雙方都擁有武力且實力並不懸殊的情況下, 才會各自對己方群眾進行動員, 從而有可能造成社會秩序崩潰、進入「所有人對所有人的戰爭」而無法威脅他國的結果。

由此再回顧書中情節: 約翰·保羅宣稱他在納粹檔案中發現了屠殺文

---

<sup>1</sup>這種保密的程度有限, 許多德國人在戰時就能或多或少耳聞大屠殺的片斷消息 (Hughes & Mann, 2000/于倉和譯, 2014, 頁 251)。但絕大部分德國人無疑被隔離於大屠殺的執行過程外, 對猶太人的命運抱持冷漠態度, 而沒有參與其中。

法，甚至對古今著名屠殺事件不加具體分析，逕自認定其中存在著一貫的屠殺文法，還脫韁野馬般一路溯源到史前人類生態。此理論看似宏大，卻經不起基本史實的反駁，也和他操縱屠殺文法所產生的效果不相符，無法自治。此人的研究態度如此粗疏，難以想像他真的在麻省理工學院任教過。

「屠殺文法」的另一問題，在於傳播的範圍。約翰·保羅宣稱屠殺文法「只對單一語言圈的人們有用。只要不是使用英文進行傳播，就可以簡單地控制傳播的範圍。」（伊藤計劃，2007／麥盧寶全譯，2015，頁 323）眾所皆知，語言的分布和國家的疆界經常不重合，某種語言的慣用者經常分布於許多國家。使用某一語言散播屠殺文法，則每個有該語言使用者居住的國家都將受影響。最不合理的例子就是本書的結局，克拉維斯·薛帕德在自己的（英語）發言中加入屠殺文法以毀滅美國，並相信這樣能拯救其他國家免於美國帶來的殺戮——在書中經常引經據典的克拉維斯竟無知到不曉得全世界以英語為官方語言的國家不止美國，而有 59 國之多！以英語散播屠殺文法，經國際媒體的反覆轉載，必然使英語圈諸國同遭浩劫，根本不可能出現「除了美國以外的地方，一定都很安靜」（同上引，頁 342；這是小說正文最後一行）的效果。

總而言之，「屠殺文法」的設定，確實如小松左京所言，具有含混而缺乏邏輯的一面。小說的結局更是具有硬傷，難以自圓其說。<sup>2</sup>

### 三、《虐殺器官》的寓言性

#### （一）《虐殺器官》在批判美國政府嗎？

那麼，如果我們不細究「屠殺文法」的邏輯矛盾，而從寓言角度理解

---

<sup>2</sup>伊藤計劃後來發現了這個問題：在《和諧》中，故事背景的「生府社會」是在 2019 年「以北美為中心的英語圈發生一場名為大災禍的大暴動」（底線為原文已有）引發全球核戰爭之後建立的。此「大災禍」明顯對應了《虐殺器官》結局克拉維斯·薛帕德在美國散播屠殺文法造成的美國內戰。這個背景設定的用意，一方面是將《和諧》和《虐殺器官》的故事貫串在同一條時間軸上，另一方面也等於承認克拉維斯·薛帕德的行為後果與其只想毀滅美國的主觀願望並不相符，而將造成全球秩序崩潰（伊藤計劃，2008／高詹燦譯，2014，頁 37）。

《虐殺器官》，是否更能解讀出作者的寓意？

由於《虐殺器官》是以美國軍人第一人稱的形式敘述他在第三世界血腥的殺戮經歷，又對第三世界的混亂情勢提出了「屠殺文法」這種玄學式、陰謀論式的解釋，許多讀者自然而然會聯想到現實中美國政軍人員在第三世界的許多惡行，進而認為《虐殺器官》是在諷刺美國政府，隱喻美國在世界各地煽動動亂，製造人間地獄。

筆者不認同這樣粗疏的解讀。如果作者立意僅僅在於批判美國的作為，顯然沒有必要設計出「屠殺文法」這樣複雜的設定，只要蒐集國際新聞，平鋪直敘地描寫，就能拼湊出一本政治軍事小說了。而美國受反噬陷入戰亂的結局，如果用「因為作者反美」來解釋，那麼也就僅僅是作者的主觀意淫罷了，沒有進一步解讀的價值。

如果重新思索《虐殺器官》的情節，筆者認為伊藤計劃在書中隱喻的，是比美國政府的具體惡行來得更抽象的東西。

《虐殺器官》固然也部分提及美國干涉他國內政的作為，例如克拉維斯·薛帕德在五角大廈中的所見所思（伊藤計劃，2007／麥盧寶全譯，2015，頁70-71）；然而小說情節中，約翰·保羅在世界各地所煽動的屠殺，並非執行美國政府的意志。約翰·保羅的活動背後雖然有某些高官（某參議院黨團領袖）作為內應提供情報（同上引，頁293-294），但顯然不能代表美國政府。美國政府在書中反而忙於制止這些屠殺，因此才會反覆派遣克拉維斯等人到世界各地出任務，刺殺具體發動屠殺的各國軍閥及涉嫌煽動屠殺的約翰·保羅。而該參議院黨團領袖的行為曝光後，美國政府也成立了調查委員會予以處理，克拉維斯正是在該調查委員會的公聽會上散播了屠殺文法（同上引，頁339）。

可以說，美國政府在書中的作為實在談不上是反派，筆者甚至感覺伊藤計劃的描寫一定程度上美化了美國政府（雖然這恐怕不是他的初衷）。然而克拉維斯卻在故事結局把一切恨意都歸咎於美國，不惜毀滅美國社會。克拉維斯對美國社會的仇恨，並不是因為「美國政府在第三世界製造大屠殺」，而是因為「美國社會被約翰·保羅的屠殺文法所保護，以第三世界大屠殺為代價，得以免於恐怖襲擊」。使用屠殺文法在其他國家製造人間地獄，並非



美國統治集團的集體意志，而是約翰·保羅和少數激進派高官的行為，克拉維斯卻因此要全體美國人付出代價，顯然是一種缺乏邏輯的盲目情緒。筆者感覺，這恐怕是因為他所愛慕的約翰·保羅的情婦露西亞也被美國政府一同下令殺害而產生的遷怒（同上引，頁 325-326）。這可能也是小松左京感到小說人物行動欠缺說服力的原因之一。

美國政府和全民不僅不能為約翰·保羅激進小集團的行為負責，甚至他們也不完全是受益者，也有受害者的一面。小說中約翰·保羅最後活動之地，是虛構國家「維多利亞湖沿岸產業聯盟」。這個國家位於東非維多利亞湖沿岸，原為肯亞、烏干達、坦尚尼亞三國領土。小說中虛構的科技產品——在軍事、工業用途上廣泛用以代替金屬機械的「人工肌肉」，原料來自於湖中養殖的基因改造後的鯨魚、海豚肌肉。製造人工肌肉成為湖畔地區的核心產業之後，湖畔地區聯合發動獨立戰爭，脫離原三國獨立（同上引，頁 298-300）。伊藤計劃雖然曾借克拉維斯之口批判了「我們」（美國及西方社會）對當地的剝削（同上引，頁 304），但對此未曾深挖，只是把它當成約翰·保羅另一個煽動屠殺的舞臺。但這個舞臺恰恰反映了美國及西方社會與約翰·保羅之間的利益衝突。小說原文輕描淡寫湖畔地區發動獨立戰爭，肢解原有國家，分離出一個經濟上完全為西方工業服務的新國家——這恰恰是現實中西方帝國主義極常見的運作。讀者完全可以想像那場獨立戰爭是在西方經營人工肌肉生產的大企業聯合某些政客煽動下爆發的，戰爭過程中發生過的人道災難很可能不遜於克拉維斯·薛帕德的經歷。西方資本在戰爭和動亂中有利可圖，能夠建立起對第三世界的經濟控制，這才是他們熱衷煽動戰亂的根本動力。既然已經建立了這個為西方資本服務的國家「維多利亞湖沿岸產業聯盟」，那麼讓這個國家又陷入新的內亂，對美國和西方有何好處？豈不是反而拖累人工肌肉的生產，妨礙西方社會的經濟運作嗎？因此，約翰·保羅這種把第三世界人民全部當成恐怖分子預備軍、不分青紅皂白予以打擊的行為，嚴重傷害了西方資本主義體系的利益。他被美國政府視為眼中釘予以消滅，是很正常的。但小說中對這種資本主義和帝國主義的密切關聯，並未加以明確描寫，可以說恰恰放過了帝國主義最該被批判的本質。

如上所述，無論伊藤計劃主觀上對美國抱持何種看法，要說《虐殺器官》

的主旨是在諷刺、批判美國政府，實在難以成立。我們必須另闢蹊徑。

## （二）現實中的「屠殺文法」

如果我們忽略上述《虐殺器官》情節的大量矛盾，考慮何謂「屠殺文法」的核心概念，那麼應該是「語言會帶來殺戮」。

語言確實能造成殺戮，但其過程並不像《虐殺器官》形容的那樣玄之又玄。Chiro & McCauley 曾把滅族屠殺的動機歸為四種：

（1）為達到實質的、有形的目的而除掉構成阻力的反對者

（2）自認受了欺侮而要討回公道

（3）恐懼敵人

（4）認為必須除掉異己才可保持生活環境潔淨（Chiro & McCauley, 2006 / 薛絢譯，2007，頁 84）

但無論發起屠殺的領袖是對群眾訴諸憤怒、仇恨、恐懼或不潔感來發起動員，共通之處都是依據類別劃分來殺戮。被殺者是因為屬於某個族群（或政治集團），而不是個人犯了什麼過錯。也就是說，通過語言塑造出抽象概念，將許許多多個人簡化為具有某種共同「本質」的群體，是屠殺的前提。將己方團體和敵方團體都本質化，強調己方的正面本質和敵方的負面本質，使敵我之爭成為正邪之戰，害怕正義被邪惡污染，所以必須消滅敵方，這樣的思維出現在許多屠殺事件中（同上引，頁 125-133）。

這種本質主義的思考模式，可能屬於人類的本能（同上引，頁 128-129）；但另一方面，也是一種近代以來的新事物。正如班納迪克·安德森（Benedict Anderson, 1936-2015）的名言：民族是想像的共同體。民族主義是晚近兩百餘年的產物，其起源非本文可細論，但它起源於西方，隨西方帝國主義擴張而傳播到亞非拉第三世界，大致無誤。在安德森看來，民族不只具有想像成分，更重要的是它被想像為有主權的，把實現擁有一個自己的主權國家當成自由的象徵；它被想像為一個共同體，即使民族內部成員之間有許多明顯的差異，「民族總是被設想為一種深刻的、平等的同志愛。」（Anderson, 2006

／吳叡人譯，2010，頁 41-43）本質主義思考模式可以說是任何民族主義的前提。

那麼，難道「屠殺文法」隱喻的就是民族主義嗎？這樣推論可能太過草率了，畢竟民族主義在政治學上仍可細分成許多類別。現代世界幾乎每個國家、每個民族都具有某種民族主義意識，但並非每一種都導致了大屠殺。

許多學者都認為，當代的族群衝突不能簡單地歸咎於民族主義，20 世紀末的民主化浪潮恰恰是推動了極端民族情緒興起的主要動力。Snyder (2000) 討論了後冷戰的族群衝突，指出後冷戰民主化浪潮恰恰增加了民族衝突風險。民族主義情緒在民主化之前通常較弱，但在民主化過程中，掌握政權的原菁英集團往往為了維護本集團利益、避免與大眾分享權力而指控反對派是民族叛徒 (Snyder, 2000／吳強譯，2017，頁 42-43)；又由於新興民主國家的傳播媒體經常是半壟斷的、分隔化的，不同族群或政治陣營的群眾經常只接收單一立場的消息，從而培養了民族主義迷思和族際衝突 (同上引，頁 49-57)。Mann (2004) 甚至稱種族清洗為「民主的陰暗面」，本質上是現代現象；現代國家所說的「人民」可以有兩種含義：普通人 (demos) 和種族集團 (ethnos)，如果人民是在他自己的民族國家中當家作主，以及從族群的意義定義人民，民族團結和統一的重要性超過公民多樣性，就可能給其他不同族群的人民帶來災難 (Mann, 2004／嚴春松譯，2015，頁 2-4)。蔡美兒 (Chua, 2002) 則從經濟角度立論，認為自由市場經濟和民主政治在全球的擴展是種族仇恨的首要原因：經濟的自由化擴大貧富不均，並突顯某些佔有經濟優勢的少數族群 (如華人、猶太人)，而民主政治之下的政客便會將這些少數族群當成替罪羊來煽動仇恨，以角逐選票 (Chua, 2002／劉懷昭譯，2017，頁 25-28)。

這幾位學者的觀點，當然並不能簡化成「民主就是屠殺文法」，而是指出在許多第三世界國家，民主選舉帶來的激情與狂熱往往扮演了將原本沉睡狀態的族群矛盾喚醒、活化的催化劑。

良好的民主政治需要許多社會基礎，而著名的民主理論家羅伯特·達爾 (Robert Dahl, 1915-2014) 便將「文化衝突程度較低或者不存在」列為一國能否實行民主的關鍵條件之一。達爾列舉了民主國家中控制文化衝突的幾種

辦法：同化、協商、選舉制度（要求候選人同時得到不同族群支持才算當選）、分離（讓少數族群實施自治或和平獨立）。但達爾隨即又表示氣餒，因為他知道這些辦法都有賴於某些不容易達到的條件（Dahl, 1998／李柏光、林猛譯，1999，頁 158-164）。

總之，理論上的良好民主政治建立在跨族群的公民認同之上，不以歷史、血統、語言、宗教為限。但大多數社會整合能力薄弱的第三世界國家難以把這樣一種認同順利灌輸給全民。而在這些國家舉行的民主選舉中，如果政客以語言引導選民把民主等同於本族群的「出頭天」、忠於本族群勝過忠於現有國家、不投給本族群候選人就是叛徒、要求國家制度來迎合本族群利益，甚至認為只有本族群配稱「人民」，質疑或否定其他族群的「人民」地位，則民主選舉便將成為一次次製造、深化仇恨的儀式，也是後冷戰世界種族衝突的重要動力。

「本質主義的族群認同」和「民主」結合，所產生出來的政治語言，可以說就是現實中最接近於「屠殺文法」的東西。

#### 四、《虐殺器官》的預言性

考察了「屠殺文法」和現實中「本質主義的族群認同」加「民主」組合的相似性之後，讓我們再一次對照《虐殺器官》的情節：「屠殺文法」首先是某些美國人（不等於美國政府）在第三世界散播，然後被另一個美國人拿來對美國本土散播。

我們先考察上面這段話的前半段：20 世紀後期以來的全球民主化，確實很大程度是美國推動的，但美國政府卻未必是主要力量，甚至白宮、國務院、五角大廈及 CIA 還經常出於戰略目的而制裁甚至推翻某些反美的民選政府、扶植不符合民主標準的盟友。充斥美國政壇的各種顧問、利益團體、基金會也是輸出民主的主要力量（Chua, 2002／劉懷昭譯，2017，頁 23），甚至他們有可能更加堅定而狂熱。他們的活動和現任美國總統、國務卿、國家安全顧問的戰略謀劃不一定一致。現實中這種現象，和《虐殺器官》書中約翰·保羅激進小集團散播屠殺文法，和美國政府不一致，進而遭到美軍追殺

的情節，也頗有類似之處。

這段話的後半段則是《虐殺器官》全書最具預言性的情節。相較於第三世界國家大多未能鞏固跨族群的國家認同，上一節引述的學者多半認為英美已超越了此階段，例如 Mann (2004) 就認為西北歐國家承認公民社會中的利益集團和階級衝突，形成了自由主義民主制度；而中東歐多種族環境下的民主理想則走向追求族群同質性 (Mann, 2004 / 嚴春松譯, 2015, 頁 86-87)。然而，在《虐殺器官》寫作前兩年的 2004 年，美國政治學巨擘杭亭頓 (Samuel P. Huntington, 1927-2008) 在他的最後著作《誰是美國人》中警示了美國國家認同已經開始鬆動。自 1960 年代民權運動以降，文化多元主義日益強大，種族、族裔、文化等次國家認同開始解構原有的以盎格魯撒克遜新教文化為基礎的國家認同 (Huntington, 2004 / 高德源、劉純佑、石吉雄譯, 2008, 頁 152-156)。杭亭頓認為美國在國家認同衰微加上大量拉丁美洲移民湧入下，可能變成英語和西班牙語的雙語社會，也可能出現白人民族主義復興，引爆族群衝突 (同上引, 頁 36-37)。

在筆者完成本文的 2023 年初，這些預言已逐漸成為現實。而在美國，這一切矛盾與衝突都集中在一個人身上：美國前總統唐納德·川普。

川普可能是最近數年全球討論得最多的人，他的事蹟婦孺皆知，不需要向本文讀者重述。但也許仍然值得重複提醒的是：川普這樣一個原先毫無政治勢力、形象滑稽可笑的富豪，卻宛如從天而降般登上總統寶座，所憑藉的唯一武器就是他的語言。

杭廷頓的學生、另一位政治學名家法蘭西斯·福山 (Francis Fukuyama, 1952-) 受川普崛起的刺激，於 2018 年出版《身分政治》以討論此變局。他認為「身分政治」(identity politics) 的根源來自人的內在自我價值或尊嚴未得到外界的承認 (Fukuyama, 2018 / 洪世民譯, 2020, 頁 26-29)，人類心靈為爭取承認而迸發的激情 (可分成爭取平等或爭取高人一等兩種) 是身分政治的動力 (同上引, 頁 39-45)。在二戰後的美國，心理治療日益風行，並逐漸影響大眾的思維模式。心理治療不關心人的內在的實質內容，也不在乎外在社會是否公正，只在乎如何透過提高自尊、自我價值感的方式讓病人對自己感覺更好。這被福山認為是當代民主國家流行的身分政治思維的由來

(同上引, 頁 141-150)。1970 年代以來, 每一種群體(種族、族群、性別、性傾向) 都開始強調本群體獨特的、他人難以理解的生命體驗, 而左派的注意力也逐漸被這些新議題吸引。其結果是傳統的勞動階級議題不再受左派重視, 且不同的身分認同團體各有各的獨特情緒感受, 他們取得了政治正確之後, 他人不但動輒得咎、言論自由受限, 且難以建立社會共通的理性論述。最重要的是, 右派也開始模仿操作身分政治, 使得自認被漠視被打壓的勞動階級白人尋求自己的代言人——川普, 和左派政治正確正面衝撞(同上引, 頁 154-173)。福山指出, 川普的競選語言聲稱「唯一重要的事情是人民的一體……其他人什麼都不是」, 這暗示「真正的人民」將驅逐、排除「其他人」。福山評論道「這可不是國家統一的公式, 而是內戰的公式」(同上引, 頁 218-219)。本文上文已經論述, 《虐殺器官》中的「屠殺文法」在現實中的近似物就是「本質主義的族群認同」加「民主」的組合。正如福山所論, 川普的話語恰恰屬於這種組合。

福山話音未落, 2021 年 1 月 6 日, 大量不接受敗選的川普支持者衝入美國國會。雖然事態在數小時內平息, 死傷輕微, 但這起美國建國兩百餘年來未有的動亂已經震驚了全世界。可以說, 衝擊國會事件正是激發筆者寫作本文的最主要靈感來源, 也是本文题目的來源: 雖然川普最後仍被迫卸任, 但依然是共和黨內舉足輕重的人物, 目前已公開尋求 2024 年重返白宮。即使川普本人也許未必能成功再起, 但他也已經打開了潘朵拉的盒子: 覺醒了的右翼身分政治已不可能消失, 只會另覓新的代言人。吳玉山(2021) 便認為「超越川普的川普主義」勢將成為美國政治新的構成部分。我們仍生活在川普時代中, 且看不見盡頭。

2022 年, 隨著期中選舉臨近及 FBI 對川普展開司法調查, 美國政治氣氛日益詭譎, 美國媒體、學者空前地開始議論內戰會不會爆發(Walter, 2022, April 14; Binnendijk & Gompert, 2022, September 4; Coleman, 2022, October 20)。儘管筆者完成本文的 2023 年初, 氣氛稍緩, 看不出美國國內有武裝衝突的跡象, 但 2024 年大選到底會發生什麼事, 目前仍然充滿未知, 一切皆有可能。

總之, 經過對「屠殺文法」特徵和傳播途徑的考察, 我們不但發現現實

中「本質主義的族群認同」加「民主」的政治語言組合，或者稱為「身分政治」，與「屠殺文法」十分相似，都是第三世界種族衝突的主要動力；甚至它先被某些美國人傳播到第三世界，再被另一個美國人拿來在美國本土傳播的路徑，也和現實中川普激起美國左右身分政治激烈對立、政治暴力逐步升級的現況相符。<sup>3</sup>

解讀至此，筆者不能不認為《虐殺器官》是一部天才的政治寓言／預言之作：伊藤計劃在十餘年前的 00 年代，已經敏銳地感受到了現在這個以美國為中心的世界體系，存在著從中心向邊陲輸送的某種引發暴力的「裝置」。這種「裝置」並不是某個美國總統或國務卿策劃的陰謀，而是某種超乎個人意志、操縱著千千萬萬人往某個方向行動的神祕法則。這種「裝置」有一天將會在某個契機之下反噬中心，使整個體系為之傾覆。這便是「屠殺文法」這個看似裝神弄鬼、自相矛盾的設定，真正要告訴我們的事。

## 參、伊藤計劃眼中的世界體系

### 一、二元對立的世界像

在討論了《虐殺器官》對世界體系的預言之後，我們有必要對伊藤計劃眼中的世界像進行更加完整的考察。

伊藤計劃的《虐殺器官》與《和諧》兩部小說的故事結構有一定相似，主角都是世界中心的國家機器（《虐殺器官》是美軍，《和諧》則是權力擴張到接近於世界政府的 WHO）派往動亂地區執行任務的菁英。透過主角的視點，小說中的世界呈現截然的二元對立：中心與邊陲、富與貧、和平與戰亂。

---

<sup>3</sup>《虐殺器官》故事發生的年代並未明言，但其中的國際局勢大致是其寫作時間 2006 年的近未來延伸。前註曾提及伊藤計劃在《和諧》中以「大災禍」對應了《虐殺器官》的結局，而他將之定在 2019 年——恰恰是現實中川普執政的年份（伊藤計劃，2008／高詹燦譯，2014，頁 37）。

《虐殺器官》的主要情節已於上文介紹，小說重要人物約翰·保羅便是以「我們的世界」與「他們的世界」、「和平的世界」與「殺戮與憎恨的世界」這樣極端的二元對立世界觀作為他行動的前提。而《和諧》的故事背景則是 2019 年「大災禍」後數十年的「生府社會」。先進國家的政府在「大災禍」中瓦解，權力分散化的「生府」取而代之，以確保人類健康幸福為目的之「生命主義」取代了資本主義。維護身體和精神健康是生府社會的公民義務，每個成年人體內都植入名為 WatchMe 的恆常性體內監視系統以監督身體狀況，配合家庭用藥物精製系統，能治癒絕大部分疾病。菸酒和可能造成心理傷害的文藝作品都從生府社會基本絕跡。但生府社會只包括了地球上八成居民（伊藤計劃，2008／高詹燦譯，2014，頁 136），其餘社會的情況不一：如書中生活在撒哈拉沙漠的圖瓦雷克族，尼日政府要求他們的身體連接 WatchMe 系統，他們以武力反抗，在族人體內採用獨立的監視系統，不與生府網路連線，並定期以走私方式獲取生府的抗病程式修正檔，以保障族人健康（同上引，頁 52-53）；書中的巴格達，一方面有著受高牆和軍隊保護、宛如租界的「醫療產業複合體區域」<sup>4</sup>，一方面絕大部分的普通伊拉克人仍過著體內沒有 WatchMe 監控健康，會感冒、頭痛、罹患癌症，活到六七十歲便壽終正寢的傳統生活（同上引，頁 232）。在生府社會居民享受極高程度醫療服務的同時，其他社會仍經常處於內戰狀態，甚至仍有童兵等不人道現象（同上引，頁 132）。可以說，加入未來高科技元素後，《和諧》世界的二元對立程度，比《虐殺器官》有過之而無不及。

## 二、沒有主體性的第三世界

《虐殺器官》與《和諧》中的世界像，不僅是二元對立的，而且居於弱勢的一方，也就是第三世界，是沒有主體性的。

《虐殺器官》中，約翰·保羅出於對非西方世界的敵視，運用屠殺文法，在第三世界國家掀起了一次次浩劫。人類面對屠殺文法這種恐怖的魔法毫無

---

<sup>4</sup>顯然影射了 2003 年美軍佔領伊拉克後在巴格達設立的「綠區」（Green Zone）。



抵抗力，殺人者只是約翰·保羅操縱的傀儡，沒有自由意志，無法為自己的行為負責。書中沒有出現任何能讓人留下印象的第三世界出身人物。

《和諧》女主角霧慧敦的職業是 WHO 的「螺旋監察官」，負責前往生府社會以外的動亂地區從事外交調停、監督停戰等工作，類似現實中的聯合國維和部隊。但她從事此工作的動機之一是逃避生府社會對個人身體的規訓（她稱為「慈母底下的法西斯主義」〔伊藤計劃，2008／高詹燦譯，2014，頁 82〕），到戰區自由地抽菸喝酒，發洩被壓抑的自毀衝動。小說開頭描寫了她在撒哈拉沙漠和圖瓦雷克族首領互動的情節，後者有勇有謀地反抗生府體系（見上一節）的形象較為豐滿——然而，伊藤計劃卻在結局徹底否定了這個人物。

《和諧》的結局是：WatchMe 系統內藏的「和諧」程式被發動，抹消了人腦內的自我意識。小說的終章稱「這是人類意識的最後一天」（伊藤計劃，2008／高詹燦譯，2014，頁 336），「我」從此消失了，人類進入了以集體為生命單位的和諧狀態（同上引，頁 338-341）。姑且不討論此結局對《新世紀福音戰士》舊劇場版過於刻意的模仿，小說前文明明提到生府社會只包括了人類的八成人類，甚至生府社會的未成年人也尚未植入 WatchMe（同上引，頁 14）。即使生府社會中的成年人都被取消了自我意識，兒童、青少年及另外兩成的人類（包括上文提及的圖瓦雷克人及巴格達人）也不會受到影響。這個結局的硬傷比前文提及的《虐殺器官》結局更嚴重，因為《虐》的敘事採克拉維斯·薛帕德的第一人稱，還可以推諉為主角的誤判；但《和諧》的終章卻是上帝視角，沒有辯解餘地。總之，《和諧》的結局完完全全不能自圓其說。作者創造出的第三世界人物，被作者自己毫無邏輯地遺忘、抹消了。

### 三、解讀與評價

如果相較《虐殺器官》與《和諧》中的世界和 2023 年的現實世界，讀者首先注意到的可能是大國博弈的缺位。中國崛起和中美博弈，自 2010 年代起逐步明朗化，身處 2023 年的讀者每天都會接收到大量訊息，早已是日

常生活的一部分了，本文不予多談。但除了中美之外，其他國家也紛紛加入權力爭奪。2017 年 12 月，美國川普政府在國家安全報告（“National Security Strategy of the United States of America”，2017）中首次提出「修正主義強權」（revisionist powers）一詞來描述挑戰美國秩序的大國，但報告同時列舉了中俄兩國。俄國自 2014 年以來對烏克蘭、敘利亞軍事介入，2022 年甚至與烏克蘭爆發了大規模戰爭，與美國及西歐陷入空前對立。<sup>5</sup>另一個亞洲大國印度，在強人莫迪領導下，雖然近年一定程度上配合美國的印太戰略以制衡中國，但在俄烏開戰後也和中國一樣拒絕譴責俄國，並持續採購俄國能源與武器。有論者稱印度和中國一樣對美國主導秩序下的二等地位深感不滿，尋求更大的發言權（Mukherjee, 2022, September 26）。而長期與美國敵對的神權國家伊朗，雖然距離「大國」地位仍有距離，但在俄烏開戰後也動作頻頻，加入中俄主導的上海合作組織（Toupchinejad, 2022, September 28），並提供無人機以支援烏克蘭戰場的俄軍（Brennan, 2022, December 30）。到了 2023 年 3 月 10 日，伊朗甚至在中國的斡旋下，和主要敵國沙烏地阿拉伯達成協議，恢復邦交（Gans, 2023, March 11）。這起中東外交革命，除了令人驚訝中國的國際影響力，也令人想起美國前國家安全顧問布里辛斯基在 1990 年代的斷言：對後冷戰的美國來說「最危險的潛在狀況」就是中國、俄國和伊朗的反美大同盟（Brzezinski, 1997／林添貴譯，1998，頁 67）。布里辛斯基在這句話後面還補充了一句「姑不論這個狀況的機率有多麼渺小」，可見美國的全球秩序在這二十餘年來發生了多少不利的變化，當年認為機率不大的威脅，如今卻逐漸成形。1990 年代至 2000 年代如日中天的美國秩序，如今已面臨狂風驟雨般的挑戰。

關於中俄印等大國的崛起及她們和美國之間的博弈，此一宏大議題本文無法細論，在此僅約略指出此一趨勢，以反映伊藤計劃的世界和當今世界的差距。《虐殺器官》與《和諧》中，世界體系沒有夠份量的挑戰者。《虐

---

<sup>5</sup>感謝匿名審查人的提醒：俄烏戰爭這起當下正在我們身邊發生的大事，其遠因也和烏克蘭發生了本文談論的「本質主義的族群認同」和「民主」的結合有關，但筆者在文中未能觸類旁通加以討論。為彌補此缺憾，讀者或可參考 Volodymyr Ishchenko 的兩篇近期論述（Ishchenko, 2022, 2023）。

殺器官》中「進入二十一世紀後，G9 就沒有發生過軍事衝突……我們參與的，經常是實力不對等的戰爭。我們的任務，經常是有錢的軍隊去痛打貧窮的軍隊。<sup>6</sup>」（伊藤計劃，2007／麥盧寶全譯，2015，頁 279）。印度在《虐殺器官》中是被屠殺文法摧毀的第三世界國家之一，中國則僅以敵方軍火生產國的身分出現（同上引，頁 273-274）。而在《和諧》中，國家的功能大部分已被生府取代，生府體系掌握全球八成人口，其霸權幾乎不可動搖。

伊藤計劃筆下這樣二元對立的、固化的世界，與主流的世界體系概念有很大差異。舉例來說，以華勒斯坦（Immanuel Wallerstein, 1930-2019）為主要建立者的世界體系理論，對世界的理解不是二元，而是三元的。世界體系理論將世界經濟劃分為核心、邊陲、半邊陲三種地區。半邊陲地區「是一個世界經濟必需的結構因素……起著類似於中間商群體在一個帝國起的作用」（Wallerstein, 1974／郭方、劉新成、張文剛譯，1998，頁 523），隨著世界經濟的變化，核心國家可能變為半邊陲，半邊陲也可能變為邊陲（同上引，頁 523-524）。反過來說，有衰敗就有興起，新興大國也有機會從半邊陲躍為核心，整個體系具有一定的流動性。<sup>7</sup>然而，伊藤計劃的世界裡欠缺了半邊陲這樣的強國和弱國之間的中間概念，使得他眼中的世界體系沒有彈性，國家的命運看起來永難改變，散發著絕望感。

然而《虐殺器官》與《和諧》中的世界體系，在小說結尾都傾覆了。是什麼力量顛覆了它們？《虐殺器官》中，約翰·保羅一介語言學家單槍匹馬就發現了屠殺文法並順利武器化，而最後又由主角克拉維斯·薛帕德一個人輕易地散播到了全美國，繼而毀滅了舊世界；《和諧》中，霧慧敦的老相好御冷彌迦領導的小集團掌握了 WatchMe 的系統後門，得以操縱生府公民的頭腦，能隨機誘人自殺，並公開威脅全體公民一星期內不去殺人就會被逼自殺，造成社會秩序崩潰，生府體系的掌權者被迫啟動了「和諧」程式，取消人類自我意識。也就是說，體系都是由少數超人般的反叛菁英透過某種神奇

---

<sup>6</sup>現實中並無 G9 一詞，可能是指 G8 加上歐盟。

<sup>7</sup>這不代表華勒斯坦認為資本主義世界體系能永存，他在 2001 年的訪談中認為這個體系正在崩潰，2025 年左右可能出現新的世界秩序，但他表示自己無力預測新體系的樣貌（吳迎春、游常山，2001）。

武器來顛覆的，這樣的結局已經接近於機械降神。而體系內數十億被規訓、被侮辱、被損害的普通人，在故事中沒有地位，也未見發揮積極作用。

歸根結柢，伊藤計劃是生活於 21 世紀 00 年代的人。從前文的介紹可知，《虐殺器官》與《和諧》中許多地方可瞥見美國反恐戰爭和伊拉克戰爭的影子。00 年代的中俄等大國尚無今日這般積極活動，美國在阿富汗也還沒發生 2021 年 8 月倉皇撤退的窘境，當時的美國的確沒有任何對手。因此伊藤計劃在依據當時的時代氣氛而創作的小說中，也自然而然地呈現了一種強弱二分、不可動搖的世界體系。他不相信有國家、有群眾運動能挑戰這種體系，而又不認同體系，因此只能幻想一小撮菁英能顛覆這一切。

## 肆、結論

本文的前半部分，筆者考察了伊藤計劃科幻小說《虐殺器官》中的核心概念「屠殺文法」，試圖解讀其寓意。「屠殺文法」概念在小說中有許多自相矛盾之處，因此筆者企圖從寓言角度理解之。若把屠殺文法理解成美國政府四處製造動亂的隱喻，有許多扞格之處；而考察了當代民主制與屠殺的關係之後，筆者發現屠殺文法作為一種引發殺戮的語言，其作用極近似於現實中後冷戰第三世界國家「本質主義的族群認同」加「民主」的政治語言組合。而西方現代的身分政治，增加了西方各族群的撕裂，又在川普的推波助瀾之下使美國社會出現內戰的危險，這恰恰和小說結局屠殺文法反過來毀滅了美國的結局相符。由此，筆者認為《虐殺器官》是一部天才的政治寓言／預言。

本文的後半部分進一步討論伊藤計劃眼中的世界體系。生活在 21 世紀 00 年代的伊藤計劃，目睹了反恐戰爭、伊拉克戰爭中美國壓倒性的力量，因此在他眼中，世界只有核心和邊陲兩種國家，第三世界毫無希望，而未能看出半邊陲強國中、俄、印具有挑戰美國體系的潛在力量。在《和諧》中，第三世界甚至遭到了徹底的遺忘和取消，已達到小說結局站不住腳的地步。

雖然《虐殺器官》的情節告訴我們，伊藤計劃已經隱約感覺到美國秩序

之中存在著某種結構性的、超乎人力的、從中心向邊陲輸送的暴力裝置，且有一天會反過來成為顛覆美國秩序的力量，然而當時他無法具體說清楚那股力量是什麼。於是在小說中，他只能把這股力量幻想成某種神祕的武器，由少數超人操控，為此不惜犧牲故事合理性。他對美國秩序雖不認同，但也想不出革命如何可能。活在 00 年代的他終究無法超越時代。

如果伊藤計劃還活著，至今（2023 年）尚不滿五十歲，正值盛年。如果他能目睹當今風雲變幻的國際新局勢，必然會提出相應的新觀點，並創作更多結合科幻與政治的作品，幫助我輩讀者更理解我們身處的時代。

相較於「伊藤計劃與生命政治」，「伊藤計劃與現實政治」仍是有待進一步探究的主題。筆者希望本文的粗淺嘗試能對此發揮拋磚引玉的功用。

## 參考書目

- 于倉和譯（2014）。《平和、秩序與叛逆：第三帝國的日常生活》，新北市中和區：風格司藝術創作坊。（原書 Hughes, M., & Mann, C. [2000]. *Inside Hitler's Germany: Life under the Third Reich*. Lincoln, Nebraska: University of Nebraska Press.）
- 大森望（2015）。〈解說〉，麥盧寶全（譯）《虐殺器官》，頁 358-374。臺北：台灣東販。（原書：伊藤計劃 [2007]. 《虐殺器官》。東京：早川書房。）
- 吳玉山（2021）。〈超越川普的川普主義〉，《思想》，42：67-75。
- 吳迎春、游常山（2001）。〈華勒斯坦：資本主義全球化崩潰中...〉，《天下》，246：180-188。
- 吳強譯（2017）。《從投票到暴力：民主化和民族主義衝突》，北京：中央編譯出版社。（原書 Snyder, Jack. [2000]. *From Voting to Violence: Democratization and Nationalist Conflict*. New York: W. W. Norton & Company.）
- 吳叡人譯（2010）。《想像的共同體：民族主義的起源與散布》，臺北：時報。（原書 Anderson, Benedict. [2006]. *Imagined Communities: Reflections on the Origin and Spread of Nationalism, Revised Edition*. London: Verso Books.）

- 李柏光、林猛譯（1999）。《論民主》，北京：商務印書館。（原書 Dahl, Robert. [1998]. *On Democracy*. New Haven: Yale University Press.）
- 林添貴譯（1998）。《大棋盤》，臺北縣新店市：立緒。（原書 Brzezinski, Z. [1997]. *The Grand Chessboard: American Primacy and Its Geostrategic Imperatives*. New York: Basic Books.）
- 洪世民譯（2020）。《身分政治：民粹崛起、民主倒退，認同與尊嚴的鬥爭為何席卷當代世界？》。臺北：時報文化。（原書 Fukuyama, F. [2018]. *Identity: The Demand for Dignity and the Politics of Resentment*. New York: Farrar, Straus and Giroux.）
- 若林弘太郎（2018）。〈現代日本の〈サイボーグ〉の主体：伊藤計劃『虐殺器官』『ハーモニー』論〉，《論叢 国語教育学》，14：30-39。
- 烏蘭譯（2012）。《卡廷慘案真相》，北京：新星出版社。
- 高詹燦譯（2014）。《和諧》，新北市新店區：繆思。（原書 伊藤計劃 [2008]. 《ハーモニー》。東京：早川書房。）
- 高德源、劉純佑、石吉雄譯（2008）。《誰是美國人：族群融合的問題與國家認同的危機》，臺北：左岸文化。（原書 Huntington, S. P. [2004]. *Who Are We? The Challenges to America's National Identity*. New York: Simon & Schuster.）
- 張旭譯（2015）。《大屠殺：根源、歷史與餘波》，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原書 Crowe, D. M. [2008]. *The Holocaust: Roots, History, and Aftermath*. Boulder, Colorado: Westview Press.）
- 郭方、劉新成、張文剛（1998）譯。《近代世界體系（第一卷）》，臺北：桂冠圖書。（原書 Wallerstein, Immanuel. [1974]. *The Modern World-System I: Capitalist Agriculture and the Origins of the European World-Economy in the Sixteenth Century*. Cambridge: Academic Press.）
- 麥盧寶全譯（2015）。《虐殺器官》，臺北：台灣東販。（原書 伊藤計劃 [2007]. 《虐殺器官》。東京：早川書房。）
- 楊奕琦（2021）。〈伊藤計劃的《虐殺器官》與《和諧》中的生命政治與死亡政治〉，國立臺灣大學外國語文學研究所碩士論文。
- 劉懷昭譯（2017）。《虎媽對全球化的預言：輸出自由市場與民主政治會換來種族仇恨和世界動盪》，臺北：五南圖書。（原書 Chua, A. [2002]. *World on Fire: How Exporting Free Market Democracy Breeds Ethnic Hatred and Global Instability*. New York, NY: Doubleday.）
- 薛絢譯（2007）。《為什麼不殺光？政治大屠殺的秘思》，臺北縣新店市：立緒。（原書 Chirot, Daniel & McCauley, Clark. [2006]. *Why Not Kill Them All? The Logic and Prevention of Mass Political Murder*.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 薛絢譯（2013）。《平凡的邪惡：艾希曼耶路撒冷大審紀實》，臺北：玉山社。（原書 Arendt, H. [1963]. *Eichmann in Jerusalem: A Report on the Banality of Evil*. New York: Viking Press.）

- 嚴春松譯（2015）。《民主的陰暗面：解釋種族清洗》，北京：中央編譯出版社。（原書 Mann, M. [2004]. *The Dark Side of Democracy: Explaining Ethnic Cleansing*.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 “National Security Strategy of the United States of America” (2017, Dec.).  
<https://trumpwhitehouse.archives.gov/wp-content/uploads/2017/12/NSS-Final-12-18-2017-0905.pdf>，2023年2月6日讀取。
- Binnendijk, H. & Gompert, D. (2022, September 4). “Another American Civil War? Take Heed or Take Cover.” *The National Interest*.  
<https://nationalinterest.org/feature/another-american-civil-war-take-heed-or-take-cover-204583>，2023年2月6日讀取。
- Brennan, D. (2022, December 30). “Shahed-136: The Iranian Drones Aiding Russia's Assault on Ukraine.” *Newsweek*.  
<https://www.newsweek.com/shahed-136-kamikaze-iran-drones-russia-ukraine-1770373>，2023年2月6日讀取。
- Coleman, P. T. (2022, October 20). “The U.S. is Heading Toward a Second Civil War. Here Is How We Avoid It.” *Time*.  
<https://time.com/6222633/second-civil-war-us-how-to-avoid/>，2023年2月6日讀取。
- Gans, J. (2023, March 11). “Five things to know about the Iran-Saudi deal brokered by China.” *The Hill*.  
<https://thehill.com/policy/international/3895412-five-things-to-know-about-the-iran-saudi-deal-brokered-by-china/>，2023年3月28日讀取。
- Ishchenko, V. (2022). Ukrainian voices? *New Left Review*, 138, 29-38.
- Ishchenko, V. (2023). The Minsk Accords and the Political Weakness of the “Other Ukraine”. *Russian Politics*, 8, 127-146.
- Mukherjee, R. (2022, September 26). “China and India weren’t critical of Putin’s war. Did that change?” *The Washington Post*.  
<https://www.washingtonpost.com/politics/2022/09/26/putin-ukraine-china-in-dia-xi-modi/>，2023年2月6日讀取。
- Toupchinejad, A. (2022, September 28). “Is the Shanghai Cooperation Organization a Lifeline for Iran?” *The National Interest*.  
<https://nationalinterest.org/blog/middle-east-watch/shanghai-cooperation-organization-lifeline-iran-205033>，2023年2月6日讀取。
- Walter, B. F. (2022, April 14). “We Are Living in the Age of Civil War.” *The New Republic*.  
<https://newrepublic.com/article/165959/global-age-civil-war>，2023年2月6日讀取。

## A Rereading of *Genocidal Organ* in the Trump Era: The World-System According to Project Itoh

Yen-ru Huang

### ABSTRACT

This article proposes a political interpretation of Project Itoh's *Genocidal Organ*. The “genocidal grammar” is a metaphor for the combination of the essential identity and democracy, that presents a risk of ethnic conflict to the Third World. At the end of the novel, the genocidal grammar destroyed the United States, it is a prophecy of Trump Presidency. The world-system in the novels by Project Itoh are dualistic, the Third World in the system has no subjectivity, and the overthrow of the world-system is driven only by the *deus ex machina* by few elites. This reflects the fact that Project Itoh, who lived in the 2000s, had a great insight into the world-system, but was unable to beyond his time.

**Keywords:** *Genocidal Organ*, identity politics, Project Itoh, Third World,  
World-System

---

\* Huang Yen-ru is a PhD student at the Department of History, National Chengchi University, Taipei, Taiwan. ROC. E-mail: 105153501@nccu.edu.tw



## 被《推力》趨動的人

羅尹悅、洪靖\*

書 名：推力：每個人都可以影響別人、改善決策，做人生的選擇設計師【終極增訂版】

作 者：理查·塞勒 (Richard H. Thaler)、凱斯·桑思坦 (Cass R. Sunstein)

出版日期：2022 年 12 月 13 日 (原著出版日期：2021 年 8 月 3 日)

出 版 社：時報出版

### 本文引用格式

羅尹悅、洪靖 (2023)。〈被《推力》趨動的人〉，《傳播、文化與政治》，18:113-119。

---

投稿日期：2023 年 10 月 11 日；通過日期：2023 年 11 月 5 日。

\*羅尹悅 世新大學傳播管理學系助理教授，e-mail: yylo@shu.edu.tw

洪靖 中正大學紫荊不分系學士學位學程助理教授，e-mail: hungching@ccu.edu.tw

由理查·塞勒 (Richard H. Thaler) 和凱斯·桑思坦 (Cass R. Sunstein) 兩位重要行為經濟研究學者所著的《推力》( *Nudge: The Final Edition* )，原書於 2008 年出版，2009 年中文初版，而 2014 年再版，2022 年年底再推出「終極增訂版」。橫跨 10 年仍更新出版，意味著 Nudge 的概念所引發的討論，以及隨著過去 10 年，從歐債風暴、金融海嘯到全球疫情，整個環境的變化如何挑戰、或是應驗 Nudge 概念在當前<sup>25</sup>環境中的實踐。

整本書的核心概念在於，在維護每個人的選擇自由的概念下，適度運用誘因與 Nudge<sup>26</sup>，改善生活以及解決社會中的問題。於是，如何設計選項，就成為一個關鍵思考。在我們生活中可以見到的方式，舉凡退休金儲蓄的選擇、電腦軟體安裝時「標準安裝」的預設選項，或是想一想最近 10 年，臺灣在網路報稅時的變化，從這些面向來看，有意義的設計選擇，大幅簡化了我們日常的複雜度。

以行為經濟學的研究背景出發，《推力》這本書所揭櫫的是，人類的選擇與預測充滿著瑕疵與偏見，在尊重選擇自由的概念下，如何提升選擇的品質，讓人可以過更好的生活；想要挑戰的是經濟學中相信每個人的思考與選擇永遠是理性的前提，書中於是將經濟學中想像出的人類形象，稱之為「經濟人」；而現實中會滑社群媒體滑到工作來不及完成、或是不切實際地樂觀估計完成計畫所需時間的真實人類，則稱之為「一般人」。《推力》想要努力地，即是讓「一般人」有更好的生活規劃與選擇，像是我們可能會願意付費使用時間管理的手機 APP，讓自己有更好的工作專注力。

《推力》中對於經濟人與一般人的區別，主要建立在近年行為經濟學的研究上，尤其是 Daniel Kahneman 與 Amos Tversky 的工作成果<sup>27</sup>。行為經濟學認為，過去經濟學中「人類會根據收集到的資訊做出理性決策」的假設問

---

<sup>25</sup> 兩位作者皆因為行為經濟學與推力的理論獲得國際重要獎項：理查·塞勒獲得 2017 年諾貝爾經濟學獎，而凱斯·桑思坦則獲得 2018 年 Holberg Prize。

<sup>26</sup> 誘因與推力皆是影響人類決策的重要因素，但有一個重要差異：「誘因」類似金錢計算，對理性的經濟人和不太理性的一般人都適用，但「推力」僅適用於一般人，對經濟人沒有效果。為何如此？詳見後文對經濟人與一般人的討論。

<sup>27</sup> 關於 Daniel Kahneman 與 Amos Tversky 的合作，以及如何催生了行為經濟學，請見 Lewis, M. (2016), *The Undoing Project: A Friendship That Changed Our Minds*. W. W. Norton & Company.

題不小，因為人類實際上有兩種思考方式或系統在運作，一種是快系統（System 1）、一種是慢系統（System 2）：簡單來說，後者就是所謂的「理性」，常用於計算、考試推理；前者則像是「直覺」，出現在許多人類不花力氣就能決策的事情上，比如走路應該先抬右腳或左腳。快系統很容易受到決策時環境中的各種線索（clue）所以影響，而作為決策者的人類並不自知。重點在於，研究發現，過去我們認為應該只依靠慢系統做出決定的事務——包含法官判決、經理人投資、選民投票...等，實際上很難免於、甚至大幅受到快系統的影響。

塞勒和桑思坦於是建議，如果快系統很難避免，那麼政府就應該透過調整決策時的環境——作者稱之為「選擇架構」（Choice Architecture）——來引導人們做出無害乃至於正確的決定。兩位作者認為，如果人類有無限時間和精力來收集與衡量資訊，那麼確實有可能事事皆理性，但真實世界中的人類顯然並非如此，因此政府應該協助人民減輕生活中的決策負擔，讓他們把時間和精力留在更重要的事情上。不過，兩位作者並不因此提倡「大政府」，而是建議一種介於萬事都管的「大政府」與凡事不問的「小政府」的行政作風：自由家父長主義（Libertarian Paternalism）。自由制與家父長制一向被視為矛盾的概念，但在「推力」的概念下，這兩者卻能巧妙結合。透過推力——設計選擇架構——政府可以引導人民走向正確的方向（家父長），但無論如何不強制、留下輕易退出（opt-out）的可能（自由制）。

《推力》推出之後，引發關注乃至爭議，原因在於書中主張應用「推力」於公共政策、並引導人的行為決策，直接觸動到西方世界對於人類自主性（Autonomy）的基本假設，引發操縱（manipulation）的疑慮，連帶挑戰到人民與政府之間的關係。例如：鼓勵政府使用推力，會不會讓干擾人民的生活有了正當性？或者，誰來使用或設計推力？人民是否因此淪為缺乏主見與能動性的戲偶（puppet）？換言之，在探討 Nudge 的過程中，需要重新思考的是「人」的概念，以及從這個概念出發，人又該如何被對待？

信仰自由意志主義的人，認為 Nudge 會限制自由；或是也有完全相反的批判，認為「推力」只是微調，無法做到大規模改變。在書中第十五章〈反對意見〉中，兩位作者試圖以更細緻化的方式，提出相關證據，說明自身立

場來回應反對意見。這也是本終極增訂版篇幅增加最多的部份，尤其納入了桑思坦於第一版《推力》出版後的政治哲學思考<sup>28</sup>。

信仰自由意志主義者以自由與選擇權為主臬，認為人的福祉難以被量測以及評斷，因此認為在政策上，只要提供必要的決策資訊，之後就應該讓人自行選擇。作者分析瑞典的民眾自選投資組合與選擇預設基金相對比，反駁單單給與選擇是不足的，提供設計完善的選項也同樣重要。分析結果顯示，發現在民眾的自選投資組合中，更可能資產配置失當，反映出民眾追隨趨勢決策的錯誤投資思考，而非預測趨勢發展；或是展現出傾向購買自己國家股票的國內資產偏誤；最後這類自選投資組合，甚至要負擔較高的費用。自選投資組合的整體績效表現不如選擇預設基金。

更重要的是，作者們認為，如果自由主義者堅持保障自由的理由是「人們才知道什麼對自己最好，因此除非他／她的行為已經或可能傷害他人，否則選擇不應該受到任何干預」（即所謂的傷害原則），那麼他們和自由主義者的差異並未天差地遠。原因是，對前述的自由主義者而言，自由是保障幸福（well-being）的途徑（亦即最終目的是幸福），那麼當選擇自由被證明無法保障幸福—如同行為經濟學所證明的，人們常常選擇錯誤害到自己（與他人）時，似乎就缺乏強力堅持自由的理由。換句話說，不論是前述自由主義者或本書作者們，雙方在意的都是選擇者的幸福，而非自由本身。至於「視自由本身為目的」的自由主義者，作者們回應，人們不可能對所有事情都做深思熟慮的選擇，也就是說，如果從每一件小事到每一件大事都必須使用慢系統來做決定的話，人類可能連起床時哪一隻腳先落地都難以決定，人類的自主很快就會蒸散殆盡。

也有批評者認為，與其使用推力，更重要的是提升能力，例如在經濟領域的範疇之中，像是即早開始培養財務知識。作者肯定教育的重要性，然而科學研究的結果告訴我們，教育的助益會隨著時間消失，而且人們實際上並沒有時間和精力就大大小小的事情深思熟慮。因此，作者認為，人不僅需要

---

<sup>28</sup> 可參考桑思坦的兩本著作：*Why Nudge?: The Politics of Libertarian Paternalism* (2015, Yale University Press) 以及 *Choosing Not to Choose: Understanding the Value of Choice* (2016,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Reprint edition)。

教育，在生活裡種種的決策之中，推力也同樣重要。他們一再強調，推力的目的，在於讓人們即使漫不經心或認知疲勞，也不至於犯下大錯。此外，作者們也認為，強調「主動選擇」的論述，往往忽略一個事實：很多時候人們面對艱難的問題（例如是否捐贈器官），多半傾向不做選擇。在這樣的情況下，如果強力要求人們做出決定，實際上也侵害了自由——不做選擇的自由。

從民主社會的角度出發，作者強調以「透明度」原則：開誠布公、揭露資訊，以便人民進行監督的概念，反制推力可能成為政府對於人民無形控制的指控。同時也引述當前的研究結果，發現透明化的資訊告知，不會減損推力的效力，反而會放大推力的效果。更重要的是，選擇並非在真空中進行，環境（選擇架構）勢必會影響決定，那麼如果政府不設計或利用推力，結果也只是把推力的機會和能力丟給私人企業而已，而後者實際上更不樂意考量人民的福祉。對作者而言，反對政府使用推力的論者，往往對於私人企業的各种推力，缺乏同等的反對力道。

### 施與推力的那雙手，該在何處收手？

相較《推力》挑戰傳統經濟學中「經濟人」的概念；傳播領域中對於人的想像，似乎就是帶著一個不證自明的「一般人」想像。從最早的宣傳分析中，給目標扣上一個正面、或是負面的標籤，就能產生好感、或是厭惡的心情；透過醫師的說明，會讓我們對於某項醫療產品更有信心；選舉中的「造勢」，因為樂隊花車效應，會影響到投票選擇。在說服分析之中，傳播學者早就指出訊息的內容結構會影響到人的選擇。或是在涵化理論之中，電視內容會影響到人類對於真實社會的想像。在更近期的社群媒體時代，在 Netflix 放映的紀錄片《智能社會：進退兩難》，其中一個畫面直接將人作為被工程師的程式設計所操弄的人偶。在傳播領域之中，我們甚少從後設的角度去談論「人的概念」，而是先驗性地認為人的選擇與判斷會受到外在環境的影響。在傳播領域之中，傳播研究者很早就意識到框架的影響力，於是，當醫生說「在一百個動過這種手術的病人當中，九十人在五年後還活著」；或是當醫

生說「在一百個動過這種手術的病人當中，十人在五年內去世」，同樣的內涵，不同的描述方式，人類就是會有不同的反應。

從傳播學視角出發，人不僅容易受到外在環境的影響，同時也受到歸因錯誤的限制，當我們在評估他人的行為時，傾向高估內部或個人因素的影響（例如，歸因於一個人的性格），而非外在情境因素（忽略情勢所迫的可能性），而做出錯誤的判斷。而即便當事實擺在我們眼前，當事實與自身認知相互矛盾時，我們甚至會「發揮創意」地想辦法降低事實與認知的矛盾衝突，合理化自身的思考。

傳播領域之中，也很早就發現「第三人效應」，認為媒體資訊對於他人的影響，會遠大於自己；「他人」永遠比自身更容易受到假訊息的影響。從這個角度觀之，《推力》的作者其實不需要說服傳播學者，人是多麼容易受到各種外在環境的影響，以致無法做出對自身最好的決斷。然而書中提及，對於我們該如何維護與尊重個人選擇，其中的界線又再何處，值得當前的傳播領域思考。

近年來傳播領域的研究應用，已經擴大至行銷管理，以及商業應用，遠遠超過《推力》期望影響的公共政策之領域；過往傳播領域的受眾是閱聽人，如今隨著傳播應用領域的擴張，閱聽人成為了消費者，影響力也擴及公私各領域。在民間企業或是私部門之中，運用推力追求利潤的最大化，是企業運作的基本邏輯。由於《推力》的作者，主要期望將設計選項的效果，發揮在公共領域之中，因此特別留意公與私之間的界線，強調以公開透明原則，供民眾檢核其推力運用的範圍。對於影響力更深、更廣的傳播領域而言，更有必要時時警醒關於操縱與隱私侵犯的界線。

對應到目前公共領域之中，政府與傳播學者最為關切的問題，則是在資訊爆炸，訊息的真實性介在一個真偽之間的灰色地帶時，除了直接打擊、法辦明確是不實訊息和認知作戰之外，如何運用推力來提高人們選擇真實新聞的選擇機會，同時不侵害新聞與言論自由，可能會是一個值得探討的議題。

無可否認的是，當前的生活存在著各式各樣的推力，演算法的推力和網軍的操作，讓各方政治力，以及資本力具有操縱公共輿論的可能性；演算法的推薦和網軍的消息傳播，使人們更容易接觸到與自身立場相符的訊息內

容，強化偏見，減少社會的對話和理解，也加劇社會分化。一次又一次的輕推，把人推向極化的端點，造成公民社會的裂解。

為了維持公民社會的可能性，我們肯定在對抗不實或惡意訊息之時，當前各界所做的努力，在民間成立查核中心；由民間、政府、和教育界，共同協力深化媒體素養教育；乃至成立專法等各項措施，從各方面來扼止不實、或惡意訊息對於個人、或社會所造成的危害。特別是法令的制定，由制度層面維護個人選擇，限制民間企業對於推力無限度的擴張。

然而對於介在灰色地帶，難以直接界定真偽的訊息，若能有一個「資訊推力」，降低我們做出錯誤判斷、或是提高我們做出正確決策的機會，乃至保留我們做出不同思考，在某些程度上也許能夠有效地避免爭議。在生活裡我們已經可以看到，在許多的社群平台上，當出現爭議性關鍵字時，例如在2020年時的幾項事件，像是美國大選、Covid-19、疫苗等字眼，社群平台會以「提示」的方式，提供官方資訊的相關連結；或是避免使用者未讀即轉發，因此設計在使用者分享之前，多增加一道門檻，詢問是否要先閱讀、或是直接分享。這些設計無涉內容真偽的判定，而是以提供其他資訊的方式，暗示有不同的可能性；或是提示使用者，在分享之前能夠再次確認自己所分享的內容。同樣地，基於民主社會中對於公開透明的原則，這些設計出的「資訊推力」也應該公開透明，限制任何一方的選擇設計師，由輕推變成操縱的可能性。

橫跨十年的《推力》隨著時代的推進，加入了更多思考以符合當前的潮流。臺灣傳播環境，因為科技變化，有了更多的參與者，而這些參與者不再只是過往的媒體傳播人，還包括了科技公司；與此同時整個社會思潮也有了巨變，我們對於人權、言論自由、性別、法治等公眾議題，有了與十年前截然不同的觀點。對於傳播影響力的思考，該被界線設於何處，是時候該有全新的討論。

## 訂 閱

零售：每期新台幣 500 元

個人訂閱：國內一年兩期 1000 元

海外一年兩期 1500 元(或 50 美元)

機構訂閱：國內一年兩期 2000 元

海外一年兩期 3000 元(或 100 美元)

以上均含掛號郵資

郵政劃撥戶名 社團法人媒體改造學社

郵政劃撥帳號 50313103



# Communication, Culture, & Politics

Journal published by CMR, Taipei, Taiwan

December 2023 Issue 18

2 issues a year, in June and December

## Sponsor

Campaign for Media Reform, CMR

## Editorial Advisory Committee

Jin Cao	Fudan University
Chin-hwa Chang	National Taiwan University
Yu-liang Chang	Nanhua University
Wei-Xing Chen	China Media University
Yong Hu	Peking University
Guang-shiash Hu	Shih Hsin University
Yu Huang	Hong Kong Baptist University, Hong Kong
Yng-ruey Jiing	Tainan National University of the Arts
Liangwen Kuo	National Chiao Tung University
Chin-Chuan Lee	National Chengchi University
Jing-Ling Lin	Fu Jen Catholic University
Tung-Tai Lin	National Taiwan Normal University
Yuan-huei Lin	National Chengchi University
Hailong Liu	Renmin University of China
Xinyu Lu	Fudan University
Yen-Yuan Ni	Ming Chuan University
Linchuan Qiu	National University of Singapore
Bo Shan	Wuhan University, China
Ping Shaw	National Sun Yat-Sen University
Anbin Shi	Tsinghua University, China
Chunquan Wang	Northwest University, China
Song-In Wang	National Chung Cheng University
Yu-Li Wang	Chinese Culture University
Bu Wei	Chinese Academy of Social Sciences, China
Shieu-Chi Weng	Shih Hsin University
Yu-min Wu	Shenzhen University
Yuezhi Zhao	Simon Fraser University, Canada
Jiang Zhan	Beijing Foreign Studies University
Guo-Liang Zhang	Shanghai Jiao Tong University
Zhian Zhang	Sun Yat-Sen University, China

## Editorial Committee

Editor-in-Chief  
Shih-Hung Lo National Chung Cheng University

## Editorial Board

Kuan-hsing Chen	National Chiao Tung University
Chien-san Feng	National Chengchi University
Fu-Mei Lin	Shih Hsin University
Chen-ling Hung	National Taiwan University

## Editorial Assistants

Chung-Po Liu South China University of Technology

## Publisher

Publisher

Campaign for Media Reform, CMR

Address 3F-3., No. 102, Sec. 2,  
Zhongshan N. Rd., Zhongshan  
Dist., Taipei, Taiwan (R.O.C.)

Phone +8862-2522-1499

Fax +8862-2522-4970

E-mail: editor.2015ccp@gmail.com

Website: <http://ccp.twmedia.org/>

ISSN: 2411-4006

Calligraphy: Yun-Chi Huang

Cover Design: Yiche Feng

## Subscription

Personal:

NT1000/per year

(national, including shipping charges)

NT1500/per year(or US\$ 50/per year)

(international, including shipping  
charges)

Institutional:

NT2000/per year

(national, including shipping charges)

NT\$3000/per year(or US\$100/per

year )

(international, including shipping  
charges)

Postal Giro Account

50313103, Campaign for Media Reform

Some rights reserved, authorized under Creative  
Commons license clauses.



**Research Articles in general**

- *Politics, Technologies and Cross-Strait Relations:*

*Reporting and Commenting on Communication 'Policies' , 2016-2022*

- *Leftist Practices of Chen Ying-chen' s Novels*

*& Social Practices of Workers of Magazine Ren Jian*

**Research Notes**

- *Transmission or copy of "truth":*

*The role play of Taiwanese media in the Russia-Ukraine conflict*

**Novel Perspectives**

- *A Rereading of Genocidal Organ in the Trump Era:*

*The World-System According to Project Itoh*

**Book Review**

- *The Review of Nudge :*

*Improving decisions about health, wealth, and happiness(the final edition)*